

目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经济学 管理学•

5 / 乌家培: 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12 / 毛蕴诗: 现代公司理论及其形成背景
——兼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区别

21 / 许经勇: 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

25 / 张景学: 公有经济企业家: 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基
点

•哲学•

30 / 杨春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
运

38 / 庞元正: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回顾与
展望

46 / 游艳玲: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
微》学术座谈会述要

50 / 章海山: 论经济与伦理的中介 ——利益

•教育学•

57 / 笔 谈: 广东学者谈我国教育产业发展趋势

72 / 吴福光: 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有益探索
——评《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录

·历史学·

75/ 段云章: 孙中山的超越构想

84/ 赵利栋: 胡适与康有为: 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92/ 瞿林东: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99/ 蓝 勇: “刀耕火种”重评
——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文学·

105/ 童庆炳: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113/ 陈书良: 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

120/ 郁龙余: 中国学在印度

124/ 徐国荣: 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审视
——'99 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述要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46307

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1, 2000

- Net Economy and Its Influence on Economic Theory Wu Jiapei(5)
Modern Theory of Company and the Background of Its Establishment
..... Mao Yunshi(12)
O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e for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 Xu Jingyong(21)
Entrepreneurs of Public- owned Economy: Basic Problems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Zhang Jingxue(25)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ist Historical Mission
..... Yang Chungui(30)
A Look Back into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New China Pang Yuanzheng(38)
Main Points from the Forum on Mr. Gao Qiyun' s Work ' An Approach to the
Original Sta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Yuo Yanling(46)
Interest as a Medium of Economy and Morality Zhang Haishan(50)
A Written Discussion on '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s an Industry in China'
..... (57)
A Review over ' A Study Series of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e Delta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Wu Fuguang(72)
Mr. Sun Zhongshan' s(1866- 1925) Concep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Spanning
Historical Stages Duan Yunzhang(75)
Mr. Hu Shi(1891- 1962) and Mr. Kang Youwei(1858- 1927): Their Academic
Relations Zhao Lidong(84)
On the Study of Historic Document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265- 556)
to the Tang Dynasty(618- 907) Qu Donglin(92)
A Talk about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raditional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 Lan Yong(99)
On Aesthetic Ideology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eory
..... Tong Qingbing(105)
Mr. Chen Yinke' s(1890- 1969) Affection of Changsha as an Old Home Town
in His Poems Chen Shuliang(113)
The Chinese Study in India Yu Longyu(120)
Main Points from the 1999' s Guangdong Doctoral Forum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Xu Guorong(124)

网络经济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 乌家培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10)

[关键词] 网络经济 由来 特点 因素 影响

[摘要] 网络经济可从经济形态、产业、企业、居民消费等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它对经济理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有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05-07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 of 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

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

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 1998 年总收入为 3014 亿美元,①超过了能源(2230 亿美元)和邮电(2700 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 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 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 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 120 多万个;从 1995—1998 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 174.5%;1998 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 1000 亿美元。②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 1990 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 3 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 400 万美元创业,经过 4 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 400 亿美元,增长 1 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 40 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

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

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 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 24 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 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 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 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 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

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 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 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 世纪头 10 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 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③而且创造财富快。④近 3 年(1995—1998 年)来,美国经济增长

有 35% 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⑤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 90 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 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 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 18 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 60 年代以来已持续 30 多年,预计还会持续 20 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 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 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⑦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

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 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⑧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⑨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⑩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⑪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

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 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

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 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

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率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 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 A·W·菲利普斯于 1958 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推翻了失业率与通胀

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 90 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 年和 1997 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 1 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 30 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 5 年内提供了 1500 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 24 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 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正像工业与工业化熨平传统农业生产季节性波动一样,信息业与信息化熨平了传统工业(汽车业、建筑业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由于创新的产生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因此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每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约平均间隔 8—10 年爆发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反危机措施,使经济周期变形,危机持续时间缩短,萧条和复苏之间的界限因经济上升加快而不明显,高涨时经济发展劲头不强。于是,出现了经济衰退与经济高涨交替更迭的简化经济周期说。以美国经济为例,自 1991 年 4 月走出二战后第 9 次衰退期以来,经济高涨已持续 8 年半了。

怎样解释美国经济周期这种新变化呢?当然,这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90 年

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经济周期进一步变形。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信息技术无疑巩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⑫在美国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的产业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周期性产业,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美国 1995 年和 1996 年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陷入萧条时,适逢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结果促进了经济再高涨。随着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则会更有利于延缓衰退期的到来,而使经济继续趋向高涨。但是,经济周期波动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在一定条件下,高技术及其产业也有衰退的可能。何况经济周期波动不仅仅是由技术与产业的状态所决定的。在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相互影响加剧、彼此依存更加紧密的环境下,发生经济波动是很难避免的。●

①1995 年还只有 50 亿美元,3 年就增加到 600 倍,在 1998 年网络经济的 3014 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 1020 亿美元。

②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 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 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③例如,美国 90 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 60 年代的 2 倍,是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 4 倍。

④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

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 年 3 月 6 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 1998 年每小时增加 210 万美元。

⑤见人民日报 1999 年 6 月 24 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

⑥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5 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⑦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 1998 年,在国际互联网 1.3 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 1000 多万,占 7.8%,而发达国家有 1.2 亿,占 92.2%;在发展中国家每 440 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 6.8 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⑧《斯大林文选》(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95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3 页。

⑩世界银行 1998/1999 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130 页。

⑪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30 页。

⑫参见《与高技术产业息息相关的新经济周期》,参考消息 1997 年 5 月 13 日。

责任编辑:韦 前 湛 明

现代公司理论及其形成背景*

——兼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区别

□ 毛蕴诗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现代公司 形成背景 核心问题 企业家 职业经理

[摘要] 本文从“雇主的企业——企业家的企业——职业经理的企业”的演变过程出发,区分三种企业的不同特征,探讨现代企业的内涵与现代公司理论形成背景,述评现代公司理论的核心问题——所有权与控制权关系的五种主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经理行为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股东权益理论与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的主要内容与不足。最后在分析讨论中,特别就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不同角色进行了识别。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12-09

一、问题的提出——什么是现代企业,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区别何在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进入企业体制创新、体制转换的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摆在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管理人员面前的重要任务。然而考察相关的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对于现代企业的特征,对现代公司理论的讨论未能以现代企业的形成过程为背景。人们讨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并未真正识别什么是现代工商企业,或者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明白无误的概念。于是人们从各自的理解去讨论问题,对企业理论所相应的企业特征、时代属性模糊不清;对于现代公司理论本身及其进展未能很好把握。这些不足不仅未能很好地为企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甚至带来许多概念上的混乱。例如,对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职业经理,对企业家与职业经理是否有区别以及如何区别等并不明了。不仅在报告,在官方文件中,而且在大量的理论

文献中,一些人把企业家与职业经理混而为一,频繁地交替使用。

本文从“雇主的企业——企业家的企业——职业经理的企业”的演变过程出发,区分三种企业的不同特征,探讨现代企业的内涵与现代公司理论形成背景,述评现代公司理论的核心问题——所有权与控制权关系的五种主要理论的内容与不足。最后就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不同角色进行识别。

二、雇主的企业——企业家的企业——职业经理的企业

尽管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制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也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在有关著作中,公司基本上仍是被视为一个生产单位,公司理论也就停留在生产理论之上。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系统地研究了现代工商企业兴起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理阶层与经理式的资本主义。这为我们讨论

*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资助项目。

现代公司理论提供了背景。

钱德勒在考察了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历史,论述了企业经由“雇主的企业(owners enterprise)——企业家的企业(entrepreneurial or family enterprise)——经理的企业(managerial enterprise)”的成长历程。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时期,公司本质上是个人企业。其特征是:公司规模不大,是一种单一单位的企业,一般只生产单一产品,只有单一决策机构。在这种情形下,出资者(老板)管理公司。即使是合伙企业,其股权还是由少数人或家族所掌握。这种单一单位的企业极少雇用两三个以上的管理人员。这种企业可称之为雇主或老板的企业。

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现代工商企业。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工商企业在美国的成熟期,到20世纪中期,现代工商企业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在传统的企业,即雇主的企业向现代工商企业过渡的过程中,还出现钱德勒称之为企业家的企业和家族式的企业。

在企业家的企业或小型的封闭公司中,股东往往是创业企业家的家族成员、朋友和关系较深的商业伙伴,因而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密切的监控,以保证企业能对股东的利益负责。历史上,企业家的企业、家族的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发展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家及其合伙人无法从事全部管理工作,中下层管理甚至一些上层管理要由支薪经理担任。但是,在企业家的企业中,创业者、出资者基本上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

随着企业家的企业的规模扩展与所有权分散,企业转化为经理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股东不再可能从事高层管理,也缺乏从事高层管理的技能、知识。支薪经理既从事短期经营活动,也

决定长期的发展。钱德勒认为,“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正是企业家自己所创建的新机构与制度,其管理方式及其所实现的功能,导致了企业家自己退出这个舞台,并成为以后企业继续成长与竞争的基础。

家族企业要么是由于经营不善而消失,要么是过渡成为公众公司。世界著名的冠以家族名称的大公司,比如美国的福特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柯达公司、杜邦公司,欧洲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西门子公司、飞利浦公司、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以及日本的松下公司、三菱公司、日产公司,其家族所占有的股份已很微小,家族成员也退出了上层管理的历史舞台,而成为典型的公众公司或现代企业。

由家族企业向现代公众公司过渡有短有长。一般而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难以超过三代或四代。当然也有极少数公司延续了更长的时间。例如,莱维——斯特劳斯公司、罗思柴维尔家族、杜邦公司等是延续了6代或7代的家族企业。杜邦公司1802年创立,由家族控制和管理了170年之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专业管理层接管。考察中,我们发现,延续较久的这些家族企业,它们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严格遵守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使其部分地具有现代工商企业的特征。其中一条规则是,除非和其他非家族成员的雇员一样,甚至更为能干和勤奋,否则,家族成员不可在企业中工作。例如,杜邦公司的男性成员都可以在公司得到一个起步工作,5年后由4至5位家族长者对其表现进行仔细评价。如评价表明其10年后难能成长为高级管理人才,他就会被要求离开公司。

1963年,有关美国200家非金融公司的研究表明,没有一家公司的股份被某一个人、某一家族或某一集团掌握80%以上;没有一家公司是由某一个人所控制。200家公司中只有5家公司是由某一家族或某一集团通过掌握50%的股份,从而以多数实现控制;在另外的26家公司中,则由某一家族或某一集团通过掌握10%以上(但少于50%)的股份,或者利用控股公司或其它合法手段从而以少数实现控制。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即84.5%是由经理控制。这些公司中有5家公司的家族的确仍然具有影响力,但这是由于该家族成员作为职业的支薪高级主管,而不是他们所握有的股份。因此,到本世纪50年代,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行业中,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在那些现代多单位企业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行业中,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压倒了家族式的资本主义或金融家的资本主义。(钱德勒,1977)

同样,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在美国乃是一种涉及领域不广、存在时间不长的现象。曾经为生产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为新的销售和采购组织的建立提供或筹措资金的金融家在董事会的影响力在下降。当时美国工业企业的利润较大,可以作为内部筹措资本的来源。在少数几家著名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艾利斯·查默斯公司——中,来自金融界的外部董事人数要比来自管理阶层的内部董事多。但在大量的食品企业、机器制造企业、化学企业、石油企业、橡胶企业和原生金属冶炼企业内,外界金融家在董事会中只占极少席位。除了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少数几个例外外,经理人员很快在那些原先是金融家具有影响

力的企业中获得了指挥权。

作为一个概括,表1列出了三种不同企业特征的比较。今天,三种不同的企业形态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存在着不息的由雇主的企业向企业家的企业,向职业经理的企业的演变过程。

表1:三种不同企业的特征比较

	雇主的企业	企业家的企业	经理的企业
出资者	雇主	企业家及少数商业伙伴	众多的股东
创业者	雇主	企业家(工业资本家)	早期的出资者
企业规模	较小	较大、大	大
企业结构	单一单位	较多单位	多单位、多元化 (业务 地域) 层级结构
筹资方式	内部积累	主要是内部筹措	也利用公开市场
企业控制者	雇主	企业家、出资者	经理阶层
支薪经理	少量中下层管理	中下层、部分上层管理	全部管理工作

三 现代工商企业与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

从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日起,由出资者担当管理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不能满足企业管理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企业的数量与规模的扩大,逐渐形成对经理,包括对高层管理人才越来越多的需求,并形成了职业阶层与职业经理市场。

兼并的过程把更多的专业经理带进了高层管理。在新的通过购并而形成的企业中,股份分散到各组成公司的出资者、金融家以及促成合购并的发起人手中。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筹措资本渠道增多,股份的持有进一步分散。家族成员除非本身受过职业经理的训练,

否则他们很难在高阶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家族作为现代工商企业建立的受惠者,作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主要受惠者,他们本身不再介入总部机构的经营活动。

一方面是资本、股权越来越分散,另一方面是专业经理越来越集中于公司。历史上,现代企业的形成、发展、成熟是与职业经理的形成、发展、成熟相一致的(钱德勒认为,从横向合并向纵向合并的发展,使美国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经理的企业。同样与上述发展相一致)。经理阶层的形成与成熟有两方面的标志。一是职业经理协会、管理专业协会、会计师协会等的发展;另一标志是工商管理教育的普及,如商学院、管理学院以及后来的工商管理(MBA)教育的发展。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其全新的管理方法得到了迅速的推广,职业化的经理阶层逐渐形成。

四 现代公司理论是面向经理的企业理论

早期的雇主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企业由所有者控制,各所有者目标明确,就是追求利润。在早期的公司中,出资者与经理的工作统一于雇主式企业家,因而不存在经理的激励问题。即使是在企业家的企业中,由于作为高层经理的企业家(亦是出资者)对企业的密切控制,也不存在出资者与经理之间在企业目标上的冲突。

然而 30 年代以来,明斯(Means)等为代表的研究表明,股东所掌握的股权,在公司中特别是在大公司中变得极为分散。因此,出资者对支薪经理所行使的控制、约束与监督明显弱化。

大多数大公司的所有权与上层经理的管理相分离,带来了一个对所有者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使作决策的经理关

心所有者的利益而不是经理与其他利害关系者的利益。因此,现代公司理论是面向“经理的企业”的理论,是有关所有权与控制权关系的理论与相应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问题。现代公司理论重点是研究出资者、经理以及其他利害关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解释现代公司上层经理的行为,及其如何对其它的公司资源的贡献者负有的责任问题。对此,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不同的理论要点。

(一) 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al—Agent Theory)

对管理自主权的认识引发了对经理致力于利润最大化行为所处条件的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被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中的一个特例。该问题可以表述为:当称之为“委托者”的某人或一组织,雇佣了另一些被称为“代理者”(如经理)的人为其行事,有关的行为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但是委托者对上述行为并不完全了解。

委托—代理理论试图提出统一的出资者和新古典理论中经理的弱点。它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中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试图在不对称信息、有限的合理性和道德风险的框架下形成规范的分析模式。由于经理从事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他们比出资者拥有更多的关于公司绩效的信息。此外,经理也不可能总是按照委托者的最佳利益行事。甚至对于严格的契约,代理人也可能背离委托者的利益,因为合同的有效性受到有限理性与道德风险的约束,同时,经理还可以控制有关合同实施方面的信息。

(二) 经理行为理论 (Managerial Theories)

该理论认为,经理往往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利润。组织的松

懈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与之相关联的概念是 X-效率,即最佳绩效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差异。对上层经理非利润最大化行为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即销售最大化与费用偏好。销售最大化观点可见于鲍莫尔(Baumol)提出的一定利润水平下的销售收入最大化模型。

鲍莫尔认为,由于现实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存在各种困难,也由于其不可行性,企业目标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在实现一定利润水平下,尽可能扩大其销售收入。其原因首先是,销售收入也是衡量企业活动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销售收入的增长表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能力得到加强,并成为企业活力的象征。其次,经理自身的利益及其追求的目标也决定其倾向于增加销售收入。经理的薪金、地位及其他报酬与企业经营规模的关系,常常比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经理就可能更关心销售收入。上层经理的非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第二种观点从权钱偏好出发对经理的自主行为作出有效而细致的分析。这一理论由马瑞斯(Maris)提出。他认为经理有三个支配性的动因:收入、地位和权力,而威廉姆斯(Williams)还认为收入、地位、权力由于公司规模扩大而得以增强。还有与此相关的观点,强调诸如安全、创造性、竞争能力和对策方面的动因。威廉姆斯认为,上层经理的目标(即经理的个人目标)包括:(1)薪金加上其他形式的补偿,例如豪华的办公室;(2)向经理汇报的人数与地位;(3)对投资的控制。

鲍莫尔与威廉姆斯的模型存在若干不足。对于外部人员来说,难于识别销售最大化、管理松懈、经理自行作主的投资和过多的管理办公费用等。例如,过多的广告费用也许是厌恶风险的经理为

减少不肯定性所作的努力。

(三) 决策的行为理论(Behavioural Theories)

决策行为理论强调决策过程而不是目标。有关观点可以追溯到H·西蒙的令人满意的决策理论。行为理论认为公司极少由某个人进行决策,而是由具有不同目标(如市场份额、研究、利润)的群体、部门组成,因而在组织决策的能力、信息、目标等方面存在局限与冲突。

Cyert & March 对行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认为公司是个人与组织的集合体,个人与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不断的讨价还价过程,以获得有关业务范围、特殊政策和报酬的承诺。这一讨价还价过程并不排除管理组织之间的冲突。销售目标要求定低价,而利润目标希望定高价。销售和生产方面偏好高投资,而从利润考虑则希望低投资等。Cyert & March 认为可用如下方式处理冲突:(1)给定合理的界限,制定令人满意的目标而不是最大化目标;(2)组织松懈的存在(现有资源与必要的需求的差距)允许改进某一目标而不致于损害另一目标;(3)运用规范的程序可以缓减冲突的程度。

(四) 股东权益理论(Shareholder Capitalism)

股东权益理论的观点认为,股票市场通过对绩效差的公司进行接管而有助于改进公司绩效。然而,上述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缺少经验研究的支持。

研究表明,收购伴随着被收购公司的股价上升往往说明被收购公司曾经是低绩效的。但平均地看,被收购的公司似乎与非被收购的类似公司有相同的绩效。研究还表明,是公司规模,而不是绩效才是对收购的最好的(抵制)防御。因为往往是大公司收购较小的公司,这意

味着,如果上层经理要保持公司独立,最好的策略是成长最大化而不是价值最大化。但这些在前几十年尚能成立的观点,在80年代随着沉没的股东权力重新回到股东手中而受到挑战。

80年代由于世界第二次大的石油价格变动的冲击,市场全球化与竞争加剧,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许多老牌的综合性大型企业发现,其在数十年前制定的成长战略因过分僵化而不能对迅速变动的企业环境作出反应。由于这些老牌的综合性大型企业的绩效低下,它们愿意让股东行使权力,也愿意让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 Out)。

这些趋势增强了出资者的权力,并体现为80年代企业经营的三个特征:(1)缩小规模,减少工资支出而给股东更多的收益分配;(2)以低工资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为特征的灵活工作制度;(3)公司报告强调股东最大化收益的重大转变。与上述三个经营特征有关的管理决策至少在短期获得了回报,导致了公司股价的上升。但是缺少有关长期绩效改进的证据。美国管理协会对547家缩减规模的公司的调查表明,有56.5%的公司未能达到改进盈利的目标;大多数公司在一年内又重新雇佣雇员;雇员生病增多,客户抱怨也增多。一些公司的例子则提供了短期利润与长期财富创造之间的明显冲突的例证。80年代初,有的公司由于缩小规模和投资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资本回报水平。但是80年代末,那些经营公司的人不能真正使公司成长;他们既无耐心也无技能。过分地缩减规模,在雇员的忠诚与承诺方面付出了代价,特别是在白领阶层及在加大留用雇员的工作负担和压力方面付出了代价。

(五) 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Stakeholder Capitalism)

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认为公司有重要的义务来平衡股东与其它利害关系者,特别是雇员、债权人,也包括供应商、客户和更广泛的社区之间的利益。按照布莱尔的观点,利害关系者是那些为公司专用化资产作出贡献,而这些资产又在公司中处于风险状态的人和集团(Blair 1995)。如果说股东权益理论是以传统的英—美(Anglo—American)观点为代表的话,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则在日本和欧洲受到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1995年由许多公司资助和皇家艺术学会出版的报告《明天的公司》评论道:“那些将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是较少强调股东利益和财务效果的公司,是着重在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关系上,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其目标与绩效”。

凯(hohn kay)教授在其著作《公司成功的基础》(Qxford 1993),休顿(Will Hutton)在其畅销书《我们所处的状态》(Jonathan Cape 1995)中对每个人在财富创造中的利害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这两本著作均认为,财富是由组织在一起工作的团队共同创造的,这些组织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其激励系统认同有关人员的基本权利与关系。两位作者强调企业植根于社会,支配企业行为的价值观也不可能与业务活动分离。企业无论大小都是通过一个合作的网络起作用,自私行为有损企业职能,而关系则通过信任与承诺而凝聚。休顿和凯的思想要点是:当公司与有利害关系的每个人都建立起长期的关系,这些公司是最成功的;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股东、雇员、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和社区。布莱尔(Blair)认为,当公司经理的职责是最大化企业总的财富创造,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价值时,经理人员就必须重视公司的决策和行为对所有利害相关

者的影响。

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与股东权益理论相比有以下优点: (1) 较长期的承诺使雇员有较强的动因将时间精力投资于公司内有价值的技能; (2) 把雇员视为团队的一部分, 让其参与公司战略决策有助于创造——合作环境, 并能使面临困难决策(例如裁员)时得到雇员方面的支持; (3) 相互持股使客户和供应商等的长期承诺关联起来, 并使之顾及一些数年后才可收回的投资; (4) 股东, 特别是银行对于公司的承诺, 使公司在遇到问题时能尽力去找出问题, 而不是像在英、美一样只是出售其股票。

对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的批评有以下方面: 该理论难以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英、美资本主义。日本、德国的经济并非英、美经济的未来模式。迅速的技术变化将大大加剧全球竞争, 在迅速变动的世界, 成功在于公司能迅速变动其产品结构与方向, 公司既不期望也不愿意长期雇佣雇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90年代成长起来的所有新的大型企业, 诸如微软(Microsoft)、网景(Netscape)和奥诺克(Oracle)均出自于美国企业文化背景, 而不是来自德国或日本。更具体的批评有以下三点: (1) 相对于股东有明确的产权关系而言, 利害关系者的权利不明确; (2) 从空间看, 该理论适合于德、日式经济, 适合于大的、过去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产业而不是新兴的下一世纪的产业; (3) 假定英、美银行会像德、日银行一样帮助公司制订长期计划。

五 进一步的分析与例证

古典经济学严格假定: 公司生产单一产品, 追求最大化利润, 只有单个的决策机构, 而劳动力被雇佣或解雇只是对公司产品所能接受的价格的反应。然而

现实世界复杂得多。优秀的公司都知道, 要为客户提供良好服务并关心雇员, 才有利于公司长期生存与发展。但是如果派息和股价不能持续上升, 上市公司会受到严重惩罚, 公司会被迫声明其基本目标是增进股东的利益。简言之, 财务指标压倒其他一切指标。

其逻辑依据在于投资回报是通过买卖资产而不是开发核心业务。相反, 利害关系者权益理论建立在依靠合作、承诺与信任来创造、增加财富的基础上。

基于上述考虑以及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不同动机的职业经理所控制的事实, 必须认真考虑公司仅追求单独的利润目标的程度。信息的不对称使现实中所有者不能对上层经理的自主权有多大约束。因此, 上层经理的行为远不止是简单的利润最大化所能解释的。90年代以来,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并对公司治理所涵盖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过去人们只是将公司治理狭义地理解为有关董事会的结构与股东在董事会决策中的权利。今天, 人们对公司治理有了更为广义的理解。例如, 布莱尔(Blair)认为它是“一种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有机整合, 这一整合决定上市公司可以做什么, 谁来控制它们, 这种控制是如何进行的, 它们从事的活动所产生的风险与回报是如何分配的。”

80年代初, 美国对所发现的代理问题作出了更多的报道, 在此压力下, 许多公司为减少所发现的阶段代理差距而进行重构(Restructuring)。研究表明, 美国的企业重构压力比德国要大, 企业重构行动也比德国企业要早。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美国出现了“因机构持股者觉醒”而将通用汽车公司、IBM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业绩不良的公司董事

长、总裁赶下台的一连串“地震”。沉没的股东权力重新回到股东手中。股东压力是美国企业竞争力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轻视资本收益率,重视市场占有率或增长率一直是日本企业的经营特点。日本企业在东证一部上市公司的 ROE(Return On Equity, 表示税后利润分配给股东比例的指标) 平均为 4%, 远低于美国的 14%。如果剔除日本和美国的利息差、税率差的影响,日本企业的 ROE 可达到 9%。但和美国优良企业的 ROE20% 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而在日本,由于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许多老牌的综合性大型企业破产和出现生存危机,这促使日本学者对企业目标,对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和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重新思考。日本学者于 1995 年曾以分布于制造、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并在东证一部上市的 156 个企业为对象展开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表 2 表明,日本企业在目标、战略、成果分配结构方面发生了以下变化:(1) 对市场占有率的重视程度显著地降低,得分平均值由 1.54 减至 0.87;(2) 越来越重视总资本收益率和 ROE,得分平均值分别由 0.29、0.18 升至 0.56、0.80;(3) 对增长率的重视程度也逐步降低,得分平均值由 1.32 减至 1.05。

日本企业过去之所以重视市场占有率,是基于产量的累积增加,单位产品成本会相应降低这种认识。最近的研究表明,市场占有率不是持续保证企业利润的源泉。成功企业的高市场占有率,其实源自成功的创新。日本企业经营目标优先度的变化是和上述认识相吻合的。

企业如何认识包括股东在内的多种利害相关者的影响力,是完善企业治理

结构的关键。如表 3 调查结果所示: 股东的影响力逐渐地增大; 银行逐渐由企业的统治者的角色, 蜕变为企业的合作伙伴; 工会的影响力显著地降低; 而顾客仍保持最大的影响力; 社区团体的影响力显著地增强。

表 2: 经营目标优先度

经营目标	经营目标 得分平均值	经营目标 得分平均值
销售收益率	1.6	1.79
市场占有率	1.54	0.80
增长率	1.32	1.05
安定性	0.69	0.63
总资本收益率	0.29	0.56
多角化	0.29	0.27
ROE	0.18	0.80
PER	0.03	0.05
其他	0.07	0.05

(数字是经营目标排首位得 3 分、第 2 位得 2 分、第 3 位得 1 分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 寺本义也, 日本企业治理结构, 生产性出版社, 1999 年。

表 3: 日本企业利害相关者的影响力的变化

利害相关者	将来得分顺序	过去得分顺序
顾客	1	1
地域社会	2	8
供应商	3	3
相关企业	4	9
国内结构投资者	5	10
公司员工	6	2
政府	7	7
个人股东	8	11
海外机构投资者	9	12
银行	10	6
同行	11	5
工会	12	4

资料来源: 同表 2。

六、认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区别

本文对不同企业特征的分析, 对现代工商企业的界定, 以及对出资者、创业

者、经理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讨论。这为区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提供了基础。

(1) 从不同方面区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的作用有相同之处,如职业经理也可能从事企业家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或(价值增加的)创业活动,承担与企业家相似的决策风险,而企业家也在从事经理承担的管理工作等。但作为职业经理与企业家存在若干重大区别。首先,职业经理并不一定要从事企业所必须承担的投资、创业活动,因而也不必承担企业家的投资风险。当然职业经理会承担退出某一个公司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与企业家相比要小得多。同时,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存在较为成熟的职业经理市场,职业经理是易于流动的。与之相反,企业家因其往往与实物资产相联系,其流动是较为困难的。其次,企业家与职业经理是企业从诞生开始到其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角色。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其业务、组织结构也发生变化之后,企业家的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企业家的使命也就完成而转由职业经理控制企业。再次,从事上层管理的职业经理与企业家在进行重大资源配置决策方面有相同之处,而从事下层管理的职业经理的工作主要是执行决策。

(2) 现代企业的成熟与经理阶层的形成、成熟是联系在一起的。

(3) 新一代企业家与技术企业的出现及其高速向现代企业转换的过程。

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出现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保尔·艾伦

(Paul Allen)创建微软公司,杰布斯(Steve Jobs)与沃兹奈克(Steve Wozniak)共同创建苹果公司,以及在此之前的诺宜斯(Bob Noyce)、摩尔(Gordon Moore)和葛洛夫(Andrew Grove)创立英特尔半导体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具有超常速度的成长特点。正是这种高技术企业的特点促使微软这样的公司一开始就具有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例如,规模和组织单位的迅速扩大与增加,股东具有分散化的特点,并且往往迅速成为公开上市公司,由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层控制企业等(由比尔·盖茨的下一代来管理微软公司的可能性极小)。比尔·盖茨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正是像微软这样的一些企业,具有新型的现代企业特征,而使其与传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企业相区别。也使像盖茨这样一大批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管理的人才与传统的出资者和企业家相区别。●

参考文献:

1.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1997年。
2. (美)玛格丽特·M·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 S. Nickell, *Th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1995。
4. R. Cyert & J. March, *Behaviou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s, 1963。
5. R. Marris, *The Economics Theory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London, 1964。
6. (美)彼得·德鲁克,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韦前湛明

论提高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

□ 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国企改革 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 转换机制

[摘要] 发展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是改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的重要途径。与此相联系, 还将有力推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增强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和推动国有资产在全社会的优化配置。1999年5月份以来, 为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政府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 但由于上市公司良莠不齐, 有的重筹资, 不重改制, 导致股票市场难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21-04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 为了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 就必须着力改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而发展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对投资体制进行了改革, 即实行“拨改贷”, 导致财政与银行功能的错位, 企业新建和技术改造资金, 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 造成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持续上升。近几年来, 为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 国家把一部分“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 即通过实行“贷改投”, 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与此同时, 还逐年增加银行核销呆坏账准备金(1996年至1999年共核销1900亿元)。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为资金所困, 负债率居高不下。据有关专家估计, 如果将我国国有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到较为合理的水平, 即50%左右, 需要补充资本金3万亿元以上。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 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显然是支撑不了的, 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 其中最

重要的途径, 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况且,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直接融资的潜力相当大。以股票市场为例, 目前我国A股市价总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多, 而美国1995年的比重为84.1%, 日本的比重为70.3%, 英国的比重为170%, 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比重为90%左右。目前城乡居民6万亿元左右的储蓄存款, 则是我国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 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提高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

发展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地位和作用, 是极其重要的。股东“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机制和股东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 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的起点和终点。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过多地改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难以真正设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致使一些改制后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成为国有独资企业的翻版。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虽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但因片面强调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再加上国有股不能流通,证券市场尚待规范,导致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流于形式。鉴于目前国家股和法人股所占的比重过高,以及这部分股权又不能流动,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应适当降低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比重,提高公众流通股的比重。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在一个股权比较分散的资本市场中,国有股比重在一个公司中占30%左右,也不影响其控股地位。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法人交叉持股、机构持股以及吸引居民参股,适当减持国有股,将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规范运作,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还有利于增强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国有资产流动性差,是当前国有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有所为有所不为,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重点企业中,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新上市公司适当提高公众流通股的比重,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适

当减持部分国有股,非上市企业经批准可将国家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和部分资产有偿转让,这些政策措施都有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动性,推动国有资产在全社会的优化配置。公司制这一财产组织的重要特征,是产权的高度可转让性。即表现为财产资本化,资本票据化,票据商品化,这种产权的高度可转让性,表现在股权的自由转让和市场流通中。与资本市场发育相联系的股票自由转让,乃是股票对投资者拥有吸引力的重要条件。只有形成了股票的自由转让的组织与机制,才能有十分发达的股份公司制。股权的自由转让,使那些为了从某一公司中获得收益的投资者,得以通过购股而扩大其股权,形成控股,并通过控制公司的营运而享有和获取利益。产权的可转让性,是公司的重组、兼并和合并的重要条件。借助于股权的转让,通过参股、控股,实行兼并,可以对该公司的经营方向、组织结构等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这种性质的公司重组机制,又起实现竞争和淘汰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完善股票上市制度,是拓宽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选择。为此,自1999年5月份以来,中央政府接二连三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力图加快股票市场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证券市场法律地位的确定、《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股票市场发展前景的肯定、券商增资扩股、股票抵押贷款、第七次降低利率、券商允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券商发行债券融资、证券投资基金扩大规模、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包括法人配售)、三类企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上市公司)进入股市、储蓄利息所得税开征、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税以及刚出台的保险资金间接进入股市。从

数量上看, 这些措施远远超过 1996 年、1997 年大牛市的利好政策数量, 几乎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以来历年实质性利好政策的总和。

考虑国有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较低(目前只有 15% 左右,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50% 左右的比例), 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空间很大的现实, 1999 年 9 月 8 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首次明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三类企业, 除可参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 还可以参与配售股票, 放宽了对国有企业参与资本市场活动的限制, 使国有企业增加了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 为国有企业通过收购或控股调整自身结构、壮大资本实力开辟新的途径。在股票市场上, 人们对国有股减持配售, 可能更关注它的配售方案。但从更深层次看, 国有股“减持”更具有深刻意义; 从逻辑上看, 也是先有“减持”, 然后才有“配售”。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 部分国有资本应该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 向有关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国有经济应该追求控制力。但如何退出, 还没有破题。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则指出: 股票市场是国有股减持配售的突破口, 使股票市场的改革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国有股减持(包括配售)也称存量发行, 固然也消耗大量市场资金, 但它与新股发行扩容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能一概而论。股票供给如同商品供给一样, 单纯的总量增加会降低市场价格, 而在总量增加的同时进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 就未必不利于总体价格。新股发行只能增加股市总规模, 而存量发行将极大影响股票结构, 在增加流通股供给的同时, 有利于我国股市的规范建设和健

康发展。从宏观角度看, 国有股减持有利于解决我国股市根本矛盾, 真正实现“同股同权”。不可流通的国有股的大比例存在是我国股市的最大特色, 也可以说是市场所有问题的根源, 既不利于理性投资, 也不利于资源配置, 更不利于吸引外资。如果能将预定的新股发行计划额度部分转变为存量发行额度, 稳步推进, 在配售价格上坚持实事求是, 国有股减持配售甚至是巨大的市场利好。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实施债权转股权, 将会有助于推动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 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质量, 同时也将对股市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即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促进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首先, 实施债权转股权, 可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 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促使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样将会使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 成为稳定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其次, 债权转股权的顺利实施, 可以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加快不良债权的回收,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必将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第三, 债权转股权那部分资产, 经过一段时期的经营后,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将其变现, 收回资金, 这个过程原则上外资可以进入。这意味着企业股权结构将会发生变化, 投资主体将更进一步多元化, 使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合理, 这无论是对现在的上市公司, 还是对以后的上市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提升质量、促进长期发展的好机遇。第四, 实施债权转股权的上市公司, 可以利用这个机遇, 进一步理顺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 为购并重组提供有利条件, 使一部分上市公司通过重组重新获得生机。总而言之, 只要严格

按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注重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国有企业债转股工作就会起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

恢复征收利息税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通过征税调节居民储蓄的过快增长,将部分储蓄存款从银行分流出来,用于消费和投资,以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目前银行的存贷差已达1万多亿元,居民储蓄余额6万亿元,调动储蓄资金极具现实意义。国家应当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适当降低储蓄增长率,促进投资、消费与储蓄的良性循环。如果储户从银行分流一部分储蓄资金用于投资,不论是投资股市,还是投资债券,都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为了保护、调动投资股票市场的积极性,现行政策明确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均将股票转让所得税,作为资本利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大多实行的是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由个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要求纳税人将股票转让的所得和亏损统一计算出净收益,作为个人所得综合收入的一部分进行申报纳税。在我国一直实行对股票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这除了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无法对股票转让的净收益进行精确核算这一原因外,还因为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受各种因素影响大,经常出现不稳定和剧烈波动情况,为促使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对股民实行一种特殊优惠政策。

尽管股票市场的利好政策接二连三出台,股票市场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

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扬。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管理层对股票市场的功能,缺乏全面的认识。从理论上说,股票市场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或优化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指资源要向优势企业倾斜。但在我国股份制试点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实践中,人们往往把兴趣和着眼点放在筹集资金上,于是出现了把股票融资当作“圈钱”、“扶贫”、“解困”手段的倾向。客观地说,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优势企业所占比重并不大,劣势企业倒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择上市公司时,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优势企业上,其理由是这些企业日子好过,资金压力不大,因而较多地考虑发展有困难的企业,不仅把股票融资作为“圈钱”的手段,甚至把它作为缓解企业困难的政策性融资手段。他们为了使这些困难企业披上“合格上市”的外衣,就只能在“包装”上面下功夫,弄虚作假等现象在所难免。与此相联系,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还不是一个原来意义上的投资场所,进到这个市场的唯一的赚钱手段,就是做差价,不管长线短线,一定要做出差价才能赚钱,相信是没有人靠上市公司分红赚钱的。要做出差价就要靠股价的波动,可以说,股价波动是我国现阶段股票市场的生命。股价波动本身并不定能让大家赚钱,但给大家个机会,有机会的市场就有生命力,股民就有兴趣进来,新股就能源源不断地发出去。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股票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赖以健康发展的基石和关键。据统计,1994年以前上市的公司,1994年年终净资产收益率为14.6%,到1997年底跌至4.85%;1996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年底净资产收益率为21.99%,到1997年底跌至11.99%。股票上市公司经营

公有经济企业家： 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基点

□ 张景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河南 郑州 450052)

[关键词] 公有经济企业家 企业家 国企改革

[摘要] 长期以来,我们将公有经济企业家与一般企业家混为一谈,而不加界定,这不仅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企业家及其历史作用,而且也影响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深入推进。本文围绕这一点,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 国企领导人的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2. 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下,新型公有经济企业家的成长途径。

[中图分类号] F4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25-05

一、国企领导人的现状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对公有制企业家阶层的社会需求。然而对照前述公有经济企业家的素质条件,我国目前可以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太少了。在我国国企里,企业的负责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是作为企业领导人的角色而存在:

一是在我国原有企业体制中,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企业的领导者都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国企的厂长、经理们首先是作为政府官职而不是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出现,这使他们的社会价值不取决于经营绩效而从属于官本位,

企业领导人经营企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进入更高的行政序列。所以,他们只具有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冲动,不具备企业家应有的经济冲动素质。

二是以经营管理企业为专职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现代企业家存在的前提条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规范化的企业家制度也没有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阶层,所以,现有国企的厂长、经理们还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神韵。

三是经过多年改革,企业领导者虽然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由于国企由国家经过某种政治程序或行政程序直接创办或直接经营,同时,国企领导人还是以行政级别定身份由国家或上级单位

效益的下滑态势,是难以支撑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在股票上市公司的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坚持选优原则,不可实施“扶贫”政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9年9月

27日。

2. 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3. 许经勇:《重视发挥证券市场的特殊作用》,《南方经济》1999年第9期。

责任编辑:谭湛明

任命,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由国家作为企业家直接行使企业家职能,而企业领导人则处于执行性职能的地位,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决策和创新能力的不足。

多年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我国对公有经济企业家队伍建设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企业家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国企领导人的选择作用制度上,部分企业实行了公开选聘、招标聘任、选举聘任制度等多种形成的聘任制。但是,从实质上看,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刚刚开始,还存在以下诸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公有经济企业家的内涵确认问题。公有经济企业家具有特殊的内涵,并不能将其视为党政干部,也不能视同一般企业家。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实践中更应明确这一问题。

二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用问题。要突破“按行政官员的要求考核评价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思路,进行用人制度改革,使其树立明确的职业意识。

三是国有企业家智慧资本的投入回报问题。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企业家作为智力资本投入者,他们的智慧劳动应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予以确认,并取得相应的收益。

现代社会,国际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越来越强烈,竞争越来越激烈,是一个客观也是严峻的事实。而这种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就会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国,企业领导适应这种形势的只是少数,多数可能不适应这种形势。不仅是经营管理能力不适应,一些人精神状态也不适应,如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缺乏奋

发向上的斗志和三老四严的作风以及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为国家谋利益的精神等。目前国企领导者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要靠学习和实践;精神状态的改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靠改革,以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为激励来推动。

二、公有经济企业家的培养与成长途径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实现三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最终要靠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公有经济企业家及其阶层是国企生存与发展之本,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载体。公有经济企业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振兴国有经济的重要环节。

在我国培养公有经济企业家、建设公有经济企业家阶层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建立健全公有经济企业家的产生、选拔机制。培育市场化、职业化的现代企业家。

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准确把握这个系统工程的真谛,必须把握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此,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理顺责权利关系,调动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客体。改革要由人来推动,改革的成果也要通过人的管理活动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选好、用好并发挥好企业领导者的作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队伍,是企业发展的关

键。企业改革的深入,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甚至包括企业改制,使企业经营状况好坏的差别拉大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的决策和企业经营者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一些调查显示,凡是搞得好的企业,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企业领导者和领导班子;凡是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多数是企业领导不得力造成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企业领导者和领导班子。因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加大政企分开的力度,为公有经济企业家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消除行政干预,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企业家不再受行政主管的制约,走职业企业家之路。

2. 要改变国企领导人委任制,以消除委任制给企业带来的一些弊端,诸如挫伤职工积极性、加大改革成本、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等。应本着公平、平等的原则,以经营实绩考核选聘为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企领导人进行竞争性的考核选聘。同时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速度推进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来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3. 制定政策,尽快培育和建立公有经济企业家市场。针对目前实际,我们可从一些基础性工作入手,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逐步培育和建立企业家市场。第一,组织人事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从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任命和调动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制定原则和政策的间接管理,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企业经营管理者作出资格、行为规范和业绩标准,以及任职、流动程序等。第二,建立社会论证、评价服务和保障系统。要坚持客观、公正、平等、实用原则,

采用科学方法,尽快对现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作出资格论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任职、流动、辞职和退休权利保障制度。第三,加快建立公开信息、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的企业家市场体系。要改善企业家硬件系统,建立企业家人才库,同时完善政策法规,制止不正当竞争,把企业家市场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 (二)健全激励机制,为公有经济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者要求完善组织制度来确保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并最大限度地增值,而企业经理也需要有一种制度性的激励机制来为其运营资产和创造财富提供足够的动力。这就需要建立经济利益与品格评价相结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以是否依法经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考核依据,并将实绩与个人收入及职务变动挂钩。从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出发,构建对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好两个问题。

1. 将国有企业经理利益独立出来加以界定以使之利益相对独立化。从现实角度看,经营者利益独立化与硬化对经营者的约束与启动其长远发展动机直接相关。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职业经理是法人财产运营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他们不仅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而且会导致其“人力资本”的贬值,甚至职业生涯的终结。权责利的统一已包含着权力的独立行使、责任的独立承负、利益的独立享有。责任与义务间对称配置并通过这种配置来明确组织角色的责权利界区,是组织设计的基本要求,也是组织高效运作的基本前提。

2. 界定并提高国有企业经理人员

的收入以使之与经营绩效挂钩,企业家的劳动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的付出,应有相应的利益刺激来支持,公有经济企业家也不例外。提高并界定公有经济企业家收入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收入形式的组合来保证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塑造其企业家的“角色人格”,进而为其提供足够的和持久的动力。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对国有企业经理实行年薪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从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情况看,企业家经理年薪主要由基薪收入(基薪工资)和风险收入(效益工资)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是由本地区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决定,后者则根据企业当年完成的超额经营指标的幅度(利税、资产增值)决定。然而,目前的年薪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经理行为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承认国有企业经理的劳动贡献和风险报酬计量不同于企业一般职工,其用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者和执行者,他们承担着很大的经营风险和责任,其年薪数额应当在对经营效益提高程度、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综合考核的基础上确定,在其数量界限上不应人为“封顶”,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行得通。如有的城市政府规定风险收入不得超过基薪收入的一倍,这种有限激励的年薪制很难构成对公有经济企业家的有效激励。所以,从根本上解决经营者动力和对企业的责任心问题仅仅靠年薪制还不够,还必须探索股票期权或剩余索取权等分享形式,为他们注入长期动力。在这一问题上应总结十几年来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一出名一落马的经验教训,在制度设计和产权安排上解决好经营者风险责任与收入的对称性和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性。近几年来一批有影响的企业家“夭折”和“落马”除有个人素质、道德

方面的原因和缺乏有效约束外,激励与其付出、风险的不对称也是造成其行为扭曲和行为“越轨”的重要原因。

(三)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规范公有经济企业家的行为,防止公有经济企业家的蜕化变质。

要强化企业家监督机制,形成内部股东(或职工)监督与财务监督、外部组织监督、法规监督与市场监督,以及个人自我约束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党管干部,应主要在选拔、有效监督与培养教育三个方面着力体现。

严于律己是公有制企业家自我约束的基本要求,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说明自律的重要性。但对企业家来说,监督更必要。

1. 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网络。对公有制企业家监督和约束必须是来自各方面的,主要有立法、群众、党内、市场和所有者等监督和约束形式。

(1)立法监督约束:国家应尽快制定有关企业家方面的立法,以法规或条例的形式规定公有制企业家所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职责。

(2)群众监督约束: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主体是全体职工。只有依靠全体职工,才能办好企业。特别是在公有制企业中,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必须坚持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一个国企企业家要真正做到自律,必须发扬民主,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作为群众的一员,自觉地把自已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不是高高在上。另外,在对企业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取由职工代表定期投票的方式,对公有经济企业家进行监督。

(3)党内监督约束: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职责之一是监督企业家不得滥用职权,从而使党组织成为加强和改善企

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发展的政治核心。作为一个党员,要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要认识到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是国有企业最大政治优势,是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发挥好了,所产生的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4) 市场监督约束:市场监督约束主要来自商品市场方面、资本市场方面和企业家市场方面。

(5) 所有者监督约束:国企股权代表必须尽快进入企业,履行其职能,从制度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 建立公有经济企业家风险抵押经营制。风险抵押经营是根据企业资产规模、利润基数确定抵押金额,将交纳风险金作为聘任企业家的条约之一。在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通过以国有股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委托或直接委托公有经济企业家负责对国有资产的实际营运,在企业中形成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目前并不纯粹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带有行政委托成分,因而国有资产管理部有必要对代理人的个人收入和财产加强监

督,增加公有经济企业家收入的透明度。公有经济企业家应该向自己的直接委托人申报登记自己的个人收入与财产,这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环节。

(四) 建立健全培训机制,提高公有经济企业家的素质。

1. 加大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力度。现有各类企业经营者,应是宏大的公有经济企业家队伍的重要来源,要把对他们的培养放到突出位置。通过培训学习等有效形式,使他们实现由执行型向决策型、生产型向经营型、单一型向复合型,即由传统意义的企业经营者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经济企业家转变。

2. 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公有经济企业家队伍培养的有效途径,培养复合型的公有经济企业家。首先是加强对公有经济企业家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企业战略意识及决策能力的培训,其次是采用专题研讨班、研修班等形式加强对公有经济企业家岗位任职资格培训,最后是根据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探索其他新的培育公有经济企业家的途径和方法。●

责任编辑:谭湛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 杨春贵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 10009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历史命运

[摘要] 社会主义运动,总在曲折中前进。只要科学、准确而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未来的必由之路,必将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30-08

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世纪。在它的上半期,社会主义以其在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取得伟大的胜利而震惊了世界;在它的下半期,社会主义又以其遭受严重挫折、特别在苏东的失败,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种历史的沧桑巨变,在人们面前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西方敌对势力面对苏东剧变而异常兴奋,断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了;一些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正是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他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斩钉截铁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

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①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则是迂回的、曲折的。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走过了相当艰难曲折的道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经历了48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在法国则经历了86年的反复较量。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从建立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尚且如此,何况作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望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一帆风顺而不会经历任何曲折,是根本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挫折,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没有改变。当1871年

巴黎公社起义正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言:“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②40多年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武装叛乱而陷于十分危机的情况下,列宁坚定地指出:“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③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更是百般艰难曲折。民主革命28年历程中,几经挫折和失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人民打入血泊之中。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起来战斗了,并且学会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初,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燎原之火也几起几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根据地党和革命力量损失90%,白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但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终于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而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道路同样不平坦,小的曲折不算,大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困难,甚至使我们陷入严重危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从纠正错误中进一步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第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斗争就会有起伏,有波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挫折、前进与倒退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经历一个从没有经验到取得经验、从不太完善到比较完善、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一些错误,走过一些弯路,遭受一些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只能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道路,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从必然走向自由。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如果发生路线错误而不能切实纠正,或者发生严重腐败现象而得不到遏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就不仅会发生大的挫折,甚至会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前两条是客观原因,后一条是主观原因。只要主观上不发生大的问题,小的曲折虽然不可避免,历史大倒退那样的曲折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曲折,它们都只不过是构成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环节,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黄河有九曲十八弯,奔腾东去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要把暂时的挫折看成历史发展的结局,而应当如实地把挫折看成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看成是实现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环节,在任何挫折面前都坚定信心,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二,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尽量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曲折,把曲折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中的关键是搞好党自身的建设,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第三,即使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历史大倒退,我们也坚信,那里的

广大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经过实践的教训和认真反思之后,最后也会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的、痛苦的,但最终向这个方向发展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改变。

二、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④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⑤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的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⑥

总结经验,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方法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论去总结经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有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

第一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强调外因的作用。这一点,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有一场争论,即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在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种“总结经验”实际上是拒绝总结经验。因为革命初期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如果敌人强大我们就必然失败,那么我们就永无取胜之日。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驳。后来,他在哲学上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

分析。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8页,毛泽东写了很长一大段笔记来阐述这个问题,这些思想后来凝结为《矛盾论》“两种宇宙观”里面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在《批注集》中写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⑦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⑧可见,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关键是党的路线是否正确。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固然起了作用,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内部问题,是路线问题。从历史原因来说,主要是长期以来犯了“左”的错误,后来搞改革,又犯了右的错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巍然屹立,蓬勃发展,这又从正面证明,只要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任何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都不能够得逞。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关键是做好一件事,即自己的事。在南方谈话中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今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

部要搞好”。而共产党搞好,首先是共产党的路线要搞好。只要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我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即使出了一些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的问题。党在路线上发生了问题,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应当给予批评,不能含糊敷衍、不分是非,必要的时候甚至应当在组织上做出一定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个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一样。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里谈到我们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才能在批评错误时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党作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错误的内容、产生错误的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错误这样一些方面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指导方针。苏联人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39年中,他们一味地咒骂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认识上和体制上原因,以及全党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等,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更谈不到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这样他们就找不

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情况下,为机会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时期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的错误,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这些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认为那时候一切都错了,不能认为斯大林一切都错了,否则就不能解释苏联的经济为什么曾经有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为什么它能够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为什么能把原来比较落后的俄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否定一切,只能导致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对苏联的模式,即30年代苏联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一方面,这种体制确有弊病,必须改革;另一方面也应当如实地承认,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的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完全不是采取苏联人的那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包括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决议》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又明

确地肯定,“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一方面指出,原来的那个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总之,总结经验要讲两句话,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三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⑩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性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⑪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比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周密、更细致地勾画出一套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解答社会发展史的钥匙,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进而以这个—般规律为指导,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从而找到并唤醒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⑫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

的理性、正义等等原则出发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过去我们不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顾我国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国情,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片面地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后来实行改革,又大搞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在“真理多元化”的旗号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忽视民主,使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说明,不论“左”和右,都根源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⑬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状况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蓬勃兴起,欣欣向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转变。

(一)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⑭这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更新,是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解放。邓小平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

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⑮鉴于“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⑯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实现体制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⑰这种改革也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⑱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革旧社会基本制度之命,第二次革命是革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之命。两次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因为照搬了苏联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是因为我们自己搞了许多“左”的东西。这种“左”,不仅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还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和调整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⑲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⑳这个指导思想的确立,使我们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凡是超阶段的东西,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书本上说的也好,从来就这么做的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更不用说

单纯的主观愿望,都在破除之列!有些东西表面看来似乎很“革命”、很合乎“理想”和“道德原则”,但因为它们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只不过是“好听而不管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制度,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等等,之所以正确并必须长期坚持,全部的根据就在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三) 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发生的一个争论就是现行的路线和政策姓“社”还是姓“资”?有些同志囿于传统观念,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地讲坚持社会主义——明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硬说是搞资本主义;明明是束缚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却认为符合社会主义而加以坚持。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都有这种姓“社”和姓“资”的争论。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步履艰难。针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邓小平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①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和苏东发生剧变之后,“左”的东西又有所抬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认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采用,如此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1992年春天在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他明确肯定,“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丢。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④同时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勇于讲符合新的实际的、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⑤2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讲了许多过去书本上没有讲过的新话，例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等等。总之，20年来我们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也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事业。它只能在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奋斗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1913年列宁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针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一

些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发展过程，指出，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他并且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列宁这一预见的科学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蓬勃兴起、兴旺发达，必将极大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实现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① ⑤⑥ ⑩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139、234—235、118、3、292、265、370、237、269、252、372、373、369、291、225页。

②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732页。

③《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3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32、679页。

⑦⑬《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7、311—31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8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7页。

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209页。

责任编辑：冯 生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回顾与展望

□ 庞元正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北京 10009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

[摘要] 本文认为,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 这是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 则是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因此, 顺应时代发展之大势, 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完备的理论形态, 是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迫切任务。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0) 01- 0038- 08

一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 我的回答是,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 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 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 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 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 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 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 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 我们又去造

谁的反呢? 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 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 他提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 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 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 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 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 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 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 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 起点低, 加之人口众多, 人均资源有限, 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 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 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 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 中国解

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 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 在革命战争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造反有理, 那么, 在和平建设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 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 “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要发展自己……”^① 1987年, 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 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 “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 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 他明确指出: “从根本上说, 手头东西多了, 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还指出: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 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 可以说, 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 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 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 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理论。当然, 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 只有通过社

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 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 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 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③ 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 “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 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 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 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 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 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 “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竟然公然鼓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 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 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 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指出: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 但革命不只是搞

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⑤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⑥“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⑦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统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

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统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

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

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 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⑧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

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⑩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

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

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

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

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⑪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⑫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

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⑬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最后,这是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方面,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70%,占全世界国家和人口的 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之中。发展

成为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这又使发达国家面临一系列再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并正在由军事实力的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在发展中抢占先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尽领风骚。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都必须把发展作为首选的国策。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无可争议的主题。而这个时代主题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就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重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也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反映自己时代的特点、满足自己时代的要求。哲学要反映时代,最重要的是要反映时代的主题,建构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够反映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形态。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⑭19 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时代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日臻完备的革命哲学,为无产阶级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

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学术座谈会述要

□ 本刊特约记者 游艳玲

(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1999年11月29日,《学术研究》杂志社、《现代哲学》杂志社和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就获得广东省第六次(1993—1998年)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奖专著一等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高齐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探微》),联合举行学术座谈会。广东马哲史学界、哲学界的专家、教授近30人围绕《探微》研究的主要内容、阐述的基本

观点、运用的研究方法的启迪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的见解,概括、综述于后。

解放思想,冲击束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探微》一书的成果与获奖,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在于该书能够解放思想,敢于对长期束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人迷信与教条

与发展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成为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新世界提供指导当前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就势在必行。●

①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

②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254—255页。

③⑬《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⑤⑥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231、121页。

⑧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15页。

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

责任编辑:冯生

主义进行冲击,同时正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批判的本质,阐明恢复、发扬这个本质的迫切必要性与重大意义。《探微》深刻揭露了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四方面主要表现:第一,清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与神圣化的曲解,恢复、发扬其科学的、批判的本质;第二,改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哲学通论的偏向,揭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内容;第三,打破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如实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第四,纠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为领袖言论和现行政策作论证的做法,着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先导和为人们思想导向的作用。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是误解以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认识根源,是束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余少波指出:“我个人认为:该书对广大读者和理论工作者有启迪的地方,是作者根据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中柱也认为:“全书在‘清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式与神圣化的曲解,恢复发扬其科学的、批判的本质’上,下了很大功夫。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基础、方式和特点,特别强调这种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指出了‘个人迷信的教条主义’的荒谬及其危害,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思想。”

学者们还对《探微》作者的治学风范给予了肯定,一致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作出了贡献。余少波指出,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不为名不为利的人文学者精神,才敢于冲击个人

迷信与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陈家义也认为:“哲学家只有用公心才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改造世界。”

转变视角,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形态

不少发言的学者指出,《探微》的又一个显著特色,是在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转换。该书在这方面的突出特点是,贯彻一般与特殊相结合、严格的历史主义精神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既坚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际与马克思哲学演变的历史实际出发,又充分考虑当代新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由此,《探微》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形态的观点,充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该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或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原生形态在演变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历史时代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政治课题,受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传统的制约,再加上不同个人思想、文化素养差别的影响,衍化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又区分为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以及各个具体哲学形态。这就冲破了以往马哲史研究中那种宗派性、直线式的观察视角、研究方法,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线嫡传”的简单化内容。李恒瑞用历史分析的手法表达了新视角、新方法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我们过去的共同点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模式,然后先入为主,用它来图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列,甚至毛、邓。这是共同的、不变的模式,实际也就变成了对传统教科书合理性、必要性的说明和论证。

应该倒过来,真正的不要在任何的框架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理解可以不一样。这是马哲史研究的方法论应该注意的问题,不然的话,马哲史搞来搞去出了许多书,面目大体相同”。“面目大体相同”无疑道出了当代马哲史研究的窘况。陈家义也认为,正是由于研究视角的陈旧和方法的僵化,才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年轻人尤其是年青人中威信下降。所以李恒瑞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体系有一般的、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应该一脉相承地代表一般,但只有按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规律,把马哲发展史当作一个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而形式内容多样化这样一个历史来研究马哲史,才会具有理论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余少波也认为:“我们既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形态在本质上一致性,又要看到各种形态不同的侧重点和有差异的理论体系、逻辑框架”。

独立思考,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内容新思路

发言的学者认为,《探微》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体系的产生、形成与验证、完善的过程,着重阐释了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由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独立见解,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其独立见解主要有:一、认清所有哲学共同具有的一般哲学基本问题和具体哲学各自具有的特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所有哲学都必须回答的一般哲学基本问题,新唯物主义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前提下,自身要着重回答的特殊哲学问题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科学抽象,后者是

前者的具体表现,科学地解决前者是后者得以解答的根据、前提,前者的科学解决必须通过在各个特殊哲学中科学地解答后者才得以贯彻、实现。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辩证法)是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史上实现的最重大的变革,新唯物主义的内容是以其为核心组成的。三、新唯物主义的逻辑范畴主要由起始范畴“现实的人”、中心范畴“客体和主体”、最高范畴“实践”,三者互相联系组成。

学者们尤其高度评价的是《探微》一书对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本来面目的大胆而有力的尝试。乐志强指出,《探微》一书“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其中,尤为令人感奋的贯穿书中的一个深邃的思想,就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换一种说法就是:回到马克思,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实行,乐志强接着给出了回答:“回到马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某个时期,也不是简单地回到某一两部著作,而是要通过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他们制定和阐发的整个哲学原生形态的完整体系,并由此出发去研究一切问题。”邹永图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来展开阐释:“《探微》的成就同作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分不开的。《探微》给予的启迪在于,要做到按本来面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以下三个‘实际’出发:一是从马、恩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实际出发;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的继承和改造(批判和变革)的实际出发;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和解答的现实课题出发。总之,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有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又要有彻底的现实主义态度。”章海山认为《探微》作者的努力是对现实社会中不少人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力反击。另外,《探微》显示的对人的重视,更是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肯定与赞赏。刘卓红认为,对新唯物主义的这些探讨、阐释,“有利于消除哲学贫困、僵化的存在与表象,重塑哲学关心时代、关注人生,作为时代之精神的光辉形象。”

揭露问题与不足,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与会者在肯定《探微》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初步地揭露了该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就如何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与殷切的期望。李恒瑞认为《探微》把主客体关系看作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种新观点,但必须对主客体范畴和思维与存在范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梳理,并认真探讨恩格斯以思维与存在为基本问题有何意义,思考它是一般的、所有的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只是基本问题之外的另一个问题。余少波也提出:“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问题的一般与特殊如何表达,它们的相互关系怎样?”同时,余少波和章海山都对“现实的人”是逻辑起点还是现实起点提出了疑问,还提出了逻辑起点与现实起点有何区别与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体系有没有结构、层次等问题。

另外,邹永图还提出在新唯物主义范畴体系之中再加入一个基础范畴——物质,理由是:一、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这是新唯物主义与一切唯物主义的共同本性;二、“现实的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抽象化而言,人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三、从社会来看,任何社会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学者还对今后的哲学研究作出了展望和提出了要求。田丰提出,要把文化哲学作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主流,这反映了学者们对新世纪学术转向的新探索。陈家义则提出一个如何宣传、普及理论著作的问题,他说:“我觉得,《探微》对于学科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贡献;对现实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对群众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教育工具。但现在如何宣传、如何普及,让人们深入接受,还要作巨大的努力。”陈家义的话深深折射出学者的忧患意识。正如他所言,理论的研究与宣传是一个互动的体系,理论离开了宣传就等于离开了群众,理论研究也就会陷入脱离实际的恶性循环之中。接着,《探微》作者也明确表示,“《探微》的成绩与获奖,是广东马哲史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撰写该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冲击,提出问题,促进讨论,深化研究。由于本人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书中可能需要改正的认识比不需要改正的认识多得多。”●

责任编辑:冯 生

论经济与伦理的中介——利益

□ 章海山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经济 道德 中介 利益

[摘 要] 经济活动与非经济因素的道德必然发生联系, 两者的中介、结合点是利益。在经济的资本主义形态中, 由于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运行机制, 决定利益成为经济活动和道德评价的唯一共同尺度, 人际关系成为一种互相利用的功利关系。在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运行机制决定利益依然是经济和道德的结合点, 利益的作用既有一般市场经济中所应起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把共同富裕这一利益目标作为经济和道德的共同目标, 在于把利益作用限于经济活动领域中, 而不将它泛化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50-07

经济和道德两者在任何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必然发生联系, 生产方式不同, 两者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亦不同。经济和伦理的中介确实应从经济本身去考察, 但不能笼统地说是经济因素, 需要更为具体地寻找哪种经济因素, 寻找经济和伦理之间的共同尺度、结合点。这个共同尺度和结合点我认为就是物质利益, 利益是两个不同社会系列的范畴的中介。

经济的资本主义形态中的利益关系

人类从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劳动开始, 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够从事生产劳动。人与人在结成一定经济关系中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 它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以求得生存发展, 相应地利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 必然会发生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有冲突又有一致之处, 不然社会就无法前进。道德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 尽管它也有发生、演变、发展的进程, 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内容和形式也

有所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在人们经济活动中道德起着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起着一种协调的作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 有不同的利益关系, 也就需有不同的道德进行调节。利益成为经济活动和作为非经济活动的道德之间的联系纽带, 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在道德活动中利益则是道德所要调节的目标。

在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氏族)利益是一致的, 私有制使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矛盾。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 所谓共同利益, 实际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因而所谓共同利益就带有虚幻性和虚假性。因此,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不可避免发生冲突、矛盾, 对于个人来说, 所谓共同利益成了一种异化的东西, 成为一种外在于自身利益又控制自身利益的异己力量。对于个人来讲, 他对共同利益的道德评价是否定的, 因为共同利益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 实际

上共同利益以其特殊方式把各阶级的经济活动与道德相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私有制形式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直接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种经济形态中,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目的,不是以统治他人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为目的。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个人依附统治者,个人利益完全屈从共同利益,君主则成为共同利益的最集中最高的代表者。个人利益始终不成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往往被淹没在虚幻的共同利益之中。在道德的理论和实践上,把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以道德扼杀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的自然经济形态,不具备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它必然要被新的能够激发个人为争取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所代替。

利益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与道德联系的中介尤为明显和突出,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更加巨大,地位更加重要,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性所决定的。这种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要转化为他本人需要的消费资料,也要依赖于一切人的消费。交换渗透到一切生产关系之中,商品生产者发生互相之间的全面依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相联系、全面依赖关系,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亦发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没有的新的变化,可以说利益成了经济活动中道德调节和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

商品生产和交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特性是,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只是交换价值之间的交换,进行这一

过程的个人即生产主体只看作交换者,这是从关系的经济方面加以考察。本来作为生产主体的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却表现为物的关系,而且对于个人来讲又是异己的、不受他所制约的东西。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这是理解市场经济中利益在经济和伦理中的地位、作用的关键所在。

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表现为互相利用的功利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一切以对我有利、有用为道德的标准。功利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市场经济机制把利益归结为一切关系的最终目的。因为利益把道德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联系起来,它也揭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意义和道德活动中的经济动因,表明了经济 and 道德之间的联系。社会的道德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道德上的肯定或否定要依经济关系而决定。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互相依赖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这是合乎道德的关系。在经济活动中,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与公共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私利和公利的关系构成对经济活动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或依据。经济伦理观适应市场经济而提出,任何经济伦理都是为它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作辩护、作论证的。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生产主体,他的经济活动的动机或动因是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其目的不仅是维护、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赚钱,金钱就是私人利益在经济上的唯一体现。这种经济活动的动因是由市

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个人作为生产主体,他生产的产品是商品,目的是为了交换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的主体价值不在他自身而在被他所对象化了的物(即商品)。这就是说,主体的价值在于被他对象化的客体中,个人关心的不是他人而是物,他生产的商品能够卖出去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生产主体的个人在交换过程中,个人的个性、差异是不存在的,对买他商品的人的个性是漠不关心的,关键是等价物交换的实现。因此,个人关心的只是他的私人利益,唯一的愿望是实现他的私人利益。这种情况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它认为只有每个个人的私人利益得到满足,那么普遍利益也就得到了增加。因此,私人利益成为经济活动评价的唯一标准,成为经济伦理在道德中的唯一目标。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个人追求私利既可以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并且增加普遍利益,这是一种抽象的说法。也可以反过来说,每个人追求私利时都妨碍他人利益的实现,形成一切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况。因此,关键在于对“私人利益”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指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①私人利益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它取决于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个人私利的内容和形式由社会决定,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就有不同的私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不同的实现手段。

商品交换者互相用各自的商品为对

方服务,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每个人为对方服务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对方,而只是为自己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追求,使交换行为的双方出现这样的道德观念:每一个人只有先为对方服务,才能为自己服务,先作手段后作目的;每个人只有先确立自己的需要、确立自我,才能成为对方的手段,先为己后为人,先成目的后成手段;每个商品交换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为他人服务,又为自己服务。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在普遍意义中就是互相服务、互为手段,同时又互为目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互相服务的利益关系,产生出互利的道德观念,利益非常明显地成为两者的中介和连结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使自己的行为变为现实,取得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经济体制中,表现了个人只能为社会生产,只能在社会中生产;他们生产要通过物(货币)表现自己是社会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此,个人从属于存在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个人。个人经济活动的动因并非是共同利益,而是自身的个人利益。共同利益是通过个人利益与之对立的他人利益的交换中得到实现的,双方对立的不同的个人利益的交换成功,即表现为共同利益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利益不过是个人私利的一种交换,也是个人私利的实现,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只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对立是永远存在的,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又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为这种对立统一是有其深刻的物质根

源即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所以在经济伦理上既不能宣扬什么爱的原则(利他主义),也不能宣扬什么利己主义是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等等。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马克思主义不进行道德说教,不认为经济伦理可以改变经济体制,而是“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②

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利益关系

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利益于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在道德上也充分肯定利益对于调动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巨大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的物质利益,这是考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利益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动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充分地调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光靠英雄主义和热情是不够的,要使群众的热情、顽强精神体现、转移到建设中去,就必须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这就是说,经济活动需要靠经济利益来推动。在实施利益原则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包括道德等精神因素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认为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一动力,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要促进经济建设,还必须依靠非经济因素——道德等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存在利益和非经济因素道

德等与经济活动如何相结合的问题。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企业和个人均无争取自己利益的手段和机会。因此,当时利益原则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作用似乎也不大,尤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利益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占主导,道德上也就认可和宣扬这种利益分配的原则。可以说,无论是这种利益观念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概念对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越来越不适应,需要对此突破,需要有新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尤其在发展商品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作为经济和道德的中介的功能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内容、形式。

首先,明确确立关于社会主义利益范畴。

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即物质利益,它是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最基本的是物质利益。对“利益”这一范畴必须站在唯物史观高度加以考察,批判那种把利益视为人的观念、意志的产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坚持利益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表现和反映的唯物主义立场。利益或者说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利益是道德、宗教、哲学等的物质基础,利益与道德具有天然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有一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历史的发展的动力不是“思想”、“观念”,而是群众的利益或者说实际利益。“利益”高于“思想”,“利益”决定“思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

基础,利益又是经济关系的首要表现,又是经济活动的追求目的,利益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中的连结点的作用和地位是十分清楚的。道德完全服从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利益,道德就是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道德必然反映、服从人们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抽象的原则或精神,而是在争取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还必须看到精神(主要是思想道德)的重要性,它们对经济活动的指导、协调和制约的作用等,因为经济活动需要与高尚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追求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活动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因,才能使人不致沦为“经济动物”,有利于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

其次,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正确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这正是道德得以成立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已包含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机制,“看不见的手”必然地使人们互相依赖、互相服务,客观地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一致起来。同时,又驱使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他人的、社会的利益,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局面。当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矛盾具有对抗性质,依靠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的,道德只是为这种利益关系作论证和辩护的,原因在于这种制度的机制决定生产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为了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当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依然有矛盾,但不再是对抗性质,它们可以依靠社会制度本身调节和解决,道德

也是为这种利益关系作论证和辩护的,因为社会生产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发展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在我国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结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才真正得到贯彻实行,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集中得到体现。报告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社会主义建设目的真正认识和得到贯彻实行,才有可能解决好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并使两者协调地统一起来,从而使道德建立在真正的现实基础之上,利益在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道德发展的情况下把两者结合了起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相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使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上述的三个统一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只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加国家收入,又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不是社会主义,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得到极大的增长,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不仅是评价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价道德的根本依据。只有生产力发达的富裕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上述的三个统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的不断提高成为了评价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和是否合乎社会主义道德的唯一标准。这一结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这些关系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必须划清关心、提高个人利益同抛开国家、集体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界限,这个界限应由道德来划定。针对极“左”思潮否定物质利益、个人需求,需要强调物质利益,承认和关心个人利益,必须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奋斗。还需要注意到,我国经济上生产力不发达,还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影响、侵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关心和提高个人利益在道德上有二重含义:一是不能违反、损害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否则会造成两头都受损失。二是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是广大群众都应当做到的。对于先进分子则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和工业实行改革。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同时又须防止滥用自主权,导致只顾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道德来加以协调和制

约,需要道德来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逐渐同崇高的精神境界结合起来。改革是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较好结合起来的门路,在实践上找到这种三结合的门路,是对集体主义的一个有突破性的、根本性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表明,不能从实践上找到贯彻集体主义的门路,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实行是无成效的,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解决好经济领域中利益上贫富的悬殊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时期,如何使广大人民合理而公平地分配利益,提高效率又不致造成社会贫富差别悬殊,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没有很好解决,在道德上经常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资分配为主的市场经济有了根本的区别,然则按劳分配依然存在权利上的不平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合理地分配利益,存在着以经济因素为主还是以道德因素为主作为合理标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是所谓公平,即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应当齐头并进,所谓“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致使在经济政策上以平均主义为主,在道德上把平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象征,甚至视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并且有把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的倾向,损害了利益作为经济 and 道德中介的作用,曾经对经济活动和道德产生过深远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观上破除了形而上学,坚持辩证法;在道德上破除了平均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真正的公平,使利益在经济和道德关系中的作用明确起来。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利益合乎社会主义道德,进行分配决不能以平均主义为原则,必须以经济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为依据,

体现利益在经济和道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均,造成一定的贫富差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但是贫富的差别依然会存在,社会的经济也正在这种不平衡中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它的特殊性在于有先富与后富的差别,但不会造成贫富的悬殊差别,这在制度和道德上有所保证。因此,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利益得到多一些,生活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较快地共同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单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实现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评价的标准,这就是说,一方面,通过自己劳动收入先富起来,是政策上允许、道德上光荣的。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帮助还没有富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走向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造成两极分化,而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总之,共同富裕这一利益目标,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和道德结合了起来,两者都服从这一共同的目

标,利益的中介作用也就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这一利益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共同经济理想,也是共同的道德标准。

利益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和道德中的中介作用十分明显,它具有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共同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共同富裕这一利益目标作为经济活动和道德的结合点,尽量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两极分化。二是利益把经济活动和道德相结合的中介作用限于经济领域之中,不将它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因为将它泛化势必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把人们引向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自己的精神生活。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发生泛化现象,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体制下,利益作为经济活动与道德的中介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生活和道德的唯一的目的,往往使人成为一心追求利益的“经济动物”,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使得物的价值不断升值,人的价值不断贬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1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责任编辑:冯生

广东学者谈我国教育产业发展趋势

编者按:日前,本刊与广州珠江管理专修学院联合举办了“教育产业发展趋势座谈会”,省内教育、经济、行政部门的专家学者十余人应邀出席,现将部分发言发表如下。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57-15

教育本质与教育产业

□ 梁渭雄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0)

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牵动下,教育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90年代间,又掀起了关于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说,关于教育问题的这二次全国性讨论,大大推动了教育思想的解放,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实践的发展。而当前还在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发展。对教育的产业性的认识离不开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我在《现代教育哲学》一书中认为,教育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

产观而得出来的结论,是不同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第三种生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教育是具有生产性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的产业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和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愈来愈突出,教育的生产性、产业性也愈来愈明显。教育产业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和特点。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即从教育本质上来认识教育产业问题,才能从“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是消费事业”等片面的传统教育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推进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实践的发展。

当然,从根本上充分认识“教育产业”的同时,也必须认真研究认识教育产业的特殊性。或者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有效地引导教育产业的健康发展。在认识和掌握教育产业特殊性问题上,要注意考虑几个关系:一是消费性与投资性的关系。教育作为利用物品和劳务来满足社会和人们的需求的行为,具有消费性;同时,

它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是有投入有产出有回报的投资,是增进“人力资本”的投资。二是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既要认识它的公益性,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部分,又要了解它的市场性,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迟效性与高效性的关系。教育是人才的生产,人的培养,有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般地说,它的产出、回报和效益,是迟效的;但同时它的回报和效益是高效的,是物质生产的产业所比不上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对教育产业的投资。如战后的日本和欧美,在这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效果。这也是我们确立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明确发展教育产业目的 深化教育改革

□ 张铁明

(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400)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与以往我国其它领域的改革相比较,除了都有一个制度准备不足问题外,还有一个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教育产业论就是要科学地研究教育的产业性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进关系。教育产业论研究的目的,决不是象一些人简单理解的那样,纯粹是为了钱,为了收钱。事实上,这一理论初始的目的,也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其目的有四点:一是钱,为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费投入问题。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要现代化,没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作为基本支撑,单有现代化的观念,还是不行的;二是地位,为

教育正位,为教师正位,为知识的价值正位。当教育仅仅成为政治的附着物时,当教师仅仅是白食白喝了工农生产的成果的“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小资产阶级时,教育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重视,教师的经济地位也永远改变不了;三是效率,发展教育不仅要大量的挖掘教育资源,而且还要科学地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严重投入不足,但又浪费极大,其中有观念性浪费,管理性浪费,更重要或最突出的是体制性浪费,大学里“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以及“除了火葬场外,什么都有了”的现实描述,是太能说明中国教育的痼疾所在了。切去教育经费的非正规使用这一块,起码可为教育投入总量增加三分之一;四是机制,要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外协同机制和外部“场”的问题,即教育投入体制,教育发展格局,以及整个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问题。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及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已非常明确要把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产业来认识,要扩大教育消费,并由此拉动经济的发展。其中很重要而显然的主旨,就是要由此切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通过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投资消费教育的资金,来解决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又要扩大教育规模的矛盾,并支撑教育的快速发展。半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呈现出从来没有这么主动积极和大范围的可喜现象。但是,也有不少地方式学校,还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即并没有深入到体制深层去操作。如,中小学校中,(国有)名校办民校,产权是否清晰,民办的教育资金会不会因“名校”掉进计划体制中去,即其中是否建立了一种全

新的合作机制?! 又如, 大学大扩招, 个个大学都急着找更大的地方, 以作空间扩张, 那么扩招是因为空间地域不够大吗? 大学的新“分校”, 会不会又是老一套?! 再如, 大学扩招需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 但当大学利用自己的权力, 以很便宜的价格租用学校周边的农民房, 又以高出市场租金 5—10 倍价格转租给大学生, 在赚取了巨额价差的同时, 也拒绝了社会大量资金介入建设“学生公寓”时, 这种“改革”又算什么? 还有大专学校非要招本科、研究生, 研究型大学却偏偏要大量招“职高生”, 甚至于全面扩张办小学、中学、幼儿园等, 这又是改革? 如此等等, 不是不行, 而是要看属于什么样的改革层面。这种典型的“耕了别人的田, 荒了自己的地”的现象, 或者叫做“欢快地唱着改革开放之歌, 大踏步地走在计划经济大道上”的做法, 其直接后果是, 将使一批学校干部受腐蚀外, 也将大大强化落后的管理体制, 加大教育体制深层改革的难度。

因此, 应特别重视能指导 21 世纪教育改革的理论, 重视教育产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认为, 还是不要提“教育产业化”为好, 当然也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理论庸俗化、非理性化。只要我们能够把教育产业论研究, 着眼于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增加新意念、新举措、新策略上, 就一定可以很简单地走出“化”与“不化”之间的概念式争论, 并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驶入 21 世纪的快车道出一把力。

教育的原生态与发展教育产业

□ 张硕城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0)

大力发展教育产业, 不仅仅是扩大内需的近期要求, 而且应作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长期性的带制度性变革的战略目标。教育产业概念的提出, 不是中国的发明, 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对教育制度提出的要求,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一次重新定位。

一、树立教育产业的概念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创新, 又是对教育的原生态的高层次的回归。教育是否具备生产力性质? 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部门归属或角色如何定位?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根本从理论上解决好的问题。如果承认教育的原生态本来就是一种因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活动的延续性需要而产生的自觉行为, 那么, 教育的属性应该说是多元的,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重的属性, 教育产业概念的提出, 也无非就是从经济生产的视角, 把一度被我们所忽视的教育的经济属性突显出来, 对教育进行经济功能方面的定位, 因此, 它与教育的事业性、教育的福利性等等, 都不是对立或相互排斥的, 而是可以并列兼容的, 因此, 也自然不存在哪部分教育可以作为产业, 哪部分教育不能作为产业的问题, 更不存在教育产业与义务教育对立的问题。我认为, 教育作为产业来办, 不仅高教、职教应该, 而且普教也同样应该。它无非是告诉人们, 教育不仅是社会的一项事业, 而且,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教育也同时是一种经济行为。在国民经济的各产业之中, 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产业部门; 在个人或企业的观念、行为上, 它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是通过获取知识和技能提高主体素质而必须付出的, 且将会带来预期回报的投

资行为。至于付出多少资金,是主要由社会公共支出(义务教育支出)来支付,还是主要由个人支付,那是投资主体或资金来源不同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目前,高等教育要逐步实行受教育者个人投入似乎争议不大,其实,也不可能实现完全由个人承担高等教育的全部社会成本,社会公共财政或公益资金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不可能取消的,而个人付费只能是教育投资中的一部分。因为,教育虽然是个人得益的事,但却不仅仅是个人得益,社会终究也得益。普及教育阶段所实行的义务教育,因为它的基础性、公平性,所以在国家财政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义务免费,将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福利而共享,但这只是投资主体社会化的一种转化形式,用纳税人的钱而已,并不能因此否定普及教育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必须计算投入产出的过程,也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产业,也是需要按照产业经营的要求,实现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适度的集约化经营和经济核算管理,达到产出的最大化的目的。

二、教育产业能否发展,取决于如下因素:一是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水平,具体来讲,就是社会就业对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在教育实行产业化经营时,它的主要的调节杠杆就是就业和就业收益,而不是其它。二是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决定了个人教育投资的能力。三是社会对个人教育投资的扶持政策 and 保障机制。因为社会永远是教育产业的最终受益者,社会有义务通过资助、信贷、奖学、半工半读等方式,使一些暂时无能力投资教育的人得到支持,当然,是有偿的支持。四是教育经营

体制的创新。要改变传统的体制,办学单位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达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不计盈亏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产业发展的路子,完全自负盈亏,一时做不到,也不利于教育产业的发展,这里头应该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以上几条,归结起来,关键在于政策导向和如何合理调整分配结构,只有当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较诱人的回报预期时,投资的冲动才能形成(这是就业与薪酬政策问题);只有教育确实能保证这种回报的实现,这样的教育才有人愿意投入(也就是为什么优教、优师、优校、名校能吸引人的缘故)。因此学校教学要改革,要提高教育产业服务的质量。而银行,则只有在看到这笔贷款的回收将是较有保障,相对风险最小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提供助学信贷服务。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公共支出应用于教育多少,用于哪方面的教育,则可以通过分配方面的法规和政策加以规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宏观调节者的角色。

三、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可能成为冲破僵化的传统教育制度的一个突破口。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受传统的束缚太深,主要是两大束缚:一是传统封建教育遗留观念的束缚,把教育的政治性过分夸大,基本上忽视了教育的经济性;二是计划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纯福利”观念的束缚,结果是造成教育长期无法实现产业化发展的自我良性循环机制,统得太死,包得过多,又包不起、包不好,学校基本上失去了办学主体的自主性。看来,要打破这种束缚,使教育有个大的改观和发展,很重要一条,就是让教育与社会尤其是与市场接轨,也就是恢复它本来就有的政治性、文化性、经济性相统一的原生态,把原来被忽视的教育的经济

性重新提升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就必然是走产业化的路子,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增值的一个部门。学校(主要是高校)作为教育产业中的运作主体之一,要具备办学的充分的自主权,包括冲破全国统考招生,实行自主招生、自主招聘师资、自主决定分配等;就业市场则作为教育产品(毕业生)的最终检验关闸。一进一出,这两头的改革,加上必要的个人付费,由此带活整个教育产业的良性发展。政府则通过法规政策加以调控,不直接插手办学的具体运作。

当前要注意的是,在主张发展教育产业的呼声中,有不少人仅仅是把教育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的一种手段,这没错,但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明发展教育产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只讲这点,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陷阱中去。

教育产业化初探

□ 姚益龙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我国目前基本具备了教育实现产业化的条件。不仅出现了对教育产品的强烈需求,而且也存在着对教育产业强大的投资动力(供给)。表现在:

从消费性需求看,人们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教育产品是一个收入弹性极大的商品。当人们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教育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因而教育消费在人们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较低。这正是少数贫困地区教育支出比重低下的原因所在。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容易满足,但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则是永无止境。因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精神产品的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教育产品能够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本身就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特殊劳务产品。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温饱问题,城市和沿海农村已基本达到小康生活水平。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也即对教育产品的消费必将越来越大。

从生产性需求看,人们对教育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工业社会中传统的生产要素结构已发生了变化。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已象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一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同时,知识经济时代也对传统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而且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因而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知识水平、技术水平、综合素质乃至心理素质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而教育恰恰是提高劳动者知识技术水平、综合素质、心理素质的主要途径。人们购买教育产品不只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随着社会知识化水平的提高,人们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出发,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大。

从国家、民族竞争的宏观利益出发,国家对教育产品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如前所述,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素质要求日益提高,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随着我国加入 WTO 的迫近,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必将

更加激烈。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科技的竞争,而人才、科技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教育的发展来实现。国家加大投入发展教育事业,生产部分公共产品,或者对教育产品生产者实行补贴,或者购买部分教育产品,无偿或低价出售给国内消费者,这不仅是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也是增强民族竞争力、维护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从国际竞争的高度出发,国家必然要增加对教育产品的需求。

从教育产品的供给看,我国也存在着对教育市场投资的强大动力。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教育市场强烈的需求必然形成教育产品的强大供给。我国具备生产教育产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亦即存在着庞大的潜在的教育产品生产能力。教育产品的生产具有特殊性,其突出表现就是知识、人才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其它要素则处于从属地位。因而知识人才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应该获取较高的要素报酬。只有让那些知识人才要素的所有者得到较高的报酬,他们才能生产合格的教育产品,从而给教育产品的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利润。目前的关键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让这些教育产品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合理的价格,充分发挥这些生产要素的作用,让它们生产更多的教育产品。目前我国具有大量的专门教育人才,但由于欠帐太多,资金投入不足,教育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教师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要素报酬,因而影响了他们的所有者继续增加对它的投入,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出现这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情况,从思想根源上看,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影响,我们只注重了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一面,而忽视了教育作为私人

产品的一面,没有把私人教育产品投资当成一种商业投资来看待,致使长期脑体倒挂。如果把部分教育产品当成私人产品看待,允许教育投资者自由投资,必定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教育产业领域,教师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90年代初全国各地出现的高收费学校热早就证明了“需求创造供给”这一定律。如果我们放弃这些教育产品的生产,要么就抑制这部分消费需求,自动放弃这一极具潜力的劳务产品市场,要么消费者就通过从国外进口教育产品来满足消费。近年持续出现的大量低龄化学生出国留学热也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从国内对教育产品的需求、供给以及发达国家教育产业成熟经验来看,我国应该承认教育产品的私人特性,应该而且能够发展我国的教育产业。

冷静思考关于教育产业的问题

□ 李 翀

(中山大学金融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本文所分析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具有产业的特点。首先,教育过程是投入教育服务和教育设施以生产教育产品即培养人力的过程,这与投入劳动和资本以生产物质产品和非物质的劳务的过程是相似的。其次,受教育过程主要是对人的能力进行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可以是接受知识或文化的熏陶以获取效用的过程,前者与生产投资品相似,可称为教育投资;后者与生产消费品

相似,可称为教育消费。再次,教育过程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即人才受着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教育必须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才能发展。最后,教育过程也要受到成本和效益原则的影响,学校同样要在效益为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是在成本为一定的条件下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从教育具备产业的特点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是一个产业。

但是,教育又不完全是一个产业。教育和产业的区别不是一个产业部门和另一个产业部门的特点的区别,而是教育部门 and 整个产业部门相比较而言的区别。首先,义务教育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属于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其次,非义务教育过程生产出来的不单纯是经济产品,即不单纯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这里还涉及道德的因素和民族素质的问题,因而具有强烈而深刻的社会性质。这就是说,非义务教育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双重性质。再次,高等学校的教师担负着教学和科研的工作,其中部分科研工作属于基础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研究,它们主要不是受市场调节。另外,高等学校部分专业属于国家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专业,它们也主要不是受市场调节。正因为这些缘故,办教育应该允许盈利,但教育不应该完全受利润原则支配。

教育是产业又不完全是产业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既然教育是产业,接受非义务教育是一种投资或消费,受教育者支付部分乃至全部成本是合理的;既然教育是产业,教育部门适应市场的需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以提高教育的效益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教育是产业,除了政府办教育以外,多种社会力量办教育是应该提倡的。我认为,关于教育是产业的问题不应该仅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

率趋于下降的形势下扩大社会需求的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教育的性质、功能和未来发展这些方面去认识。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楚教育不完全是产业,政府必须对教育承担重要的责任,特别是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尚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甚至该比例还落后于许多国家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间接对我国教育部门产生影响。首先,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专业性人才将变得更加重要。从总体上看,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其次,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才市场需求结构将发生变化,这将要求我国教育的专业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再次,随着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对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不但我国企业的人才会受到影响,高等学校的部分青年教师有可能流失。最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将会推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另外,目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出现生源不足的现象,它们纷纷来华争取生源,拓展高等教育市场,这将会导致教育劳务进口和我国外汇外流。

面对着这种形势,我国高等学校应该扩大招生规模,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同时,应该重视素质教育,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以适应人才市场需要的变化。

需先解决教育产业 所产生的困惑

□ 张人杰

(广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400)

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从它提出的背景来看,乃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像有人指出的,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之一是教育在我国多年来一直是作为公益性事业来加以运作的,而且又是穷国办大教育;背景之二是我国教育体制僵化,学校内部的激励机制并未到位,人员流动也不乏困难;背景之三是教育市场成为改革以来最后一个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

①可见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是在教育要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中应运而生的,对教育观念、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更新有其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不承认这一点,会有失公允,且不符合事实。

但是,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一旦泛化为教育全盘市场化或全盘产业化,那就是极大的误导和误释。其主要理由有三条:首先,在性质上,教育确实具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忽视了商品属性和私人产品的特点,然而,对这一属性的确认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教育具有积极的和重要的公益性及公共产品的性质;其次,教育投资回报并非是严格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产业以盈利形态来表现的投资回报,教育对家庭来说,恐怕还不仅仅是即时消费和长期投资;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教育投资回报则更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考虑,“我们讲的教育投资回报,是指培养多少合格人才,出产多少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②再者,国民教育不能不顾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完全地以企业化的运作机制来办。因此,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尚可讨论。

如果简单地把教育纳入产业化的渠道,在实践方面的负面影响将是深重的。有人已经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实行教育产业化

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第一大风险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推卸了在调解社会公平上应负的责任;第二大风险是,可能使教育特别紧密地向经济价值倾斜,致使那些对培养人文精神有益却与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学科和专业将得不到市场的认可,特别是在两者相抵触的情况下会处于相当的劣势;第三大风险是,可能使贫困人口在失去了政府体现社会公平的因素之制约后,会陷入“先要挣钱再去读书”的困境,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培训也将无法开展。③故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将不啻把教育引向歧途。

退一步说,即使不提教育产业化,而只提教育产业,甚至还强调教育产业的特殊性,也仍然有一些问题在困扰着我们:

提教育产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有人认为:“在未来时代,人力资源将成为主要的财富要素,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经济、与生产具有直接、内在的联系。由此可见,我们提教育产业是有理论根据的。”④此说能令人信服吗?

教育是否能迅速启动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教育支出是当前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情况下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据此,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可以促使家庭储蓄转化为〔教育〕投资和消费,并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扩大以后的有效供给增加和需求两方面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增长。”⑤但产生这种效应的前提还值得推敲。换言之,对我国教育产业的~~现实资源~~家庭支付能力不宜估计过高。

对我国当前教育资源的潜力和供给规模如何作出科学的评量?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资源~~明显不足。仅

以预算内教育经费而言,政府教育投入的总量在1998年有所增加,但是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却有所下降,一些省、自治区已连续几年未达到教育法所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的需求。⑥另一方面,教育的潜在资源是很丰富的,包括资金资源、教师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都没有充分利用。⑦不过,教育不同于其它产业,北大、清华有今天的人才储备规模和文化学术氛围,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才获得的,对一流教育的潜力尤其不宜估计过高。⑧至于那种扩张教育投资(主要是扩大招生、缴费入学),产生乘数效应启动市场需求的主张,实为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单纯外延式的扩张主张,其结果往往是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信誉贬值,从而会破坏人力资本市场的信号机制,并使优秀人才更加外流。⑨

发展教育产业对就业将有哪些影响?一般认为,发展教育产业对就业的积极影响表现为可缓解就业矛盾,因为这样可以使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得以增加,因而推迟他们的就业年龄,起到直接缓解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产品在国内乃至全球的竞争能力,起到间接缓解失业的作用。⑩可是,这有一个适度问题。由于教育的量的不适增长,会使教育系统与经济一机会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其突出表现便是就业困难。⑪

概言之,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需先解决上述困惑。

①袁志刚:《教育产业化三题》,《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8期。

②纪宝成:《“教育产业化”是一种误导》,《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日。

③《充分认识教育产业化风险》,《瞭望》1999年第24期。

④王珏:《教育投入与教育主体要主体化》,转载于《新华文摘》1999年10月。

⑤袁志刚:《教育:最有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文汇报》1999年5月12日。

⑥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其摘要转载于《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7日。

⑦萧灼基:《发展教育产业需注意若干关系》,转载于《新华文摘》1999年10月。

⑧同①。

⑨蔡虹:《不能盲目扩张教育投资》,转载于《羊城晚报》1999年12月1日。

⑩同⑤。

⑪同⑨。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教育的新要求

□ 何万宁

(暨南大学高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32)

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基本上都是立足于国内,向国内的各行各业输送人才。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渗透,我们不仅打开国门,欢迎国外的政府、企业、财团来我国投资、办厂;同时,我们也可以到世界其他国家去兴办实业。这些到国外参与投资管理,在国内“三资”企业工作的员工,相当部分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人才。这样,现实就向高校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要适合国内,也还要适合国外。此刻,我们更加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

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国“入世”后,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要具有外向型的特征。他们不仅要有坚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专业技能,还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很强的应变能力;他们不仅要懂得中国国情,还要通晓国际惯例;不但要有国际经贸知识,而且还要有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因此,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实践训练等教育环节都要注意到中国“入世”后如何培养国内外需要的人才。一方面高校要对教育模式,人才规格进行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培养外向型人才。例如地处广东的高校应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培养高水平的外向型人才。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世界各地金融、经济、政治情况在香港这都得到反映。香港的财政、金融体系的运作,有一整套安全、高效的机制;有一批精通国际市场的精英。这些有利条件可为广东培养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提供有效的帮助。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香港地区的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广东省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为高校之间培养外向型人才开辟渠道;二是通过协商,争取香港财政、金融、贸易界的同意,请他们提供骨干教师和实习机会,承担某些方面的讲学,并让教师与优秀学生赴港学习;三是定期举行研究与教学交流会,让广东高校的教师通过交流不断地吸收新的信息、观点,不断地更新知识,还可共同研讨双方感兴趣的课题;四是实施“两地”培养的方式,对本科生或研究生,在本省完成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

后,用半年或1年时间赴港上岗实习,或在港选择研究课题,完成学位论文。

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教育改革

□ 李江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45)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产业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在竞争中,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上存在的缺陷,将是我们流失大量学生的根本原因。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

第一,要开拓教育资源,加大教育可支配财力。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来源渠道过于狭窄,政府财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校的师资收入、教学设备和物质条件均处于很低水平。特别是大学,由于绝大多数为公立学校,仅靠财政支撑,资源水平很低。例如,哈佛大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5亿美元左右,并且有140亿美元的资金营运增值,相当于我国大学的几十倍收入。为了拓宽资源渠道,要鼓励民间办学,要立法鼓励向教育捐款,所捐款项可以抵税。同时,高等教育也要逐步适当提高收费标准,完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制度。

第二,要改变教育管理体制,可以分步走。第一步,将部委院校下放地方,同时中央将税收部分切块下放;第二步,教育部所属院校也下放地方,中央政府只制订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指导,不再负担学校的投入;第三步,改造学校所有制结构,吸纳各种主体投资入股。

第三,改变“高分低能”的教育产品模式。要改革教材、考试方法和教学制

度。在美国名牌大学, 对学生的评价并不只看考试成绩, 而是包含许多内容, 例如, 课堂讨论与发言, 要打分; 平时作业完成情况, 要打分; 课外社会活动, 要考核并记录在案; 注重培养学生的学识、口才、组织能力、协调关系的能力、幽默感、责任心和诚信品质, 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和乖孩子。

第四, 管教要严, 即宽进严出, 把好产品的出口。目前, 大学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有少数是干不了活的, 在社会上不受欢迎。据了解, 一些大学疏于管理, 考核作弊或出题简单, 学生们(特别是研究生)晚上打牌、跳舞、谈恋爱, 白天做生意或睡大觉, 知识浅薄, 功底不深。要实行固定淘汰制。例如哈佛大学, 规定考试成绩必须在 B 以上, 否则就不给学分, 熬下去你就得退学。

第五, 更新教材, 设计新的知识体系。要在提高教师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大量吸引留学回国人员加入大学教师队伍。

深化教育改革 迎接新的挑战

□ 袁锐镔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 “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我理解, 教育是个特殊的产业, 它不是纯产业。从教育占用经济资源, 有一定就业规模, 存在投入产出关系, 由政府、社会或个人购买教育产品来看, 教育就是产业。但教育是极其复杂的, 它既有可经营的部分, 也有不

可经营的部分, 正如产业的效益有可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讲教育产业化, 应当是指教育中可经营部分的产业化。正如教育普及化大众化, 主要是就教育对象而言, 教育弹性化是就学习制度而言, 而教育主体化则是就教育教学模式而言的。因此要迎接当前新的挑战, 还是要全方位地深化教育改革。

探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不仅要从小教育本身, 还要从整个教育体系的变革以及影响教育改革的诸多外部因素来考虑。从教育的外部来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 不仅要求扩大教育的规模, 而且要求变革教育的育人模式和教学方式, 培养新一代既具备必要的科学基础知识, 又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并且能够不断扩展和提高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水平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 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和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的现实需要;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 我国正在积极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种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发展新情况, 要求教育培养出的新型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既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又具有国际意识, 积极学习和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迎接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当今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的大趋势虽然难以逆转, 但企图扭转历史, 妄图实现单极化, 由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宰世界的逆流依然存在, 这就需要教育培养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既热爱自己的祖国, 又能够将国际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 在当前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经

济形态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此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让教育培养出新一代富有责任感的、更具时代精神的公民。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基础教育将首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教育环境,提供给学生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获得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他们终身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给他们一张“人生的通行证”。可以预见,未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将更加强调普及性、基础性、综合性、多样性和实践性,并兼顾科学精神的陶冶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实现民族文化传统和国际文明的整合;在教学方法上将更加注重发展性和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推动学生自主探索和合作学习,关注学生的学习情感和情绪体验;在教育上将更加明确教育的层次性、阶段性和连续性,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正在深化改革,从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到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共同办学,打破原来的“条块分割”,实现共建、联合、合并,多渠道筹措高教经费,最大限度地利用高教资源;改革原来统得太死的高教管理体制,建立由市场启动、法律规范、计划导行、经济保障、政策调节、社会监督、学校自主诸环节有机整合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同时深化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教学科研管理、教师学生管理、后勤服务管理、招生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这种新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将出现大众化、弹性化、多样化、开放化、主体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将来甚

至还可能出现高等教育界最终被“终身教育”体系所取代的局面。

我们坚信,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产业发展,才能面对国际社会,更好地迎接一个以知识、信息和教育为特点的 21 世纪社会的挑战。

关于教育产业发展的思考

□ 李永忠

(广东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

助理调研员,广东 广州 510035)

一、教育产业是 21 世纪的最大朝阳产业

教育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属第三产业的第三层次,在 21 世纪将成为最大的朝阳产业:(一)人脑和电脑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最大产业,因此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产业。(二)教育的财政开支是世界各国最大的财政开支项目之一。(三)在校学生人数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与教育打交道,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直至终身教育。(四)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学位在我国严重短缺。(五)教育开支是家庭开支的最大项目之一,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例持续增长。(六)教育投资是高风险的、高回报的投资。(七)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教育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在未来社会将得到更大和充分的发展,教育资本是优质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

二、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树立先社会后政府的观念

教育及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在教育事

业发展上应先社会后政府、先市场后政府、大教育小政府。

义务教育、选择教育和选拔教育都应首先由社会力量去举办,政府应重点举办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基础学科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应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

三 教育产业的发展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引进竞争的机制,遵循效率效益原则,运用市场规则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建立教师人才市场。

四 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

教育产业的大发展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途径包括:(一)盘活教育资产,解决教育资产(包括校产、校舍)的抵押贷款问题。(二)加快校办产业的上市及探讨教育产业的上市。(三)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产权股份化和资本化。(四)兴建教育产业园区。(五)发行教育债券,建立教育投资基金,扩大教育储蓄和教育消费信贷等。

五 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制度创新之路

(一)建立国立、公立和私立的学校新体制,学校的服务半径与经费来源相统一。公立、私立教育同质同价。建立现代学校法人制度。抓好公办学校的转制工作。

(二)解决政府作为教育的管理者和举办者的不同职能问题。

(三)允许教育的企业化和产业化经营,引进教育的企业经营机制。

(四)教育产业应面向世界、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扩大教育的进出口贸易,允许外资对教育的直接投资。

(五)素质教育应以创新教育和创业

教育为核心。

(六)大力发展教育中介服务机构。

(七)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产业发展模式

□ 张耀荣

(广东省教育厅调研室副主任,
广东 广州 510080)

一 经济转型要求教育必须作为产业来发展

把教育作为事业来发展和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知识产业来发展,是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发展教育产业是在四个基本转变的条件下形成的方针。

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既要完成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又要赶上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广东等部分沿海省市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正在积极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正在转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发展知识经济、加入WTO,都迫使我们必须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人们亦已普遍意识到要增强竞争力必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

教育已从福利事业转为第三产业,转为基础性、先导性的知识产业。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生活质量的提高、赶上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都必须通过教育的极大发展才能实现。

沿海地区相当部分省市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

育。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已经形成。

在经济转型的条件下,要实现教育的极大发展,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把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知识产业来发展,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

二、教育产业发展的原则和策略

要将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唯有通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不足,已严重制约经济发展。1998年,广东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9%,在校大学生占大中小小学生总数3%,分别低于80年代末世界13.5%、6.4%的平均水平。我们如果继续按原有的模式来发展今天的教育,是难以赶上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难以实现人力资源的转变,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当加入WTO之后,我们面临的局势会更加严峻。因此,必须以发展产业的形式来发展教育。按照产业发展规律促进教育产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 要把教育具有双重属性的观念作为发展教育产业的思想前提。发展教育产业仍然要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来经营教育,都不能离开这一目的。

2. 要把遵循教育规律作为发展教育产业的基本要求。我们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更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任何产业发展都有它自身的规律,而教育的规律更为特殊。

3. 要把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内在统一、协调一致,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基本方针。教育内部各因素的协调以及与外部各因素的协调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在遵循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制定教育产业发展的政策和策略。

1. 建立以公办为主,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国有民办、公办民助和民办公助的办学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建立政府以投资效益管理、战略规划管理、行政立法执法管理为重点,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模式。

2. 建立国家统考和学校独立考试或重点大学联考相结合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构建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在巩固提高基础教育的前提下,构建各类中等、高等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立交桥”和终身教育体系。优化教育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建立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高等中专教育毕业生逐步与干部指标脱钩,并完全自主择业。

3. 建立产学研合作制度,全面推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科研院所与高校合作、合并,并与产业界建立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如产学研三方可通过科研课题共同组成开放型、网点式的科研联合体,产学双方可在对方建立研究和培训机构。

4. 根据不同的办学模式、办学层次,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收费为辅,以收费为主、拨款为辅,或基本按成本收费,以及社会集资、捐资和企业投资的多层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在学校特别是大学建立投资效益管理责任制,实行学年度教育成本核算。财政拨款实行优校(项)优投。

5. 全面启动教育消费市场,规范社会办学行为。适当提高大学生的收费标准,同时健全困难学生的资助和贷款制度。引导、支持企业投资办学。建立政府为主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收费管理、质量监控机制,依法规范办学行为。

6. 制定发展教育产业的政策法规, 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学位卖给谁?

□ 林广志

(广州珠江管理专修学院院长,
广东 广州 510515)

现在看来, 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着实令人深思。过去, 人们只是把这句话的理解放在教育内容的改革上, 即要更多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我认为这种理解过于表面, 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就象其他方面或行业一样,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世界接轨, 必须吸取世界各国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结构、教育行政、教育消费等方面的一切可以吸取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换句话说, 一切可以使教育得到大发展、大提高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采纳。我认为, 这才是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根本意义。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推动一切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加入 WTO 为今后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催化剂, 几乎没有什么领域可以躲得过, 包括教育。教育产业的提出与争论, 为教育的改革酝酿了基础, 一些成功运作的民办学校为教育产业的发展披露了曙光。我看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其本质是教育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这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也是我国教育的根本出路。教育的市场化, 必然导致政府对教育的行政功能发生重大的变革, 以满足

市场化对教育的要求: 1. 政府必须重新审订教育管理的法规, 制定教育市场化的“游戏规则”; 2. 不论私立、公立, 学校是市场的主体, 即带有经营性质的机构, 而不再是俯从于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性的事业单位, 政府对教育的投资, 应流向质量高、效益好的公立、私立学校, 方可避免资金的浪费; 3. 允许市场主体获取合理的利润, 其利润的有无、多少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防止人为地约束学校对利润的追求, 抑制其活力和规模; 4. 教育是一种投资, 也是一种消费, 其收费标准在国家法规的指导下由市场来决定。不论公立、私立学校, 其学位价值平等地经由市场的检验, 优质优价。制造伪劣学位者, 须追究刑事责任。5. 学校的生存、发展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谁的学习风气好, 教学质量高, 费用标准适宜, 谁就会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否则就会遭到淘汰。

教育市场化的结果带来了一个市场特征明显的包括生产方式、交易过程、计价方法和售后服务在内的秩序。其中, “学位卖给谁?” 就是一个涉及政府、教育主办(投资)者、教育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谁来生产学位, 谁来认可学位, 学位的价值如何计算? 学位可以卖, 可以买, 教育完全是一种消费行为, 谁来购买学位? 购买学位的人是谁, 学生是顾客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 将在一段时期内引起教育学者、教育管理者、教育投资者的思考, 教育经济、教育投资、教育消费、教育管理 etc 等课题将在新的观念和无数实践的基础上结出新的果实。

曙光初现, 俟待骄阳!

责任编辑: 叶金宝

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有益探索

——评《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 吴福光

(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72-03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出版, 陈坚、颜泽贤特约主编, 冯增俊、朱仲南主编, 江海燕等参编的《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已出版 7 本。这是一套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时代之作, 对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形式和演进规律, 推动当前教育改革以及转变研究风气, 都有重要意义。

一、具有开启时代的意义

首先,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最早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生长于这块土地上, 这里最先响起打倒中国封建帝国的号角, 产生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推翻封建帝制的伟人。鸦片战争以来, 从虎门炮声开启的推翻帝制的变革政体的现代化运动, 到黄埔军校开启的民主革命的政治现代化运动, 再到改革开放先行实验区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 珠江三角洲都站在前列,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二, 珠江三角洲在教育现代化方面进行了重大探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改革开放的

20 年, 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不仅体现了现代教育如何从传统模式中脱胎换骨, 而且将会给明天的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国际教育提供新鲜的经验。该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教育的飞速发展, 其成就为中外注目; 由于教育快速发展, 使旧的、新的和正在变化着的教育现象共有一体, 这在发达国家是难以见到的。研究该地区教育的新旧冲突、演进和发展, 不仅可以有助于探索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 而且将有助于研究后发展型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有形式。其三, 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实践是从较贫困的农村开展起来的, 符合中国这一农业国的国情实际。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难题是农村问题, 关键又是教育农民的问题。研究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 可以从中探索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为推进中国广大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积极支持。

二、探求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

《丛书》的另一贡献是把珠江三角洲

教育现代化放到世界的视域上加以考察,注重探讨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在世界教育现代化中的独特演进形式,希望通过揭示这一独特的实践形式,探索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正是这一立意高远的编写主题,使《丛书》给读者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不是在书斋中构思出来的,更不是理论家们随意杜撰的结果。《丛书》的最大优点就是把研究植根于生动具体的珠江三角洲教育实践中。在《丛书》中,我们看到了教育现代化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又领略到生动的后发展型教育现代化的创新。在《丛书》中,世界教育现代化是一般,珠江三角洲是具体,而在珠江三角洲中,后发型是一般,各市区乃至学校是具体。看了《丛书》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关注实践,才能使一般与特色达到如此神至之交融,才会交织为一幅绚丽的风景线。无论是在《迈向教育现代化——江门教育综合改革实践探索》(江海燕等)、《跨世纪工程——佛山市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探索》(黄汉和等),还是在《从师专到地方大学——西江大学办学模式研究》(罗钦贤等)、《创建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东莞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姚锦柏),都可从中见到珠江三角洲正在努力创建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的鲜明个性。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珠江三角洲创建有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根本。珠江三角洲从借鉴模仿到创新,建立自己的教育特色,形成了农村型的荷塘职教模式、顺德工业型职教模式以及深圳科技型职教模式,建立起西江大学和五邑大学不同的地方高校模式,江门市、佛山市以及东莞市产生不同的教改特色,都是从不同的实际中发展和创新而来的。这就是特色。过去人们在听取汇报时,都感到珠江三角洲各市区

教育大致相同,许多外地参观者往往只看到外在的学校建筑,认为珠江三角洲教育发展只是因为有钱。《丛书》深刻地描述了这一发展的艰难曲折,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特色教育形象。在《丛书》中,有荷塘职中师生从一架缝纫机到资产达10亿的发展,并且带动了全镇繁荣的艰难创业的求索过程;有佛山市在努力突破传统教育观念,在多重矛盾和冲突中逐步把教育推向服务经济发展的教育整体改革进程;有东莞市实施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农业教育的立体工程,引进市场机制,加速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新鲜实践。《丛书》不贪大求全,注重从实际典型中找到珠江三角洲教育的生命搏动,刻画了教育改革的最关键特征,是一部饱蘸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力作。

三、力倡并推行新型教育研究模式

该《丛书》的另一贡献是在研究中推行新的研究模式。主编者不是从某种固定的概念准则出发,不硬套政治术语,也不刻意追求浮在报表上的数据,而是注重对具体的个案进行全方位的详尽研究。其中丛书研究采用的教育人类学方法就是一种注重从实际出发,较好地把握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的方法。应用这种方法,该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力图详尽研究特定县市学校发展的进程和实际改革工作,并以比较教育的视野对其发展与改革进行分析评价。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使《丛书》从根本上走出了那种记叙文或经验总结性的旧模式,而用理论家的深邃笔触剖析概括纷繁琐碎的数据和发展现象,在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中注入了现代教育理论的精神,化平庸为神奇,使各种教育改革实践焕发出理论的魅力。如《丛书》的第一本是讨论江门市教育综合改革的《迈向教育现代化》

(江海燕等),其主题就是把教育综合改革纳入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用教育现代化统摄了综合改革,强化了对教育综合改革的认识,促进了江门市教育的发展。该书受到全国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的高度评价。可见,该套《丛书》是比较教育学家深入实际,把国际教育研究与研究中国具体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也是理论指导实践,把握探讨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和制定教育发展策略结合起来的重要范例。《丛书》中的每一本书,从不同层面展示了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或从特定主题映照出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在珠江三角洲乃至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

四、普及现代教育理论,形成广东理论特色,建设地方教育研究队伍。

《丛书》得益于广东上下各方面的支持,由著名教育专家亲自主持和参与具体研究工作,使教育理论与珠江三角洲教育实践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论风格。《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不仅使广东教育理论家们得到实践的营养滋润,使理论工作者得到锻炼和新的身份转型,形成了以注重实际研究为特色的“广派”教育

研究风格,同时也从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市区基层的教育研究队伍。一位市教委领导同志参与研究后不胜感慨地说,提出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大会小会讲了十多年,这回终于弄明白了。一些基层教研人员习惯于经验总结和编写文件,参加了课题研究后收获巨大,他们认为是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以来的一次质的转型。特别是理论的研讨把习以为常的教育行为赋予非同寻常的新涵义,使人的生命也为此获得新的价值意义令他们为之激动不已。《丛书》中每一项成果几乎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是基层教育工作者与理论家合作的产物。过去这种合作产生的多是论文集,或各执一词的“大杂烩”式的文本。《丛书》中体现了理论家与实践家合作的和谐和理论与实践上的交融,反映了广东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的精神。从以上认识,我认为这套丛书是很成功的,它是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是广东教育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它产生于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教育创新之中,而它的编写出版又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孙中山的超越构想

□ 段云章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孙中山 超越构想 社会主义

[摘要]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近代化进程中, 常常出现“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各种构想, 这是奔腾于世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潮流交汇的产物。它对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有过较大影响, 并赋予其近代化道路以令人瞩目的新特色。在这当中, 孙中山在这方面的构想, 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品味。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75-09

一

早在 1894 年 6 月,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 首次提出了中国社会可以超越发展的论点。他根据欧美和日本诸国因实行近代化而崛起和中国因举办洋务而呈“月异日新”之势, 认为中国只要跳出洋务派仅图“船坚炮利、垒固兵强”的圈子, 举国实行“人能尽其才,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货能畅其流”的“富强之大经, 治国之大本”, “然后修我政理, 宏我规模, 治我军实, 保我藩邦”, 中国就能突飞猛进, 欧洲列强就无法与我匹敌。他概括其论点为: “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 而能步武泰西, 参行新法, 其时不过二十年, 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①

孙中山在这时提出的超越构想, 显然是基于鸦片战后中国因落后而挨打和欧洲列强因强盛而不断对外扩张的强烈刺激, 但又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认定只要学习西方, 实现中国工农业的全面近代化和进行政治改革、增强国力和国防力量, 就可以在短期内超越

欧美列强。几个月后, 孙中山在上书失效、决志通过发动民主革命来振兴中华时, 更从革命的角度发抒了“修我政理”的思想, 愤慨地指出: “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 数万里土地之饶, 本可发奋为雄, 无敌于天下”, 仅因清政府颞预腐败, 招致中国积弱至极, 列强对华“蚕食鲸吞”、“瓜分豆剖”, “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 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 化民成俗之经, …联智愚为一心, 合遐迩为一德, 群策群力, 投大遗艰”, “以振兴中华, 维持国体”。^②揆其实, 就是通过民主革命, 推翻清廷, 进而实现中国的跃进。

到 20 世纪初, 随着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经过外察世情, 内审国情, 找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潮流与中国实际的汇合点, “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论因而一齐脱颖而出。他在 1903 年 12 月 17 日复某友人函中首次谈到如下想法:

“所询社会主义, 乃弟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 此为吾

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与国家相埒,未易一蹴改革。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故弟欲于革命时一起做起”。③即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同时,实行平均地权,解决民生问题,毕政治、社会革命于一役。

孙中山对他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超越欧美的抱负,在1905年5月中旬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阐发:“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即“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且认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④这里,更表明了:孙中山企图使中国由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而又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显露的贫富不均及必然引发的新的社会革命,由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认为中国将先于欧美各国实现社会主义,让人们生活在共同富裕的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对于为什么在中国易于由贫穷迅速

跃进到富裕,由落后迅速跃进为先进,由封建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径入社会主义,孙中山在当时的一些言论中还有重申和补充。

比如,在1906年11月26日复鲁赛尔函中写道: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比我们的西方兄弟们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完全还处在未开垦的境况,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自己的金融寡头,因之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⑤

在《民报》发刊词里,孙中山又写道: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现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见之,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功倍,良非夸嫚”。⑥

在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的大会上,

孙中山又说:

“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⑦“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歩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⑧他还认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之牛耳,实为可叹!”因此,作为中国革命志士,“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为民国已经建立,民族民权问题已解决,此后应专心致力于实业建设。鉴于民族危机仍然严重,孙中山更急于使中国实业勃兴,特别是要“急急将铁道修成”。⑩但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建设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都严重不足,故此时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增强联系,借重外国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他说:“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⑪他从日本等国的迅速发展中认

识到“时间即金钱”,充分利用外资、外国机器和技术,就可以抢时间,争速度,达到“急求发达”⑫的目的。他在1917—1919年拟订的《实业计划》,旨在“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一突飞进步”。⑬为此,他认为不能走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选择“最直捷之途径”,着眼于世界各国的互助,而不在竞争,“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⑭

1923年后,孙中山随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逐步确立,还曾设想与俄、德结成亲密同盟,借用俄国经验和战败后的德国的“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⑮他在1924年8月所作《民生主义》演讲里,重申了前此已表明的,中国作为贫穷国家亟需大发展,而又易于实现跃进等观点,在继续强调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外,他仍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这样做,“才是事半功倍”,⑯达到中国迅速跃进的目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论,贯串于19世纪末以后他的言行中。

二

孙中山的超越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构想,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而中国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东方国家——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国家。

在孙中山以前,农民已产生过各种形式的平均思想,勾划出过一个又一个

理想乌托邦。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步步东侵,开始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7}的新时期,这使得东方民族承担了既要反对封建压迫又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历史使命,因而赋予其奋斗目标 and 理想以新的特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既描绘了一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①8}的太平盛世图景,又力图营造一个万国一家、互不侵害、平等相处、以礼相接的世界太平的国际环境。无疑,这是近代农民新时期的乌托邦。当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社会主义出现在中国传到欧洲时,马克思乍闻之下,亦颇为惊讶和欣慰,但经过一番再了解之后,终于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①9}即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构想自己的超越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时,显然重视中国以往的思想资料。^{②0}但孙中山这时已经是放眼世界、追逐世界最新潮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只是同情农民,而不能满足于农民的斗争及其理想。过去的思想资料固然可以改造使用;现实的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作为将来必将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更牵系着他的心。他努力探求世界潮流中涌现的各种学说和中国社会现状的最好结合。结果,他从中选择了美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认定它“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②1}据以形成他的平均地权思想。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它鼓吹土地国有,防止地主垄断土地,以免妨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贫富更加悬殊,致生二次革命。这很合乎孙中山的心愿。有

如前面已举的孙中山言论,认为中国在实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就可以缔造一个为“欧美所不能及”的平等、文明幸福的“社会的国家”。^{②2}也就是说,中国就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由落后变成了先进,由饱受内外压迫,跃进到永远的太平和幸福的境地。应该说,土地问题确是农业国家最突出的课题,也是这些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和许多东方国家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孙中山把它作为中国跃进的首要问题来抓,确中肯綮。

在这方面,孙中山和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欧美许多国家的社会改革家固然不同,就是和中国社会历史环境诸多相似的其他东方或半东方国家的志士的思路和方案也有同有异。比如,俄国民粹派依据 19 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尚很不发达,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村社尚遍及全国的情况,认为可以凭藉村社的土地公有和集体生产的“优点”,不需要和世界建立联系,不必吸纳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跃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开始注目于东方,对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探究。他对俄国社会现存的有利于社会革命进行的因素和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径入社会主义也抱过寄望,但他提出前提条件,这就是,必须能够肃清从各方面向村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自由发展的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又能“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经过集体生产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再转变为社会所有制,^{②3}这和俄国民粹派的“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空想社会主义,显然存在原则的区别。

在讨论中国的出路时,马克思除对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表示失望外,还寄望于外国侵略者放弃肮脏的可耻的鸦片贸易,开展正当的商品贸易,促使中国与世界经济建立联系,让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来代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投进世界市场,“使文明进步普及各地”。^④

中国和俄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孙中山也曾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思考过自己国家的特点和出路,产生过“落后优势论”和中国迅速赶超欧美的遐想。他也认为中国的旧时乡村“皆自治之民”;当今最上等的共和政治,实“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⑤因有此“理想之质”,故中国“大有进步之机兆”。若使之发扬到民族和世界,“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凌驾于欧美之上。^⑥他的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的想法和俄国民粹派跃过资本主义阶段直进社会主义的理想更似颇相应。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孙中山毕竟是正在“上山”时期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与代表农民的俄国民粹派不同,他是属于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热衷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先进文明来改造中国、大力与世界建立联系并把中国融入世界的那一类人,即亟欲使中国的跃进和中国近代化紧紧连接起来。

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里,孙中山首次把“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与在20年内“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的中国式跃进相连接。1896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后,在开始酝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的同时,他首次对英国公众宣称:他要建立的民主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摆脱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⑦相信中国的“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⑧他认识到中外经济互补,中国的进步有助于世界的共同繁荣

和进步。他乐观地认为“实际上全世界赞成中国现代化”,“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是和平与贸易”,“文明国家需要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而“中国人中较好的阶级赞成这样做”。^⑨他豪迈地宣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宏伟场所,将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⑩他甚至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相提携,不仅有助于中国实业的迅猛发展,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如是则关于中国问题之世界祸根可以永远消灭,而世界人类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绝大之供给源流,销兵器为日月之光,化凶厉于祯祥之域”,^⑪世界永久和平和大同世界即可随之出现。

还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民粹派的跳跃根据主要侧重于村社中的集体生产和集体精神,而孙中山除重视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和人们的生产关系外,还十分重视发展近代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并注重教育。《上李鸿章书》里所列四大纲,都以近代化生产或近代化设施为主要内涵和标志。随后,他反复提出发展交通事业、开发矿山、建设工厂以至吸收外资外国机器和科学技术等,都是他重视发展生产的表现。他曾明确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⑫“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⑬而国家富裕与否,又是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依据对苏俄和中国情况的了解和比较作出这样的评论:俄国“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

问题还是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美国、英国,我们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③4}这种评论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理解,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反对穷过渡,则合马克思之意。至于孙中山亦重视中国乡村现存组织及其集体意识,是旨在加以改造利用,使之有利于民族力量的凝聚和发挥,以俾团结御侮和加强建设新中国的力度与速度。

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都具有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都存在着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由封建社会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如儒家、道家理想(尤其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相联系,这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剌伯社会主义有相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在反帝反殖和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统一方面,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其共同点。还值得研究的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滞后的土壤上进行构筑的,都以希望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跳跃式前进为特征。但孙中山在这方面的实际想法和许多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存在较明显差异。有人论证:伊斯兰社会主义强调《古兰经》中关于国家财产的观念和根据《圣训》规定的“济贫”(Zatat)思想,认为把物质施舍给穷人的具体形式就是社会主义。阿剌伯社

会主义较多地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提出了诸如财富归全民所有、公正分配、禁止和取缔私人公司和外国租让权、限制农业土地所有权、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等,其总的特点是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相信社会主义是源于阿剌伯民族主义深处的必然产物”。^{③5}与上述比较,孙中山虽亦有过宗教信仰,但孙中山更重视现实生产而少渺茫寄望,更重视科学而反对迷信,更具世界眼光和兼容性,^{③6}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地区或宗教派别,这样就更能团结由众多民族组成并具多种信仰的中国人民,为争取社会进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工农专政、剩余价值学说等方面不赞同,但仍尊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派”,称赞他“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③7}他自己的民生史观,也是本经济崇实践而非求助于宗教,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当于经济上求分配平均之法”。^{③8}

三

孙中山自称:他已了解到研究社会主义学理的学者有千百家,所出书籍有千万种,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模式也千差万异。他自己设计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即跃过资本主义阶段径达的目的地——社会主义,亦有其独特构想。

什么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多有解释,其要旨为防止经济垄断,打不平为平等。比如,在1912年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

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③9}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④0}其实行途径,主要是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实现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他反复申明,实行了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他的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到晚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及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绘也大致如此。他仍强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④1}他还进一步把三民主义作广义的共产主义解释:“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④2}

诚然,孙中山也讲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一蹴而就,有它的阶段性。他说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大众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④3}他认为当前的办法还是通过调节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实行和平赎买土

地的方法,即自报地价、照价抽税、照价收买的方法,来解决作为农业国家的主要社会难题的土地问题;又通过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大力发展生产,振兴实业而又让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来解决工商业蓬勃发展过程中的不均问题。他还以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而感到欣慰。可见,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仍是他的民生主义或三民主义内容的全部实现。

从字面上看,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解释以及对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图景的描绘,早年和晚年大体一贯,基本相同。但如果我们结合具体历史环境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孙中山的上述解释、构想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导向等方面,晚年较早年有着新的进步,他的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具有较前增多的生机和可行性。

孙中山认为自己提倡的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即把土地和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等皆归国有。^{④4}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决定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和生活状况改善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④5}孙中山谈论社会主义时,也常和他要建立的国家紧相连接,并以民主国家的建立作为他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孙中山早晚年要建立的国家有着旧新民主主义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内涵和前途具有旧新的差异和与真正社会主义目标差距的远近。

早年,即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虽然申明他领导的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满洲人、君主和少数富人的“专利”,建成一个“至完美的国家”。^{④6}但它只能是资产阶

级及其知识分子掌握的国家;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虽抱着真挚的同情,希望底不平于平,但如果真正解决了土地问题,扫除了封建障碍,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发展,他盼望出现的许多个上海,必将是富人与穷人都集聚的中心,贫富悬殊会较前变本加厉,真正的社会分配平均方案自是无法实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也就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势力的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或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孙中山亟欲利用机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必然要到来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都远远无法做到。

晚年,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④7}实际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而出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建构和具有某些新民主主义要素的国家。

在政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有共产党人参与领导和决策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全民政治,造成一个驾乎苏俄、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和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④8}而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里更规定民权只能给予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而不能给那些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更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颇为相似。针对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组成的现实,《宣言》既“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又认定各民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④9}这种既尊重各民族权益又珍视中国必须统一的正确观念,也一直往后世延伸。

在经济上,孙中山就是要实现“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大同世界。^{⑤0}这时他所强调的,必须采用近代生产技术,“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特别是要采用先进科学研究成果,发展生产,迅速增加国家财富;同时要采取调和社会经济的措施,“为大多数谋利益”,^{⑤1}虽和此前主张基本相同,但由于推行这些经济措施的政权发生了上述变化,并明确地表示要扶助农工,因而使得这种“共享”具有较前增多的大众性和实践性格。

在思想文化上,孙中山历来重视中西文化的兼采并铸。到晚年,他更力图利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综合性和现实需要的解释,以便创造一种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涵盖中外古今的新文化、新道德。他希望中国在恢复本民族地位后,“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⑤2}显示了孙中山对中国文化民族化的追求。孙中山早就希望在下层群众和妇女中能普及文化教育。到晚年,更认为“国民教育日益普及”,“劳动社会,业有所觉”,深信中国社会“必能一新面目”,^{⑤3}反映了孙中山文化大众化的思路。孙中山历来重视科学,反对迷信。到晚年,更强调只有科学才是真知特识,任何事物都必须“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⑤4}这种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要素的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于此已见端倪。

诚然,孙中山晚年,处在新旧民主主义交接的过渡时期,故在其言行中更凸现出历史上常有的过去和将来的成份相交织,前后两条道路相交错的情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绪的新亢奋,国民党是一个老资格的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政党,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在中外进步人士中又享有声誉。这就使得孙中山虽

容纳共产党人的某些正确主张,但他始终坚持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为本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即使是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也还是坚持以资产阶级为盟主,要中国共产党服从他和国民党的政纲;在他制订政纲时,又往往难以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并存的影响和国民党内左右派同在的复杂情况的制约。这就使得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权、世界观、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和矛盾。而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他的最后的最高的政治纲领,只是同共产党的最低政治纲领基本契合。他要建立的国家,最终也只是具有若干新民主主义因素的国家。

尽管如此,孙中山晚年的最高意境,不仅反映了孙中山与时俱进,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能达到的新高峰;而且其民主主义确溢出一一般民主主义,呈邻近社会主义之势,在许多方面和随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声息相通,前后呼应。所以,孙中山虽然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跃进到社会主义。但他创制的理论,抒发的理想,以及为此作出的真诚努力,确在为中国的跃进式发展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前途铺石引路。

21—22、228、273、322、288—289、328—329、281—282、279—282、326、329、172—173、86、88、106、255、329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5—436、533、321、481、322、339、220、477、519、517、623、508—509页。

⑳㉑㉒㉓《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398、247、200页。

㉔《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37页。

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3、391—392、360—362、381、394、390、314、354、119、394、368—369、253、537页。

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255页。

㊲《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上),第409页。

㊳㊴《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76、95、180—181页。

㊵㊶马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3集,第206页。

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卷,第129—130、269、326、436—439页。

㊸《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5—76页。

㊹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㊺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5、369页。

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㊼《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卷,第643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第1卷,第8—15、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 赵利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键词] 胡适 康有为 学术联系

[摘要]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84-08

早已有学者指出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大量关于胡适生平和思想的论著发表和出版,形成近年的胡适研究热。然而这些论著大多侧重胡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命运。对于胡适的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联系涉及较少,一般强调的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成就及与汉学的联系,而对胡适的疑古思想及其在学术取向上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联系,几乎不为人所注意,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但无论是以传统文化继承人和代表者自居的现代新儒家,或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人自居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一个基本共识:五四与传统是截然两分的。前者认为五四割裂了与

传统的联系,后者则认为五四是全盘性反传统。他们似乎都无意于追寻五四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然而有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于中国的旧学有相当的造诣,而他们这一代人在年青时代,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因而不可否认五四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代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对于传统的解释。^①在学术上的影响亦是相当明显。

在晚清的学术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要算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康有为与章太炎。这一争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史上占了中心的地位,既有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更有其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关于胡适与

晚清经古文学的联系,无论是当时学者,还是胡适自己都是承认的。早在1918年,蔡元培给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指出,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胡适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更正了蔡元培关于其身世的说法,但对蔡氏称道其汉学还是首肯的。②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干脆把胡适作为清代汉学的殿军。③胡适自己亦坦然承认在学术上与汉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谈训诂,谈校勘,谈考据,每每称引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指出王氏父子、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诸子学的贡献,尤其称赞章太炎“别出一种有系统的诸子学”。二个月后,《大纲》即再版,胡适在再版自序中更明白地说,“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阴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的是章太炎先生”。胡适确实不但在考据、文字校勘等方面采用上述诸人的成果,在具体阐发诸子思想方面亦受到章太炎的很多影响。④

诚然,胡适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与日记中,没有像其坦言与汉学的学术联系一样,⑤承认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的学术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氏没有受到康有为一派的学术影响,事实或许正相反。胡适接受康有为可能并不像其接受章太炎那样是主动的,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是一种学术环境使然,这也说明了一种学术取向的转移—从经古文学到经今文学。其实,只要把胡适早年所作的一些学术论著,如《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的两部引起晚清思想界大飓风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照一下,便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不仅仅体现在

具体学术观点上,而且亦表现在治学的方法与学术的取向上。

二

先简略回顾一下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固然与当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在学术上亦有其内在的理路。一般认为清学的发展是以“复古”求“解放”。第一步是明末清初学者追究明亡清兴的秘密,从而出现否定在明末占统治地位的王学思想;顾炎武的“舍经学无理学”的理论,导致在学术上恢复汉唐的经古文学,而否定宋明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理学,即所谓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二步从刘逢禄经龚自珍、魏源到戴望、廖平,经今文学复兴,逐渐压倒经古文学,而成为晚清主要学术思潮,即所谓复西汉之古,对于许(慎)、郑(玄)而得解放;最后是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否定道统之说,以攻经古文学,而章太炎猛烈攻击经今文学,从而在学术上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⑥

晚清经今文学的兴起,带来一股疑经之风。自然,对于疑经之风可以上溯到宋代,如欧阳修之疑《易》,谓《系辞》、《文言》以下非孔子所作;苏辙之谓《周礼》为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作;朱熹之疑《古文尚书》为伪作,王安石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等等,然而这些大都是疑则疑之,没有提出多少有力的证据来。清学全盛之时,以治专经为尚,自阎若璩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古文尚书》为伪作之后,疑经之风大开。这主要是经今文学家的工作,如刘逢禄之疑《春秋左氏传》为刘歆伪作;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谓《诗毛传》是伪作,不仅阎若璩所指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就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亦不是孔安国真说,而后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说《仪礼》17

篇并没有残缺,所谓古文《逸礼》39篇全是刘歆伪造的。到了王闿运的弟子廖平时,著《今古文考》一书,系统地提出了经今古文系统。⑦廖平一生学说多变,就其大而言之,认为古文为周公之说,今文为孔子之说,进而主张今文是孔子的真学,古文是刘歆伪造的。至康有为出,乃集经今文学诸家学说,谓晚出之古文经,皆为刘歆伪造,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托古之人物,而诸子亦托古改制。这些论断对于数千年的经学为一突飞的大解放,从而逐渐启一自由研究之风。

三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前者初刊于1891年,后者初刊于1898年。两书出版后,均遭清政府的多次查禁与毁版,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着眼去探讨其作用与影响,很少有人从学术上对其有过高的评价,故对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亦较为忽视。⑧其实这两本书对于民国以后的学术界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于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更是有莫大的影响。⑨梁启超曾明确指出过《新学伪经考》的影响,“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评价”;又谓《孔子改制考》的意义,“一是鼓舞人的创作精神;二是在汉宋学外,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三是引起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神圣性的怀疑;四是夷孔子与诸子平等”。⑩那么,是哪些观点引出了如此大的影响?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两汉刘歆所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而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是新学非汉学,进而康认为:1、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者皆刘歆伪作;

2、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者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3、孔子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字论,亦绝无今古之目;4、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麁乱;5、刘歆所以伪经,其目的在于欲佐王莽篡汉,乃先麁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到《孔子改制考》一书,康更谓不但《春秋》为孔子所作,凡六经皆孔子所作,非删述也。孔子自立一宗旨以去古人古籍,以寄托其托古改制之意。至于孔子恒论之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为孔子理想上所构成;同时康有为更指出,不唯孔子如此,就是周秦间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如老子之托于黄帝,墨子之托于大禹,许行之托于神农。对于整个上古史,康有为的基本观点便是此书开首所说的“上古茫昧无稽”。

如果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康有为上述两书比较一下,便会发现胡适在很多地方是吸收了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进而又可以看到胡适在学术取向上与康有为所指出的方向极为接近,而且在治学的方法上亦有相似之处。前面,我已指出过胡适在其日记与著作中,极少声称受康有为的影响,但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康氏著作的引用与批评中,可知胡适对于康氏的著作是相当熟悉的。第一,钱玄同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中最大的发明是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论,“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到,决不能再翻案了”。⑪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忽然中道销灭的历史,平常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

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销灭真正原因”。^⑫这与康有为在《伪经考》中所说的“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大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⑬有相合之处。尽管胡适在书中批评了康氏的观点,^⑭而这恰恰可以说明胡适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中国古代哲学销灭的原因,这一观点的学术来源。第二,胡适在《大纲》中吸取了康有为的儒家托古改制的理论。他在《大纲》中说:“读古书的人须知有种种作伪的理由。第一,有一种人空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时代”。^⑮这全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的说法。对于《尚书》,胡适认为“《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賾伪古文固不用说,那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也没有信史的价值”,《尚书》或是儒家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价值。^⑯对于《春秋》,胡适认为它是孔子所作,是含有“微言大义的,而不单是一部史书”,因而认为“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是没有用”。^⑰对于儒家所说的“礼”,胡适认为“儒家说尧舜死时三载如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若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⑱胡适又认为《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⑲在胡氏看来,《周礼》是伪书,本不足证,“汉代又是一个造假的时代,是一个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末年忽然跑出一部《周礼》来”,这是由于在西汉时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为豪富的反对很大,故不得不

用托古改制的办法,这也是作《周礼》等书的动机,而“刘歆造假书的原因大概是为此”。^⑳正是这种近乎康有为的论调,以至于后来章太炎在致柳诒徵的信中深为不满地指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余。”^㉑柳诒徵更谓胡适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㉒第三,胡适在《大纲》中的一个创见是置诸子于平等的地位,这一点直到晚年,胡适还夫子自道,“那一册当时却是开风气的作品,我那本著作中至少有一新特征,那便是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㉓这也是蔡元培在给《大纲》所作序中讲的“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是很平等的”。^㉔但这种对于诸子平等的目光,不能不说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自然并不排除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这一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研究”。^㉕第四,胡适在《大纲》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用《诗经》作时代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动,在当时可谓是一个极大胆的举动。^㉖然而就其思想来源而言,仍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在《改制考》中指出,“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论之故”,^㉗亦即认为中国文明源始于孔子,而尧舜不过是儒家托古改制的人物,《尚书》等都是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的,因而所谓的

上古史,所谓的三代都非实有。胡适在《大纲》中抛开三代,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在学术上正是承接了康有为的上述基本论断,也展现了晚清到民国学术取向上的一种转变。这里又涉及到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不同。经古文学派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是一个古代文化的保存者,是一个史学家,因而经古文学相信尧舜汤武的历史,相信三代。晚清以康有为所代表的一派经今文学家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认为孔子是一个哲学家,认为孔子托古改制,置孔子与诸子平等,所有这一切都为民国后学术的取向提供了一个解释空间。因而,从胡适的《大纲》,到后来顾颉刚的疑古,及古史辨派的形成等,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总结。

四

蔡元培在给胡适《大纲》作序时,曾称此书有四个特点:一是证明的方法,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三是平等的眼光,四是系统的方法。其实,蔡元培的这四点已明白地指出了民初学术发展的动向:辨伪与疑古。这两者都是在晚清经今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前已指出,经今文学在清代复兴时已带来一股疑经之风,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更是为疑古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胡适的疑古正是继此而来的。胡适在《大纲》中批评谢无量讲中国哲学史从三代讲起,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认为最为可怪的是谢无量引用《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者,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学”的材料。在胡适看来,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⑧因而胡氏

的古史观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十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⑨胡适的这一古史观是与古史辨派一致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受晚清经今文学派的影响至为明显。这里还得先把一个问题澄清一下。有人认为古史辨派的疑古与辨伪是上承了郑樵、姚际恒、崔述的遗绪。的确,顾颉刚在正式讨论古史前已着手编辑辨伪丛刊,汇集这方面的著作,但问题在于顾颉刚之注意辨伪正是由于康有为的上古史茫昧无稽,夏殷周三统皆孔子所托,诸子托古等论断影响下而去注意与搜集辨伪方面的材料。顾颉刚自己对此亦明白地指出过,他说:“后来在《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史茫然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人意。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⑩顺着这一思路,把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更清楚地叙述出来,看看那些传说中的古史是如何形成的,不亦是相当自然的事情了?正是在这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胡适倡导的历史的方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相通起来。顾氏又说,“那时又起了一个问题,上古史既茫然无征,这些相传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⑪顾氏的这一疑问,表明了当时学术界的取向,已从考信走向疑古,亦是说民国初年的学术从受经古文学的影响到经今文学的影响。

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很有名的从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的例子。如比顾颉刚、胡适早一辈的崔述。崔述本与章太炎同师于晚清经古文学大师俞樾。可当崔述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后,决定放弃经古文学的立场,而完全走向

经今文学, 著了《史记探源》一书, 进一步发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观点。更为著名的例子恐怕是钱玄同了。钱氏早年师从宗经古文学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而当崔述转向经今文学后, 拜崔述为师。钱氏自己明白地说他专宗经今文是由于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述的《史记探源》而起。^⑩就顾颉刚本人来说, 亦经过从最初的“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到“更加佩服长素先生卓识”的转变; 胡适同样有这一转变, 即从感谢章太炎到接受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 进而把上古史, 尧舜、夏商一概抹杀。其实, 章太炎早就把康有为和胡适并列, “长素之为是说, 本以成立孔教; 胡适之为是说, 则在抹杀历史”。^⑪因而, 就当时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而言, 实是由经今文学的“托古改制说”及“刘歆伪经说”所引发出来的。^⑫若是进一步而论, 正是经今文学的这些基本设定, 为胡适的进一步宣扬其所倡导的历史方法论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

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恐怕是努力提倡方法论的第一人。胡氏认为他所宣扬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有两层意义: 一是历史的方法, 二是实验的方法。在《古史讨论读后感》中——胡氏宣称此文为其 150 多万字的文存中讨论方法论的文章中最精彩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一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 二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有学者着意探讨胡氏所倡方法论中的西学与中学成份, 这我无意讨论, 只想指出胡适所倡导方法论的起点, 若是没有这一起点, 其方法论也就不会在民国的学术界发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一起点便是上文所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及由此而来的学术上疑古之风。即然三代

的古史都是托古改制的产物, 那么追究这些历史的传说、观念如何形成与演变便是顺理成章的。而要研究这些演变, 便使用得上研究故事演变的历史的方法。换言之, 若没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为基本的学术前提和设定, 那么顾颉刚们即使要想用胡适提出的历史演变的方法来探究古史亦无从谈起。因为若像经古文学家那样认为孔子是史学家, 三代三统之说都是可靠的, 那何来胡适、顾颉刚所说的史迹的演变呢? 就此而论, 胡适的历史演变的方法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具有内在的亲同性。这一点, 顾颉刚看得很明白, “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考定上古史的影响, 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 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原因, 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 而且要看出作伪的背景, 就从伪史上去研究, 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 进而顾氏认为胡适的方法论是“使人不但要去辨伪, 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 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 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 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⑬这便是看史迹的清理还轻, 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凡是一件史事, 应看它最先是怎样, 以后的逐步变迁又怎样”。^⑭其进一步的结果便是顾氏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 ^⑮其实质是, 站在经今文学的基本立场上, 用历史演变的方法来考察古史。

再就胡适实验主义中的实证的方法来说。胡适把他一身所倡导的此一方法归纳为十字真言: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这最先是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此后胡适在各种场合一再地强调, 到 50 年代胡适在讲演历史方法论时, 讲的还是这两点。其实十字真言归纳起来便是先立论, 后求证, 显示出胡适治学与汉学家治学的不

同。乾嘉学者治学恪守的是实事求是,即先从研究材料出发,然后在材料中发见问题,故有谓“一物不知,便以为耻”的说法,强调的是从材料到观点,即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而胡适所倡导的实证的方法恰恰是用了“六经注我”的手法,凭主观需要来摆布客观史实。这与胡适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是相联的。胡适认为社会历史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⑧胡适自认为是承继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而实际往往是大胆的假设多于小心的求证。这种治学方法恰恰又与康有为的治学方法极为相近。曾参与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作的梁启超对其师的治学方法是这样评价的:“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强……其对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焉,其在学问上亦然。”^⑨而精研近300年学术史的钱穆说得更明白,康有为治经,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至六经为我注解不止,“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⑩胡适、顾颉刚等古史辨一派的治学方法的一大特点,亦正在于此,其主观的设定、立论的出发点是相信中国上古史事无一不伪,因而要在群书中找出作伪的证据。

总之,胡适及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学术潮流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经今文学无论在学术观点、学术取向与治学方法上都有一种承继关系。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于民国学术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康有为等与五四的关系。其实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的许多人物,如易白沙、吴虞乃至李大钊正是采用康有为一派的学术观点去反传统或攻击孔子。当然,我并不否认胡适的《大纲》及其它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开创新范式的作用,只不过希望同时注意到学术上的继承性。不然,正如梁启超在批评胡适《大纲》时所说的“胡先生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⑪

^①余英时:《五四与传统》,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实,蔡元培在1919年致林纾的信中便指出了这一个事实:“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②蔡元培序,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亦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胡适在自传中说,“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序言中,曾误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但是这个世居绩溪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见《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

^④章太炎对先秦诸子怀有莫大兴趣,从戊戌到辛亥曾反复予以研究,让青年人从历史中间获得知人论世的教育,要算这一篇写得较好。这只要看鲁迅的若干杂文和历史小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可知它对当时和后来青年的影响”。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

2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其实早在《大纲》出版不久,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便指出胡适对于孔子的“一以贯之”与“忠”、“恕”的解释是引章太炎所说并略加修正。见《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文集》三十八。后来侯外庐亦指出章太炎“尊视老庄的自然天道观,实为胡适之所本,胡氏演其庄子进化论的意义,而弃其齐物论释的研究。”见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 1988 年。

不过在我看来,胡适受章太炎思想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上。胡适一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与晚清章太炎等提出的“古学复兴”、“文学复古”是一脉相承的。

⑤“汉学”一词,在文章中的使用并不严格,我在很大程度上把汉学与经古文学相等同起来。其实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就清代汉学而论,包括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详参看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13 页;亦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 322—337 页。

⑦李学勤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述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派,古文为另一派。用这样的分派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廖平。见《〈今古学考〉与〈五经异议〉》,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⑧钱玄同大概算是个例外。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精审的辨伪专著”。见《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载《古史辨》第五册。

⑨对民国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治学的取向和课题上。如王国维后期的一些学术论著中,很多观点是对于康有为的回应。钱穆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刘歆向父子年谱》则是为批驳康的观点而作。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126—132 页。

⑪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⑫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384—388 页。

⑬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 5—8 页,中华书局 1955 年。

⑭⑮⑯分别见《大纲》,第 386—387、18、23—24 页。

⑰⑱⑲分别见《大纲》第 98、132—133、19 页。

⑳胡适:《井田辨》,《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 1928 年。

㉑章太炎:《章太炎致柳诒徵教授书》,《学衡》第 73 期;亦见柳曾符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㉒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同上书。

㉓《胡适的自传》,第 222 页。

㉔见蔡元培序言。

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131—132 页。

㉖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 36 页;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200、215—216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

㉗《孔子改制考》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

㉘《大纲》,第 23—24 页。

㉙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

㉚顾颉刚:《自序》,第 26 页,《自序》中又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因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第 43 页,《古史辨》第一册。

㉛顾颉刚:《自序》,第 22—26 页,《古史辨》第一册。

㉜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一册。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魏晋至隋唐 历史文献学 史书部类 史注

[摘要]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 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 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 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 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92-07

一、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史书部类趋于定型, 一是看它在整个文献中所占据的部位, 一是看它本身内部分类的发展。《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 史书在整个文献分类中尚无独立的位置, 更不曾有内部的分类。这种情况,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汉书·艺文志》以后, 直到《隋书·经籍志》问世以前, 诸家“正史”都没有艺文、经籍之志。史书部类的变化、发展,

可以从专门的目录书中加以考察。《隋书·经籍志二》“簿录篇”著录两晋、宋、齐、梁、陈、隋诸家目录书 17 种(专科学目不在数);《隋志》失载而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二》“目录类”的, 有南朝宋人殷淳《四部书目序录》和隋朝王劭《开皇二十年书目》; 上述二志均未著录, 而见于别处记载的、隋以前的目录书, 也还有一些。根据有关文献对这些目录书的介绍, 大致可以看出史书部类趋于定型的发展情况。

③上引《章太炎致柳诒徵教授书》。

④事实上古史辨派讨论的许多问题本是康有为提出来的, 而且他们的基本理论亦是康氏的上古史茫昧无稽说与托古改制说。关于古史辨派与晚清经今文学的关系, 将作专文探讨。

⑤顾颉刚:《自序》, 第 40—41 页, 《古史辨》第一册; 后来胡适在《古史讨论读后感》中进一步强调这一点。

⑥顾颉刚:《自序》, 第 28 页, 《古史辨》第

一册。

⑦具体内容, 可看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古史辨》第一册。

⑧胡适:《实验主义》, 《胡适文存》第一集。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 128—129 页。

⑩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 651—652 页,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⑪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又梁引胡适《大纲》语, 见《大纲》第 35 页。

这个时期最早的目录书是三国时魏国郑默所著《中经》(亦称《魏中经簿》)。西晋荀勖在此基础上著《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特点是“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四部,是甲、乙、丙、丁;其丙部书,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它在文献分类上,已不同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这是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是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这是史书与其他文献在分类上的里程碑。东晋李充著《晋元帝书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史书升为第二位,“自是厥后,世相祖述”。①自此,史书在文献整体分类上的位置就确定下来了。南朝宋、齐间人王俭著《七志》,梁人阮孝绪著《七录》,以及隋朝许善心著《七林》,都是对文献作七种分类。《七志》对于史书分类,没有多少意义。《七录》作者阮孝绪因“今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的事实,特“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②他说的“内篇”,是指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等五录;“外篇”,是指佛、道二录。《七录》继承了李充列史书于第二位的分类法,同时又扩大了荀勖对于史书内部分类的范围,分史书为十二类,是史书分类上的又一里程碑。《七林》是仿《七录》而作,它的特点是:“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③《七录》和《七林》,在史书分类方法和文献学思想方面,为史书分类更加完备和走向定型,提供了重要的成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隋书》十志修成,其中《经籍志》是《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最重要的目录书,是对两志之间目录书的总结性成果。《七录》已有经、史、子、集的分类思想,《隋书·经籍志》把前人的四部分类法和按经、史、子、集加以部次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献分类格局。其中史

部又分为13类,每类均有小序一篇,加上史部大序一篇,共14篇序,约4100字。各类小序概说此类史书性质、体例、源流、存佚情况、代表作品;史部大序略述史职要求、史学作用、史官制度。《隋书·经籍志》已超出一般目录书的价值而具有学术史雏型的意义,其史部则具有史学史雏型的意义。至此,史书分类不论在与相关文献之关系的部次上,还是在内部分类的格局上,都基本确定下来。历史文献学在广义的文献学领域里,已卓然自立。

二、史注的突出成就

这是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的另一个突出标志。首先,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这时都有了注或新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史注名作。《左传》,有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国语》,有三国吴人韦昭的《国语解》;《史记》,有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代司马贞的“索引”和张守节的“正义”,习惯上统称为“《史记》三家注”;《汉书》,主要有唐代颜师古注;《后汉书》纪传,有唐代李贤等注;《续汉书》志,有南朝梁人刘昭注;《三国志》,有南朝宋人裴松之注。此外,南朝宋人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有梁人刘孝标注;三国佚名氏所撰《水经》,有北魏酈道元注等,皆为名家。这些史注都流传下来,对于后人释读、研究和使用的丰富的史学遗产,发挥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它们都还有参考价值。

其次,是出现了多种注史派别和注史方法,为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些派别和方法主要有:

——补充史事。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还有唐人李善《文选注》,是这方面的名注。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

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有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④这一段话，说明作注的宗旨和方法，具有理论的价值。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即所谓“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因此，裴注重在具有补充文献的价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意甚简略。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记，补充了屯田的背景、曹操的屯田令、田官的设置、屯田的效果等史实。又建安九年下记曹操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接着说道：“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载曹操令的内容，包含租赋制度的改革办法和征收的具体数量，是中国古代租税史上的重要文献。裴注还有考史和评史方面的价值，这除了它所征引的文献外，也见于裴松之在注中所写的按语。裴注的价值还在于它储存了大量的已佚文献。一般地说，裴注征引文献比较完整，文字也多，如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所记汉献帝禅位诏册之下，注引《献帝传》7000余字，以为“补阙”；同时，裴注所引之书多至210种。^⑤由于这两个原因，使裴注保存丰富的文献，总计达32万多字，只比正文少4万余字。^⑥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这就更加重了它的文献价值。过去有人以裴注贬低原书，说《三国志》应当重作；也有人以裴注价值评价不高，说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作。”^⑦这两种看法都失于片面。

《三国志》和裴注是名作和名注的关系，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从史注发展来说，《三国志注》开创了新的注史方法，在史学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原为八卷，刘孝标注本为十卷，今传本分上、中、下三卷。此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记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间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对于反映魏晋时期门阀地主的思想、生活及清淡放诞的风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刘孝标仿《三国志》裴注之法，广征博引，采撷文献400余种，以注《世说新语》，这就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清人沈家本(1840—1913)辑有《世说新语注所引用书目》，其中经部35家，史部288家，子部39家，集部42家，释氏10家，凡414家。^⑧这些书，唐修《隋书·经籍志》时，已佚110余家，至今所存十不及一，故其所存佚文，尤为珍贵。《世说新语》注也兼有考史、评史的作用，但不如《三国志注》在这方面的作用突出。

萧统所编《文选》(后亦称《昭明文选》)30卷，是一部文学总集，选录先秦至南朝萧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也只选录少量“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全书分为38类，共700余首，是梁、陈、隋、唐时的重要文学读本。唐代先后出现了两个《文选》注本，一是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689)注本析为60卷，一是玄宗开元年间的“五臣注”本。宋人又把它们合为《六臣注文选》。李善注精于“五臣注”。《新唐书》称他：“淹贯古今”，“为《文选注》，敷析渊洽”，“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⑨南宋尤袤指出：“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⑩今传《文选注》，大致保存了李善注文的优点，但已非李注

原貌。李注重“用事所出”，征引该博，储存了唐初以前的丰富文献，这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有同样价值的。这三种注，被认为是“六朝唐人书注最浩博者”。^⑪刘知几指出，“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是南朝学人注史的一个特点。^⑫齐陆澄的《汉书注》、梁刘昭的《后汉书》注，也是采用搜集同异以为注的方法。

——训释史文。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等注，是这种注史派别的代表作。它们的特点，是重在训释史文，疏通原著。刘知几称赞这种史注有“开导后学，发明先义”的作用，又便于“古今传授”。^⑬《史记》三家注以前，有东晋徐广作《史记音义》13卷，以注音释义为主，“具列异同，兼述训解”。裴骃“集解”即“以徐为本”，又“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加以训释。司马贞在此基础上，“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撰成《史记索隐》。“索隐述赞”兼有提要 and 评论的性质，这是“索隐”不同于“集解”的地方。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自谓：“评《史》、《汉》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⑭三家注虽不尽相同，且有互补之效，但中心都没有脱离音字释义这个基本方法，从《史记正义》的体例说明“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列国分野”，可以看出这一派史注的风格和特点，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迥然不同的。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这一派史注中成就最大的。颜注是在已有二十多家《汉书》注的基础上所作的，它包含三个

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待旧注：凡恰当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凡意有未伸者，“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凡“越理乱真”者，则“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凡“汎说”、“芜辞”，“徒为烦冗”者，一概不取；凡旧注阙漏者，则“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第二，是对待“六艺”之文：不“追驳前贤”，也不“曲从后说”，而“各依本文，敷畅厥指”。第三，对本书纪传表志所记“时有不同”者，或“笔削未休，尚遗秕稗”，或“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都“穷波讨源”，予以甄释。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给自己作注提出的这些目标和要求，足以说明他的严谨和博洽。颜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字音、字义的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坚深；一是不脱离原著，“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反对“竟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⑮史载：《汉书注》出，“大显于时”；时人称杜预、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⑯这反映出杜预、颜师古注史的成就，也反映出这一史注派别的学术影响。

——以著为注。酈道元《水经注》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水经》是一部水利史专书。《隋书·经籍志二》地理类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注。”《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著录：“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二书提出三种说法。据清人全祖望等考订，认为是三国时人所作。它记述黄河、长江、渭水、沔水、济水、漯水、汝水、淮水等137条水流，文字简略，记事止于三国。北魏酈道元为之作注，广搜资料，大加扩充，成《水经注》40卷。《水经注》共记河流1252条，详细记述了各条河流所经过的山陵、郡县、城市、关津、名胜、祠庙、冢墓等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谣以至神话传说。注文共约30万字，为原书的20倍。其引用书多达

431种,并收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有很高的文献价值。①郦道元《水经注·序》说他作书的方法和范围:“《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支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渌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又说到作书之难和所取态度:“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轻流细漾,固难辨究”,“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水经注》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相比,可谓貌似而神异,它具有明确的撰述思想和撰述体系,可以说是一部以注代著或以著为注的历史地理名作。

——著者自注。以上几种史注,都是注家注他人之书。自注,是著者自注己书,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为“子注”。自注是著者在撰述中对于历史文献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这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文中由此及彼,旁及相关事物,不便书入正文而又可以烘托正文所记者,北魏杨衒之(一作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属于这种情况;一是为简省正文而对正文所做的补充或说明,唐杜佑的《通典》属于这种情况。《洛阳伽蓝记》在流传中正文与注文久已混淆,后人难以复其原貌。《通典》正文约170余万字,注文约20余万字,②占正文八分之一左右,是《通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典》自注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征引已有注释的历史文献时,酌情将原注连同被征引的部分随文转录,这在《通典》自注中不是主要部分。另一类是杜佑自撰之注,这是《通典》自注中的大宗。这后一类自注,内容丰富,用途亦多。有训释音义的,有注明史事年代和属辞涉及“国讳”的,有申明采撰原则的,

有说明某项制度之起始、源流和古今变化的,有考辨史事或保存异说的,有补充或说明正文的,有注中略带评论的。③这些自注,不仅可以进一步用以考察杜佑的撰述旨趣,而且包含了作者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和运用历史文献的多种方法,其价值已超出史注的范围。

《通典》是一部巨著,但全书的序言只有220余字,不可能对全书的体例一一说明。书首的李翰《通典序》,也只有几句话很原则地涉及到它的体例方面的问题。因此,《通典》自注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说明本书的体例。如其自序之末自注曰:“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这是说明全书所记史事断限之例。又如卷四二,在一首“说曰”之文末了自注曰:

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

这是说明全书“说曰”、“议曰”、“评曰”之讨论对象在理论层次上的区别之例,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创造。它反映出杜佑史论的特色,以及他对不同的历史文献能够注意到从理论上作出不同的判断。

以上是以自注说明全书之例,还有以自注说明全书的一部分之例的。如卷四一,在“第一”之下,于“目录”二字后自注曰:“其《沿革篇》所纂前代典实,应指尊极,不同《开元礼》,故不悬阙矣。《历代沿革礼》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这是说明《礼典》中两个部分的区别之例。又如卷一〇六,在“五礼篇目”下自注曰:“谨按斯礼,开元二十一年撰毕。自后仪法,续有改变,并具《沿革篇》。为是国家修纂,今则悉依旧文,非敢辄有删改。本百五十卷,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

阅易周, 览之者幸察焉。”这是说明《礼典》中两个部分的联系之例。把这二例结合起来, 更可把握作者撰述之意。再如卷一四八, 在“兵序”之末、目录之前自注曰:

凡兵以奇胜, 皆因机而发, 但取事颇相类, 不必一二皆同, 览之者幸察焉。其与《孙子》义正相叶者, ⑩即朱书其目; 颇相类者, 即与墨书。其法制可适于今之用者, 亦附之于本目之末。

这是关于《兵典》标目之例, 其中也包含着作者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对历史文献进行分类的思想。《通典》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论上有多方面的贡献, 还有待于作深入的研究。

三、文献整理、总集和类书

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一是西晋初年对汲冢出土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 其中《纪年》12篇在历史文献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它说明早在战国时代, 中国已有略具雏型的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二是关于总集和类书的编纂。总集以萧统编的《文选》最有价值, 所收诗文多为历代代表之作,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历史面貌。它所收录的史论和史述赞, 尽管是从“辞采”和“文华”着眼, 但把史论列为总集的一目, 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晚唐文宗大和年间, 裴潏“集历代文章, 续梁昭明太子《文选》, 成 30 卷, 目曰《大和通选》, 并音义、目录一卷”。⑪章学诚对其评价甚高, 说它“汇公私之述作”, “以词章存文献”, 是“史部之通”的一个方面。⑫可惜此书今已不存。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开元年间徐坚等编的《初学记》, 今三书皆存。《北堂书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 原

有 174 卷, 今存 160 卷。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等 19 部 851 类, 按类排比资料。引书除集部书外, 多达 800 余种, 而原书今多亡佚, 故储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艺文类聚》100 卷, 分为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等 44 部, 720 余目。每目之下, “事居于前, 文列于后”, 征引唐以前文献 1431 种, 今所存十不一二。《初学记》30 卷, 分天、岁时、地、州郡、帝王等 23 部, 313 目。每目之下, 依次按“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采摭文献。《艺文类聚》、《初学记》都比《北堂书钞》严谨, 而《初学记》在取材精审上又胜于《艺文类聚》。这三部类书因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古书中若干资料而备受后人重视, 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和校勘、辑佚之学的发展,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各种同类性质的文献汇编日渐增多, 这跟封建皇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著录有《魏明臣奏事》30 卷; 刑法类著录有陈寿《十二名臣奏事》30 卷, 有《条钞晋宋齐梁律》20 卷; 谱牒类有王俭《百家集谱》10 卷, 王僧孺《百家谱》30 卷、《十八州谱》712 卷等。按文献性质分类汇编, 是历史文献整理的基本工作, 这个时期有了相当的进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成长, 为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⑩阮孝绪《七录·序》, 见《广弘明集》卷三。

⑪《七录·序》。

⑫《隋书·许善心传》。

⑬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⑭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887 页。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

条说,裴注引据书有 150 余种(原文说是 50 余种,误,见王树民校正本,中华书局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⑥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现经研究者反复细致统计,陈寿本书为 36 万多字,裴注为 32 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实多出 4 万余字。参见王廷洽及崔暑庭文,载《上海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东北师范大学)1985 年第 3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⑦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

⑧近人叶德辉也辑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见王光谦校订本《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2 年出版)。

⑨《新唐书·文艺中·李邕传》。

⑩宋淳熙本《文选》跋。

⑪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题记。

⑫《史通·补注》。

⑬《史通·补注》。

⑭以上所引,参见《史记集解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序》。

⑮《汉书叙例》。

⑯《新唐书·儒学上·颜师古传》。

⑰此据杨翼骧说。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水经注》”条。

⑱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第 99 页。

⑲参见曾贻芬《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⑳叶,音 xié,和洽、相合之意。

㉑《旧唐书·裴潏传》。

㉒《文史通义·释通》。

责任编辑:郭秀文

“刀耕火种”重评

——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 蓝 勇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重庆 400715)

[关键词] 刀耕火种 经济史 生态观 效益观

[摘 要] 本文通过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评价对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不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不注重产出与投入的比例、不注重生态效益等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产生十分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耕作方式,华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并不是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中国南方山地最早的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经典的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刀耕火种既有十分高的产出,也不会更多影响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介入经济史研究和在经济史研究中树立生态观和效益观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099-06

—

近代科学的两个最大的分割是将无机界与有机界分割,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分割。近几十年的科学发展趋势表明,这种分割的弊端尤大。现代科学又重新强调减少学科分割,提倡各个学科的交融。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恩早就提出历史应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提出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和“相互制约”的。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注重分割,缺乏对“相联”和“制约”的思考,更缺乏在“相联”、“制约”的指导下的个案研究。

虽然在现实中人与自然矛盾十分突出,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注重可持续发展已在经济研究和决策中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勿庸讳言还没有树立现代科学观、生态观和发展观来审视我们的经济,更缺乏在现代科学观、效益观、生态观基础上的经济史个案研究,其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个

方面:

(一) 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以上学科分割的影响,再加上建国以来我们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投下的阴影,人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多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注重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土地制度、土地兼并、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研究,即使提到地理环境,也将其与人的关系看成无机的,简单地将地理环境只作为人类任意跳跃的一个死舞台。正是在这种传统思维下,传统经济史对与自然环境关系本十分密切的耕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往往不是简单化、概念化,就是模糊化,忽视它们的时间差异和生态差异。

(二)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发展水平的分析,一是用一些定性文字作描述,得出模糊的水平有所提高;二是即使用一些亩产、耕地总面积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或亩产增长标志,但很少考

* 本文系 1996 年 1 月我与陈国生撰的《传统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思考》(未发表)一文中我撰写的部分修改而成的。

虑这种“发展”、“增长”所隐藏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即经济效益问题。进一步让传统经济史研究思维方式只注重“亩产”、“增长”的表面增长或跌落,而不考察投入与产出的社会经济效益。应该看到经济史研究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近几十年现实中传统经济发展只追求产值在经济史上的折射,而这种经济史思维方式又反过来影响左右我们发展经济的取向,于现实危害尤深。

(三)传统经济史不仅只注重用产值来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完全忽视产值增长而来的生态投入,即生态效益。历来经济史学界对移民的垦殖都不加分析地一味褒扬,但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膨胀下的山地陡坡垦殖,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使投入多于产出,从而走向反面,使投入与产出比意义不大,这不仅在现在如此,在历史上也存在。对此,我们已有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索,其他学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对于经济史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的不足,对以往学术界对历史时期中国刀耕火种重新评价以引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无疑会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

二

传统观点认为刀耕火种是中国最原始的和最早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所以一提起刀耕火种,就指明其代表一种极其落后的、原始的耕作方式,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所有地区的农业文明产生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但是,通过从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对刀耕火种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刀耕火种主要是指中国南方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以游动耕作和砍烧山林为基本特征的山地旱作的耕作方

式,即人们说的“砍烧制”(Sash and bum)、“游耕制”(Shifting agriculture),这种砍烧制并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任何地区都可实行的。

据美国哈兰(R. Harlan)教授、何柄棣教授等研究表明,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刀耕火种。由于黄土质地均匀,略呈碱性,土壤中矿物质一般经久不易流失,基本肥力长期不易丧失,加上亚欧风沙不断形成堆积,形成“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从这一点上来看,华北农业不应该是游耕式的耕作。华北地区土地一般可以连续耕作,或一年耕作休耕两年,或两年耕作休耕一年,这样最多需要在规定土地上分三份便可耕作,而经典的砍烧游耕制一般要实耕八倍以上的土地。这样黄土高原农耕关键不是肥力递减,而是保持土壤的水份。据何柄棣先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反映的轮耕周期最多只有三年,证明了以上研究结论的正确。②

从考古发掘来看,不论是北方平原地区还是南方山地都有一个用石刀、金属刀耕作时期,这也被学者研究所证明。③至于火耕从古到今,从中国北方到南方都存在。具体分析起来有两种类型:

一是非游耕性火耕,这即是《盐铁论》称的“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具体讲一是开垦山林为耕地的垦地方式,即《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剉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一般开垦出来就不能短期内休耕再成森林。一是指固定耕地内每年耕前放火烧掉干枯稻秆、杂草以肥田。《齐民要术》卷二《水稻篇》:“北土高原,一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

江南、岭南盛行的“火耕水耨”也是指这种火耕类型。这种方式在中国南北地区都存在。如今云南纳西族在固定耕作地上将从外面收集的松叶背到地中与杂草一起焚烧以肥田；笔者少时在农村也经常看到固定耕作水田积稻秆焚而肥田。这决不能与砍烧游耕制相提并论。

二是典型的砍烧的耕作制下的火耕，这种火耕有两个特征：(1) 游动撂荒制；(2) 砍伐对象为原始木材为主。对此据尹绍亭先生通过长期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人类学的调查表明，云南少数民族现在刀耕火种采用一茬轮歇制（懒活地，即生荒耕作制）和轮作轮歇制（熟荒耕作制），一般要求实际耕作 4—20 份土地。

尹绍亭谈到一种人工的轮作轮歇制形式下缩短土地休闲而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是一般在每年阳历十二月至第二年开春二月之间砍木晒干，三四月雨季来临前烧地，四五月雨季来临播种。^④

笔者对唐宋时期三峡刀耕火种研究表明，三峡地区是采取“一再砍烧”的游耕制，其一般旧历春初砍木，等雨前夕放火烧山，下雨后乘热土下种麦豆，夏种粟谷，秋收粟。^⑤由于三峡地区温热条件不如云南，故砍木、烧山时间稍晚于今天的云南，但其反映的火耕的游动性、砍伐原生巨木、开垦与肥田兼有的火烧特征与今云南是不谋而合的。

从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不可能是典型的砍烧火耕制，因黄土土质肥沃和自我加肥特征没有必要实行游耕，这是《尚书》将雍州土列为上上等的的原因。要实行游耕，而黄土高原最长两年休耕的土地只能长出草而不可能是木材，目前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北方休耕的记载最多仅两年，还没有典型的游耕制记载，更无人们臆测的长达 20 年周期

的休耕抛荒记载。这就是说中国北方最初的农业最多是刀耕加上休耕两年，在连续耕作下火烧草和作物秆肥田，而后者直到现在在中国南北农村生产都有较多保留，并不是原始农业的固有特征。

历史上中国北方华北平原原始农业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砍烧制刀耕火种，那么是不是南方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都是经典的砍烧制呢？回答是否定的。

据笔者对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农业地理研究表明，三峡居民主要居住在沿江“山前遗址”（Piedmont site），最原始的农业是沿江平坝、台地的固定农作。三峡自然资源丰富，最初的农业只是作为采集、射猎和渔猎的补充，而三峡沿江平坝、台地一般土地肥沃，多自然溪泉灌溉，虽然用原始的石刀、石锄、金属工具耕作，但在人口密度低的条件下，没有深入到山地腹地火种的必要，故无经典意义上的游耕制出现。^⑥据笔者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刀耕火种，即畲田运动是在唐宋时期在人口增长的条件向山地开发而产生的，是西南地区经济开发第三阶段的产物。^⑦对此，对四川农业地理研究颇深的郭声波先生也谈到川东畲田运动出现在唐宋时期，是在移民压力下形成的。^⑧

又据尹绍亭先生研究表明，云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不是以原始的山地刀耕火种为最早的农作方式。据考古遗址、民族迁徙史、历史文献研究来看，云南地区最早的农业是坝区农业，乃种植稻谷为主，云南的刀耕火种是萌芽于汉晋、兴盛于明清较晚的农业。^⑨据笔者的研究表明，云南的刀耕农业最兴盛时期是在西南经济开发的第三阶段，即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农业起源的研究结论无疑可与三峡地区农业起源相互证明。传统认为刀耕、锄耕、犁耕的农耕发展三段论，但

云南现代少数民族刀耕火种三种工具俱全。这样看来,虽然在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展了石刀、金属刀等工具,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轻率推论当时的耕作方式为刀耕火种,即经典的刀耕火种砍烧制,当然即使是在历史上出现了锄耕、犁耕也不一定就不是刀耕火种的游耕制。农业工具进步程度并不是百分之百与某种耕作方式有必然关系。

三

刀耕火种产出一定低吗?刀耕火种的效益一定低吗?请看尹绍亭先生的论述:“首先,粗放比集约省力……粗放耕作所需工数不到集约耕作的一半,其省力的优越性是十分突出的。其次,粗放比集约产量高……在正常的情况下,滇南传统粗放的懒活地的陆稻产量,一般为600斤左右,有的甚至达到800—900斤。滇南傣族传统水稻产量也不过500斤左右,近年来改种杂交稻,产量大部分上升到600—700斤,也不比山地民族粗放的懒活地高多少。……粗放耕作比集约耕作省力、产出高、生态效益好,不仅刀耕火种如此,水田农业也是这样。”^⑩从笔者对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历史的研究亦可知,“唐宋时期畲田的经济效益是应该肯定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口稀少而林地广袤的条件下,火烧后的肥力是十分丰富的。历史记载也说明这个问题。刘禹锡《畲田行》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这说明当时畲田的经济效益是较好的。范成大《劳畲序》称:‘巫山民以收粟300斛为率’,以一斛120斤计算,共可收36000斤左右。以一家六口计,人均一年仅粟便有6000斤。由此可见正常年景其不可能有饥迫之苦。范成大称当时三峡农民:‘虽平生不认粳稻,而未尝苦饥’,却非虚语。”^⑪再者国外学者罗依

·那帕坡特对新几内亚的赞比亚人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其输入与输出的比例是1:17.4,也证明了这种结论。^⑫

传统观点认为历史时期的刀耕火种使水土流失加重,是对农业生态的极大破坏,似乎已经“臭名昭著”了。其实,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在远古时期,蛮荒四野,人少林多,人类利用火种方式烧山,使猛兽出没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森林部分变成耕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是一种进步,自然不可简单地与今天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挂上号。

那么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刀耕火种的生态效益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对三峡地区的畲田运动考察发现,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畲田运动,“漠漠烧畲烟”正是当时三峡农业开发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可是在这种刀耕火种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水土流失。唐宋时期三峡地区长江支流都清澈可掬,即使是在汛期也一样,这种状况甚至在明代仍然如此。^⑬据郭声波先生研究表明,三峡长江干流在唐五代北宋秋季时清白清绿,只是到了南宋时出现浑浊的现象,^⑭这已是三峡地区轰轰烈烈的畲田运动500年后出现的,且这种现象并不突出。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在亚热带、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刀耕火种不论是一茬轮歇制或轮作轮歇制,一方面有严格的护林制度,一方面在湿热的条件下休耕7年至30年之久,其抛荒休耕地随时保持丰茂的森林,不会造成水土流失。据尹绍亭深入研究表明,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对保护森林有严格的制度,对于神山、坟山林、风景林、水源林、护道林、轮歇地林(包含树桩及根)不随便砍伐,在焚林时又有严格的

隔火道制度作保障。又据郭声波在滇南调查表明,直到 80 年代,滇南腾冲、景洪等地刀耕火种基本上不会导致水土流失,相反是在汉族固定山地垦殖区出现了水土流失。

据对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典型的刀耕火种一般要求人口密度在 15 人/平方公里和人均耕地 21 亩左右。三峡地区唐宋人口密度在 5.90—21.65 人/平方公里之间,基本在这个数字内。刀耕火种造成水土流失是在人口膨胀人多地少的状况下从一茬轮歇向轮作轮歇,继而向连贯固定的斜坡地农业演变的结果,是从刀耕、锄耕、犁耕演变的结果,不过那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了。这种转变过程也可从明清三峡和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中找到证据。

据我们研究表明,明清时人口膨胀,林地短缺,连年种垦,轮歇地变少以至不存,森林保土保肥功能失去;清朝后期三峡人口密度已在 30 至 80 人/平方公里之间了。唐宋三峡地区畚田砍伐和火烧的是巨木,可是在明代三峡地区畚田则主要是焚草了,便是这种现象的说明。明清时期三峡及川陕山地地区水土流失记载不绝于书,如“宜昌一带迨耕种晚,肥力为雨洗净,粪种也不能多获者,往往人烟凑集之处,今皆荒”。^⑮鹤峰“初垦时土甚肥。年久为雨潦洗,尽成瘠壤,终岁所获无几。”^⑯据严如澂记载,清嘉靖时三峡刀耕火种的休耕只有三五年,且由于用锄、犁耕作,树桩受损,故“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⑰故长江上游“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乃至停淤接涨”。^⑱

尹绍亭认为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处于衰落阶段,实际上也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尖锐的表现,正是对

以上三峡地区火种变异为斜坡挂地固定锄耕造成水土流失而失去生态效益的最好说明。

由此看来,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条件下的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并不会造成水土流失,且产出很高,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可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四

美国学者 A·特里·拉博曾说到“当在适当的人口密度水平下实行刀耕火种耕作时,这种耕作方式乃遭受最小的病虫害侵扰,几乎不会引起环境生产力的退化而提供可靠的产量”。拉博的结论主要是据非洲现代刀耕火种民族研究的结论,而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发展嬗变研究表明,中国历史的刀耕火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决不能简单进行概念化的臆测。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对前人及我们的刀耕火种研究作一总结,并不是仅想为历史上和现代刀耕火种正名,也不是仅想从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吸取生态农业的合理内核,为今天的生态农业提供借鉴,因后者我们农业经济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不必赘言。

我们最后由此引发出的是对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式的思考。

从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研究深入和有所突破历程来看,有赖于在系统论基础上多学科综合攻关,特别是有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这其中,有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尹绍亭先生的民族学考察,有何柄棣先生从土壤学、生物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有李根蟠先生、卢勋先生从考古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也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它活生生地告诉我

们运用新方法、新思想来研究历史是大有前途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80年代在社会科学“新三论”、“旧三论”风行一时,曾提出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但这犹如昙花一现,不久便在种种责难之中在社会科学界几乎消声匿迹了。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昙花一现决不能说明“新旧三论”和自然科学方法不好或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之所以造成昙花一现的现象可能原因有二:一在于传统思维方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在于提倡新旧三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是一些青年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囿于社会科学知识根基薄弱,缺乏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成功个案的支持,故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

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一大批受过正规培训而相对有较高自然科学素养的社会科学博士、硕士生在继承老一辈国学基础上,有志于对传统的经济史作新的开创研究,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新时代即将到来。

(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史,很大意义上讲是一部农业经济史。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自然界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可建国50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一部完全抛开自然环境的单纯社会经济史研究。当在80—90年代现实中的人们惊呼环境保护,强调保护生态平衡时,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使我们在现实中将环境保护立为基本国策时,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没有回过头来用现代生态观、人地观审视我们的经济史,没有去考察古人的生态效益,这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三)我们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当原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讲经济效益,即有一定规模才能有经济效益,但决不是对任何阶段经济史的评价只以亩产、总产量或文献中的“国泰民安”、“夜不闭户”来评价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程度。特别是在讲求经济效益讲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历史上经济发展效益的研究似乎尤为急迫。应该承认我们仅是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学术界对中国历代生产经济效益作了系统研究后,一定会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封建社会科技无本质上突破等问题有新的认识。●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②(美)何柄棣《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法:科学、训诂互证示例》,《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③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⑨⑩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⑥⑪⑬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⑦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⑧⑭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⑫转引自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⑮⑯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五、卷一。

⑰严如澂《乐园文集》卷七。

⑱陶毅《陶文毅公全集》卷一〇。

责任编辑:郭秀文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 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5)

[关键词] 审美意识形态 原理 文学

[摘要] 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泛哲学化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文学理论需要摆脱政治的附庸。“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它不仅是对“政治工具”论的“冲击”,而是有建立理论基础价值的理论建树。作为较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本文作者较完整地阐述了“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的理论基础和原理的构成。

[中图分类号] I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105-08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由一部分学者率先提出的关于文学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价值”论,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这一理论重新被唤起,几乎为全体理论界人士所接受,认为是合乎艺术规律的。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公正的估价。

最近出现了一些总结新时期 20 年来的文章,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点。这种总结无疑是有意义的,必须予以肯定。但是,这类总结又往往把当时提出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仅仅看成是对“政治工具”论的“冲击”而已,似乎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失效,并不是什么理论建树。更有甚者,有的人把“文学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说成是“审美”加“反映”、“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简单拼凑,说成是过时的“纯审美主义”等等。我并不认为他们这些说法是公正的,或者说他们并没

有真正了解“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真谛。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国际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有少数学者重新谈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认为不能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它仍然是正确的。似乎又要走回老路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申述我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也是当时较早提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人之一,而且至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甚至认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整一性

我们说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并非把文学看成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明确把“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一的系统。这里我想首先说明“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一性和独立性问题。

在马克思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中,社会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政治制度等,

一类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要寻找社会经济基础的解释。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制约要经过多种“中介”，有时候这种制约作用并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等作为“更高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语），其相对独立性就更加明显。有时候我们很难找到最“上层”的艺术与最“下层”的经济的联系。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艺术生产的发展的不平衡的关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盛唐时期无论如何“昌盛”，其物质生产无论如何也没法与我们今天高科技时代的物质生产相比，但是却生产了魅力无穷的、无与伦比的盛唐诗歌。诗歌的生产不是直接与经济的发展的程度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存在着一条不断进步的规律，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却不存在这种“进步”的规律。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诚然是那个社会的产物，有产生它的独特的多种的社会条件，但一味把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直接联系，是没有意义的。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①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极有意义的。可惜布罗夫对这个问题未展开来论述。不过，这里

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通常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对具体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和概括。那种所谓无所不在的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存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如上面所说的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具体的形态。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哲学意识形态不是“哲学”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机械拼凑……。当然，所有这些形态的意识形态有它们的共性，即它们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的对象是不同的。哲学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总的根本性的反映，着重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何者为根基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是反映社会生活中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冲突与妥协问题。法意识形态则是对于社会生活中统治集团按其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所反映出来的思想领域……。审美意识形态一般而言是对于社会中人的情感生活领域的反映。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反映对象的差异，也导致它们的形式上的差异。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自然，各个形态的意识形态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但又互相独立。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的确有靠得近与远的区别，但它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

这里没有“老子”控制“儿子”的那种关系。例如,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总是顺从的关系;相反,审美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劝”、“监督”、“训斥”等,也是十分正常和合理的。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说的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的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显现出来。如果我们上面所说的能够站得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中一个具体的种类,它与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可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里不存在简单的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像过去那样把文学等同于政治、把文学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的观念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精神的。80年代初期,学术界提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的“审美反映”论等,也就不是简单地把“审美”和“意识形态”嫁接起来,更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的理论建树。

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内涵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与其它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共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现在某些人所说的“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有丰富、完整的内涵的。这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说明。

第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

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鲁迅曾经说过: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的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②鲁迅所说是正确的。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普遍之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

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主体的特征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

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 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③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④

这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

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功利性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 Brandes, 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

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⑤

这里，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⑥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刘勰继承老子庄子的悟道的“虚静”说，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出文学创作中的“虚静”说：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

意思是说：在酝酿文思的时候，可贵的是虚心和宁静，清除心里的成见，使精神处于纯净状态。“虚静”就是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这样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所以“虚静”可以理解为审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

“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所以鲁迅说:文学“给人的愉快与休息,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⑦鲁迅还说过,文学是“无用之用”。这意思就是说,文学意识的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了实现间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真实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是不同的。科学所承认的意识,是不允许虚构的,科学结论是实实在在的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意识是审美意识,它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是在艺术假定性中所显露的真实。这里,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了。

文学虽然有对现实的不同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所以,文学的真实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假定与真实的统一体。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允许作者去假定去虚拟,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并为它欢喜或落泪,可并不认为它是实有其事。作者却也“宽宏大量”,允许读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当作事实看待,允许读者把他的作品当作“谎话”(或者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庄严的谎话”)。正是在这种默契中,文学放心大胆走到了艺术假定的这一极。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实

的记录,是假定的虚构。如果谁违反了文学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学变成事实经过的流水帐,那么文学就要变成非文学。俄国著名戏剧导演曾说明戏剧的假定性:

我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见到过几乎在所有剧本中作者们都这样指示的房间:在前景上左边和右边都有门;后墙中间又有门;在后景上左右两边都是窗户,你就试来建筑这样的房间看看……在生活中这简直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艺术的、假定的真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决。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谈的是剧场的假定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所有的艺术都是相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也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⑨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书本上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这两位艺术家的论点同样适用于文学。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神画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在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没有文学。然而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假定是具有真实性的。鲁迅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着,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⑩

鲁迅这里所说的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意思就是

文学是假定的,但这假定如果“加以推断”,那么就像预言一样准确,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了。这就说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谎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意识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

艺术真实性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又不止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的过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回忆、联想、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简括地说,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因此,作家可以不写真人真事,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真实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观园的一景,若孤立起来看,那茅舍,那青篱,那土井,那菜园,都与真农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逼真极了。贾政看了此处后,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但贾宝玉则不以为然。他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立,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

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贾宝玉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在他看来,“天然”不“天然”(即真实不真实),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内在联系。稻香村作为一个农舍,放在大观园中,与那些雕梁画栋、楼台庭榭连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不合理的。倒是“怡红院”、“潇湘馆”等与大观园的景观有一种内在的整体的联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贾宝玉的话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对于文学,当然是可以假定和虚构的,但在假定和虚构的情境中,则不可人为地编造,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整体的天然的联系,即要“合理”,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来。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要“合情”。按文学的审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为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性。所谓“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人们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虚构的升华为真实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提升为艺术的真实。例如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按事实来考察,这个诗句所描写的是不真实的。但是大家都觉得李白这句诗很真实,是李白自己的真切感受:黄河之水从高原奔腾而来,水流湍急,巨浪涛天,一泻千里,使人觉得这河水从天而降。黄河的雄伟气魄被这诗句淋漓尽致描写出来了。一个并不符合事实的描写,由于写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变

得真实了。在文学审美描写中,真挚的感情更为重要。真挚的感情可以把虚幻的提升为真实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复生,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于作者在描写中灌注了浓浓的感情,虚幻之笔竟然也成为可以接受的艺术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的真诚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这个真诚的意向成为作品的艺术逻辑,使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了默契,那么十分怪诞之笔,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鲁迅的小说《药》,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若隐若现。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实的。但是由于作家的真诚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于是怪诞的描写也成为真实的描写了。

通过以上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具有艺术真实的品格。艺术真实性是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感情的统一,也就是艺术描写的合情合理性质。当然,在文学中,经常遇到的是情与理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应该牵情就理呢,还是应该牵理就情?一般来说,由于文学的意识的审美特性,十分重视感情的评价,如果遇到上面所说的情与理矛盾的情况,就应该牵理就情。上面所举的《牡丹亭》和《药》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既着眼于文学的对象审美特性,也重视把握对象的审美方式,既重内容,也重形式。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所谓的“纯审美”论。

我之所以特别“钟情”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文学“审美反映”论,根源

在于我对文学特性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的角度来界说文学,如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学是一种人的活动,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和认识,文学是一种语言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回答都有道理。问题在于当我们要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的时候,从社会结构这个层面,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个层面去把握文学的特性,我认为还是最为恰当的。这样我至今认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①阿·布罗夫《美学:问题和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 页。

②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64 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96 页。

④《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3 页。

⑤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61 页。

⑥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41—41 页。

⑦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43 页。

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作札记》,见《世界艺术与美学》第 2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第 239 页。

⑨《毕加索论艺术》,《艺术译丛》1981 年第 2 期。

⑩鲁迅《给徐懋庸》,《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98 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

□ 陈书良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湖南 长沙 410000)

[关键词] 陈寅恪 世家子弟 诗

[摘要] 本文作者认为, 陈寅恪先生不仅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而且是一位颇为恋旧的“世家子弟”, 这在他的大量诗文与交友中反映出来。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1-0113-07

一

陈先生 1932 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写《审查报告》, 曾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是很忠实的自我剖析。1945 年, 陈先生卧病英国伦敦医院, 听人读熊式一著英文小说《天桥》。这本书中写了光绪戊戌时李提摩太上书事。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 曾任天津《时报》主笔, 后企图影响维新运动, 一度担任过光绪帝的“顾问”。听到这里, 陈先生回忆起 1902 年春 13 岁时, 随兄长师曾东游日本, 在上海遇到李提摩太, 当时李教士用华语说: “君等世家子弟, 能东游, 甚善。”往事如梦, 已经 42 年了。陈先生忆及此事, 百感交加, 写下一首沉郁的七律:

沉沉夜漏绝尘哗, 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 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 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 词人终古泣天涯。

三四句说, 自己梦魂虽然还是萦绕着故

国, 但昔日的王谢子弟早已无家了。虽然陈氏在诗题中说“非敢以乌衣子弟自况”, 但纵观陈诗前后文, 显然作者是以乌衣子弟自况的。

正因为如此, 陈寅恪诗文中总流露出一种“旧时王谢”的“旧巢”情结。如“南渡饱看新世局, 北归难觅旧巢痕”(《壬辰春日作》); “念昔伤时无可说, 剩将诗句记飘蓬”(《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 “来日更忧新世局, 众生谁忏旧因缘”(《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 “珍重玳樛香茜影, 他生同认旧巢痕”(《甲申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图》)等等, 他更在《寒柳堂记梦》的“弁言”中大发“旧巢”感慨。“弁言”一开头就说:

东坡诗云, “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又云, “九重新扫旧巢痕”。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旧巢之旧痕既可扫, 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 岂可不记耶?

接着他引叙了早年为纪念康有为百年诞辰, “因感吾家与戊戌政变事”的七律句云:

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

元祐党家应有种,江潭骚客已无魂。

“江潭骚客”当然是自指,然而“旧痕”何在?“元祐党家”何谓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还是在《寒柳堂记梦》的“弁言”中,陈先生感叹“梦痕不仅可记,其中复有可惜者存焉。”他还回忆起童时读庾信《哀江南赋序》的辞句:“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承认自己“深有感于其言”。这里的“家风”、“世德”无疑是“可记”、“可惜”的“梦痕”的主要内容,也是“旧巢”情结的主要内容。

我通读了陈先生已发表的所有诗文,认为他的“旧巢”情结在湖南长沙。

二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旧名义宁)人,祖父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举人出身。咸丰十年,30岁的陈宝箴入京会试,适逢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陈于酒肆中遥遥望见冲天大火,捶案痛哭,一座皆惊。陈宝箴的一生似乎与湖南特别投缘。咸丰十一年他南归省母,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驻安庆,一见陈宝箴,就赞叹道:“海内奇士也!”引为上宾,后来赠联有“半杯旨酒待君温”之语。①同治六七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举家迁长沙。光绪元年,陈宝箴署湖南辰永沅靖道事,治凤凰厅。后一度到浙江为官,免职后竟又恋居长沙,自放山水间。素有改革之志的陈宝箴常对人说:“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②光绪二十一年八月,陈宝箴诏授湖南巡抚。

此前,前任巡抚吴大澂已在湖南进行过某些革新,陈宝箴到任后,与早一年莅湘的学政江标密切配合,湖南风气骤

开。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就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按察使,徐仁铸接任湖南学政,这几位省级大员都思想先进,主张维新变法,于是,湖南维新运动得以蓬勃兴起。

陈宝箴认为,国势不振已到极点,非扫除弊政,兴起人材,中国无以图存。而“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忤,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③因此,受任湖南令他十分高兴。他慨然以开湖南新政为己任,计划将湖南作为实行改革的一个基地。

关于陈宝箴抚湘的初衷,50年后,陈寅恪先生明确地指出: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楷模,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④

湖南长沙给陈寅恪先生带来了温馨、荣耀,也带来了剧痛和悲思。他与这块土地的“因缘”是很深的。

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通泰街周达武宅,传说这里是唐代文士刘蜕的故宅,后为周达武所购,当时是周南女中校舍。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授湖南巡抚,当时陈寅恪6岁,全家搬到抚衙居住。陈三立先生为寅恪兄弟请的塾师是湘潭周大烈。据陈师曾《蜗牛舍诗集序》云:“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线装铅印本《夕红楼诗集》二册,注云:“湘潭周大烈,字印昆。”可知先生的塾师周大烈也是风雅人物。总之,陈寅恪先生在长沙度过的童年是非常温馨的,祖、父事业有成,塾师学问渊雅,兄弟则有相从相游之乐。民

国五年(1916年)秋,27岁的陈寅恪重到长沙,兄隆恪有《长沙将见六弟于旧抚署,计侍先祖去此二十年矣,抚念今昔,怆然感赋》:⑤

风云开济几人存,万古灵标照棘门。
 落眼楼台温梦寐,攀天双桂拾秋痕。
 廿年兴废供弹指,往事迷离共断魂。
 改服康屯知继起,西山葱郁护朝曦。

三、四句下隆恪自注云:“东西内院各植桂树一株,大可合抱,童时常与诸弟嬉游其下。”兄弟嬉戏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当然是“温梦寐”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陈寅恪先生前后四次来长沙。民国五年,先生由京至湘,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词三阙纪行,载《东方杂志》十三卷第十一号文苑栏,这也是陈先生平生仅见的三首传世词。其中《浣溪沙》有句云:“来往江城惆怅客,泪痕和墨教题诗,洞房空想碧螺卮。”句中“江城”当然指长沙,因湘江流贯城西。“惆怅客”当是先生自指,显然“惆怅”与追怀往事有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湖南的维新运动与自己的祖、父关系极深,而湖南的维新人物属于清流。这一点,他不仅在《寒柳堂记梦》的“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节中有系统的交代,而且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有精到的论述。既然自己祖、父推行的维新运动属于清流,却惨遭失败,致使光绪帝被幽禁、六君子喋血京城,康、梁亡命东瀛,而祖、父也遭革职,并“永不叙用”,那么,对于这段尘封的往事,作为深谙古典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自然在其诗文中信手拈来一个成语——“元祐党家”。如前引《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

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
 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
 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

陈先生这首为康有为百年诞辰作的七律,议论“百年世局”。第四句“东京”亦即北京,“旧痕”应指包括作者祖、父在湖南的维新事业在内的戊戌变法。第五句作者原注:“指新会某世交也”,似乎指梁启超的后人而言,我认为,其实也是作者的自况。第六句“已无根”,“根”者,作者在湖南长沙的“旧巢”也。所以最后以玉溪生暗吞伤春泪作结。为证明以上的解释不是臆断,试再举例陈先生的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参证:

……鰕生瓢落百无成,取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其中,也醒目地出现了“元祐党家”。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对这首诗十分推崇,曾作有《王观堂先生挽词解》,其中关于“元祐党家惭陆子”的解释是: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知严州。《谢王丞相(淮)启》有云:“伏念游元祐党家,绍兴朝士。”盖陆游祖父陆佃,师事王安石,官至尚书右丞。持论平正,为新党所不喜,列为元祐党人。按寅恪之祖父陈右铭公(宝箴)戊戌年任湖南巡抚,以保荐康有为及在湘行新政,罢职。父伯严先生(三立)以在湘参赞新政,革去吏部主事,禁锢于家。故寅恪以陆游自比。彼为元祐党人,此则维新党人耳。寅恪云:“以元祐之党家,话贞元之朝士。”语出陆集。

戊戌政变及陈家在政争中的荣衰极大极深地给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打上了烙印,湖南长沙也就成了他一生的伤心所在、情结所在。我们读陈先生的诗文甚至学术论著,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到处跃动着作者的感情与生命。象《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学术巨制,全文不仅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而且随处附见他自己所写的诗篇。这在文史论著(尤其是考证性较强的论著)中是颇为罕见的。

三

陈寅恪先生与湘籍人士有着很深厚的情谊,这也是其长沙“旧巢”情结的一个构成面。据《吴宓自编年谱》载,俞大维曾告诉吴宓,早在民国四年(1915年)陈寅恪26岁时,在北京担任过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⑥蔡锷是当年11月逃离北京的,陈先生任秘书虽然时日甚短,但无疑蔡锷对其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后来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恶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可为我以上揣测的佐证。此外,他与衡阳曾熙亦有交谊。曾熙是有名的书画家,是陈三立的朋友,1928年陈寅恪先生结婚时,曾熙曾绘《齐眉绥福图》为贺。

陈宝箴认为湘人“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陈寅恪则结合自己的择友原则,对其祖的观点有着更细致的发挥。他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说: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杨树达)少日即已肆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陈寅恪先生在湘中学术界有了不少挚友,其中首推刘永济先生。

刘永济(1887—1966年),湖南新宁人,字宏度,别号诵帚,是笔者的伯外祖父。刘的祖父刘长佑曾任清朝云贵总

督、直隶总督等职,所以刘与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世家子弟”。刘永济曾任东北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代校长,建国后评为一级教授,“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含冤辞世,著作有《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词论》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先生从沈阳到北京,陈先生偕同游览北海天王堂,曾作七律一首纪游,后四句说:

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

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两个知识分子苦无长策。抗战时期,刘永济在乐山讲学,听说香港陷落而陈寅恪先生逃脱,将取道桂黔入蜀,即赋《喜迁莺》词劝其来乐山,中有“知否?人正在,野水荒湾,灯底相思苦”,抒发了两人深厚的友谊。1939年,陈先生拟往英国医治眼疾,这时接到刘先生的赠诗,有“万里乾坤”、“百年身世”之句,陈先生非常感动,赋一律答之:

得读新诗已泪零,不须藉卉对新亭。

路人苦信乌头白,野老惊回柳眼青。

万里乾坤孤注尽,百年身世短炊醒。

入山浮海都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

这是一首感时寓事之作,无疑,“百年身世”一句寄托了家族兴衰之慨。1947年,陈先生任教清华大学,作《丁亥除夕》诗抄寄刘先生: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饕餮觥。

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

战乱连年,而自己又病废缠身,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下,除夕徒增伤感而已。刘先生读后,作《鹧鸪天》一首劝慰:

绝倒驴鞍那可期,拂簪盥眼定何时。重衾夜夜江山梦,老去龟堂未断痴。红烛泪,替

谁垂,更长吟坐独成悲。残梅乱雪纷纷里,已觉春光冉冉非。

第一句用赵太祖定天下,华山陈抟从驴背喜跌事,说明太平难期;第二句用后汉任永、冯信二人在乱世以目盲避隐,而时世清平则皆盥洗目明事,切合陈先生的眼疾。两位老友互相安慰是很动人的,也是很令人心酸的。

1961年,陈先生在中山大学,刘永济在武汉大学,而他们的另一位好友吴宓教授则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他们都看到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磨炼。当时政治空气相对宽松,吴宓决定利用暑假专程到广州看望老友。对于吴宓此行,陈先生非常重视,从行程到生活,都作了仔细考虑和周到安排,于8月8日写信给吴宓和刘永济。给刘的信如下:

弘度兄左右: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兄近日不下楼,岂行走不便耶?念念。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即广九路)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两封信(陈寅恪致吴宓书不录出),被人“寄赠”给耶鲁大学历史系余英时先生,而一向标榜视中国文化如性命的余先生又将它“转赠”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特东方图书馆,直到1987年才在

香港《明报》披露,令人扼腕!令人怅然!1961年8月25日下午,吴宓乘轮抵汉口江汉码头,刘永济派长婿皮公亮迎接。吴在刘家小住四天,“互述改造、工作、生活之大概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变迁。”^⑦

吴宓到广州后,与陈寅恪“暮年一晤”。陈先生写了几首诗赠给吴先生。三十几年后,余英时先生对吴先生的一则日记和陈先生的一首绝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段“公案”遂被海内外炒得火热。下面我谨就余先生的“兴趣点”略抒己见。

吴先生1961年8月30日日记云:“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体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对此,余先生认为:“现在我们知道陈先生主张中国与苏联分裂以后应该突破‘卑田院’,回到‘中国文化本位’,这则日记的涵义便颇不寻常了。我们不难由此推测陈、吴两人‘暮年一晤’谈话的大概内容。”^⑧我认为余先生的结论是武断的,是将自己的感情强加于陈、吴诸前辈学人。我的理由有二:一则陈、吴、刘三人是极为知心的朋友,此次陈、吴的谈话内容应该大体即是早几天吴、刘的谈话内容,也就是吴在8月25日日记上记载的“互述改造、工作、生活之大概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变迁。”二则所谓“毫未改变”、“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云云,这当是三位学人就治学态度、生活宗旨上的交流。三人之间类似的交流如1927年7月,陈寅恪先生到清华大学,与相违五年的老友吴宓相晤,吴既高兴又感慨,当即赋诗一首相赠。这首诗反映出吴对人事纷争的厌烦及未能畅达其志的失意。他曾将此诗寄给两人共同的老友刘永济一阅。据1926年9月5日《雨僧日记》云:

近得刘宏度函云：“奉手片，诵新诗（七月七日赠陈寅恪诗）殊幽怨。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急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均可作为座右铭也。

我认为，这种谈心纵然牵扯到时局和政策，也是学人之间的互诉心曲，一切以学术研究为要，以个人修养为要。1961年三位朋友的晤谈内容应当不出这种范围。

至于令余英时先生大感兴趣的那首诗，是陈先生送给吴先生的一首七绝：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巨公谩诮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余先生的解释是：

这是一首讽刺毛泽东的诗，可由“巨公”、“飞腾”、“卑田院”诸词的涵义而完全确定。《汉书·郊祀志上》：“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注引郑氏曰：“天子也。”张晏曰：“天子为天下父，故曰巨公也。”“巨公”既是“天子”，则自非毛泽东莫属。韩愈《符读书城南》古诗：“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六“飞黄”注引《淮南子》：“飞黄，神马也。”韩诗此处虽不指天子，但既言“龙”乘“神马”而飞腾，自可取以配“巨公”。陈先生此句指毛泽东乃益无可疑。^⑨

我认为，余英时先生之说大谬。其一，“巨公”不一定指天子。李贺《高轩过》：“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巨公”即指韩愈和皇甫湜。这应该不是一个生僻的典故。至于“飞腾”乃形容词，飞扬生动之意，将其解为“飞黄腾踏”，实在是违背了古代汉语的规律。其二，1930年，陈先生《阅报戏作》诗中即有“弦箭文章苦未休”，所谓“弦箭文章”，指攻击性的文字。综观此诗，“巨公”者当指那位宣称要在史学资

料的占有和掌握方面超过陈先生成就的学术权威，这是很多老一辈学人都有所闻的故实。其三，陈先生一生除给杨树达的信中隐蔽地提到毛泽东主席外（而且还是肯定性的提法），从没有见诸文字，更不会赤裸裸地写诗讽刺了。这一点，下文将涉及，此不赘。以上是从刘永济诸事生发，显然离题太远了。

除刘永济外，陈先生还与杨树达、瞿兑之、王啸苏等湖南学人相厚。

杨树达（1885—1956年），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建国后曾任湖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词诠》、《汉文言修辞学》、《积微居金文说》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26年9月，杨先生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了和陈寅恪先生的交往。陈先生对杨树达先生评价甚高，曾写诗为杨祝寿，中有句云：“一代儒宗宜上寿，七年家国付长吟”。^⑩他还撰写了《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在前文中，他写道：

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可见推重之诚。1952年12月，杨树达曾写信给陈垣先生，表示要取法高邮王念孙父子，陈垣先生复信道：“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前屡得骆君绍宾寄示近作，甚欲以此意谕之，不知尊见以为何如？”“法韶山”，就是向毛泽东学习。大概是杨树达将陈垣此信告知陈寅恪，于是，陈寅恪先生也向杨写了一封信：^⑪

遇夫先生左右：顷奉手示，而大著适于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复，致劳远念，歉甚。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

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言也。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敬叩著安。弟寅恪敬复。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

信的开头,再一次肯定了杨树达的学术成就,接着,陈先生风趣地将杨比为“丰沛耆老、南阳近亲”。“丰沛”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耆老”、“近亲”者,家乡人也。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对毛泽主席完全是善意的态度。刘邦、刘秀虽然比拟非伦,但作为旧知识分子,应该说褒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陈先生明确地表示这种比拟“其意甚厚”,也就是说善意的,不是冷嘲热讽。最后,陈先生幽了一默,说自己的出生地风水亦不恶,可惜陈坦不知道罢了。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陈先生出生地长沙通泰街周南女校,原是周达武故宅,而周达武是明代吉王后裔,入清后为逃脱杀戮,改姓为周,所以陈先生戏说自己也算是沾了帝王气了。

王啸苏,长沙人,名竞,以字行,为清华研究院第一期毕业生,曾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曾作有《答王啸苏七绝》三首,其二、三云:

东坡梦里旧巢痕,惆怅名存实未存。
欲访梁王眠食地,待君同去郭西门。

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
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

其中第二首的“旧巢”就是第三首的“潭州官舍”,第二首的“名存实未存”就是第三首的“死生家国”,都是抒发作者的长沙情结。由于对象是湘籍学者,又谊属

门生,故而更显得情真意切。

瞿兑之,长沙人,曾任湖南大学教授。他的祖父瞿鸿禨号止庵,曾担任过清朝的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所以他也是一个“世家子弟”。陈寅恪先生作有《寄瞿兑之》七律一首:

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筒惊喜见公休。
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
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
论交三世今余几,一别沧桑共白头。

沉郁的长沙情结,惨痛的家国之恨,在“论交三世”的友人面前,象沅湘汨汨流涌而不能抑止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陈寅恪在学术上是一个纵横驰骋、不断创新的学者,在生活上、感情上却是一个颇为恋旧的“世家子弟”。反映在其诗文中,则存在着一个沉郁隐蔽的长沙“旧巢”情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陈先生这种情结,并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在阅读、阐释陈先生诗文时注意到这种情结,应该说较之那些“暗码”说更为公允、更为适合。谨不揣陋劣,申说鄙见。博雅君子,请教正之。

①⑤⑥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上、卷中、卷上。

②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

③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壬戌陈宝箴奏章。

④《寒柳堂记梦·六》。

⑦1961年8月25日《雨僧日记》。

⑧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⑩《杨遇夫寄示自寿诗五首即赋一律祝之》。

⑪见《积微居友朋信札》,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王 可

中国学在印度

□ 郁龙余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东 深圳 518060)

[关键词] 印度 中国学 研究

[摘要]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近代。《辛格日记》(《在中国的十三个月》)是早期印度人对中国的宝贵记录。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应归功于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成立,对印度中国学研究贡献巨大。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得到许多著名人士的支持,如印度的甘地(M·K·Gandhi)、尼赫鲁(S·Nehru)及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戴季陶诸公。随着中国学在印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国学家和优秀学术成果。而谭云山和师觉月(P·C·Bagchi)则用力最勤、成果最著。当代,印度中国学研究方兴未艾。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120-04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是近代以来的事。

完全以一个印度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可以追溯到戈达达尔·辛格(G·Singh)和他的日记。辛格日记本身虽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但它的出版,在中印近代关系史上非同一般。辛格是英国殖民当局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一名印度士兵。他从开始就怀疑这次出兵的动机。对英军来华后的血腥杀戮、疯狂抢掠更是反感和愤慨。他是个低级士兵,没有公开倒戈,只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国人,并将他耳闻目睹的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中国人的惨状,用印地语写进了他的日记。回到印度后,他冒着极大危险,躲过英印当局的检查,以《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为书名,公开出版了他的日记。于是,在印度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辛格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民是信佛教的,和印度人信的是同一种宗教。我们同是亚洲大陆上的居民,所以中国人也还是我们的邻人呢。他们的肤色、风俗、礼貌和我们的也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什

么神要降这样的灾难到他们身上呢?难道我们不倒应该去帮助他们吗?”^①这是反映中国当时社会的一部特殊作品。现在,这部日记成了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1924年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访华,他谈文说艺,论诗评画,还观看了梅兰芳的京戏《洛神》,实在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其间,泰戈尔对我国古典诗歌十分赞赏,言说间常常对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旁征博引,对他们创作意境之美、创作手法之高超,表示由衷钦佩。泰戈尔是通过英译本来学中国古典名诗的。英语是印度的通行交际语,所以我们相信,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印度学者通过英译本来欣赏中国作品,一定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从泰戈尔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情况已有相当的改善。印度文学家们已经从英文翻译了若干著名的中国小说,并对这些小说展开研究和评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致力于中国五四新文学不同流派的研究,

夏兰(Vimla Saran)研究的重点是茅盾。在印度,鲁迅研究很受重视。1981年,尼赫鲁大学组织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印度全国有三、四十位学者、作家和在校学生撰写论文。这在中印文学关系史上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应归功于泰戈尔。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第一个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该校就将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巴克济(师觉月,P·C·Bagchi)送到越南、日本、法国去培养。1921年,泰戈尔成立国际大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学在国际大学具有突出的地位,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学校还专门从法国聘请著名中国学家西尔万·列维(Sylvain Levi)为客座教授,专讲中国佛学。几年之后,中国学研究在印度不断得到发展,水平亦不断提高。如著名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Kshitimohan Sen)教授,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成了印度对中国学研究最深的学者之一。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后,赴印的中国留学生从无到有,逐渐增多。中国留学生是沟通中印的重要桥梁,他们一方面学习印度文化,同时为印度中国学的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所以,甘地(M·K·Gandhi)、泰戈尔等人对他们十分钟爱。曾圣提是第一位赴印的中国留学生。他留印的动因是受苏曼殊的感召和泰戈尔的鼓舞。所以,他随着泰戈尔访华回国的脚步,来到了国际大学。后来,他又到了甘地创办的沙巴玛提真理学院,师奉甘地。甘地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还给他起了一个梵文名字“圣提”(和平、宁静,shanti)。国际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在1937年中国学院建立之后,有了巨大进步。

早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就曾

有人提出建立“中印学会”,泰戈尔说本有此意,但因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没有提出正式倡议,然而从此他一直惦记着此事。1931年,中国学者谭云山在拜会甘地时提出中印加强联系的想法,深受甘地赞同。后来,他又将此意告诉泰戈尔,发现他早有此意。于是,成立中印学会的设想变成计划。谭回国后也获得许多人士的支持和赞成,特别是蔡元培和戴季陶,支持最力。不久召开筹备会议,43名发起人中有谭云山、周谷城、太虚、梁漱溟、徐悲鸿等,另有蔡元培、戴季陶、于右任等24位名流作赞助人。1934年5月,印度正式成立“印中学会”,设在国际大学,泰戈尔任主席,尼赫鲁(J·Nehru)任名誉主席。1935年5月,中国南京成立“中印学会”,蔡元培为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为监事会主席。中国中印学会决定向印度印中学会捐赠中国图书,以助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图书馆。这批中国图书陆续运出,第一批就有6万卷。

中印学会工作计划中,一个重要项目是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泰戈尔等的大力呼吁和谭云山的四处奔走下,1937年4月,印度中国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印近代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举行成立典礼那天,如同盛大节日,泰戈尔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久盼着这个日子的来临,为我们的人民偿还从古已许下的宿愿,就是要维护我们印度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友谊,这是在1800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与伦比的忍耐和牺牲奠好了基础的。”②

谭云山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从此,谭云山领导中国学院,取得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在中印学会的组织和影响下,一批中国有志学者前往印度,如徐悲鸿、陈翰笙、常任侠、金克木、徐梵澄、吴

晓铃、陈洪进等。他们或讲学,或访问研究,与印度学者切磋交流,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中国学者赴印的同时,印度学者也陆续来华讲学。1944年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访问重庆,他讲学的重点是中印古代思想和宗教。1945年,印度美学教授甘歌利应邀来华讲学,介绍印度艺术。1948年,印度政府派遣师觉月教授来华,作为设在北京大学的印度历史和文化讲座的首任教授。师觉月是印度的一位梵汉兼通的著名学者。他在学术上取得非常重要的成果,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四卷论著《中国——印度丛书》中。这些著作在印度中国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最著名,分为8章,分别论述中印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学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在比较中印两大文明时,他谈了五个问题:(1)中国的天和印度的伐楼那;(2)中国的天子和印度的国王;(3)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印度的祭祖;(4)孔子的社会与政治思想;(5)道教与印度思想。^③

除了中国学院之外,设在德里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由著名学者拉古维拉(Raghrira)创立,他本人于1938年著成《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此后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论著。他的儿子罗凯什钱德拉(Lokeshandra)博士子承父业,专心于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成为享誉全印度的中国学专家。

巴帕特(P·V·Bapat)和戈克雷(V·V·Gokhale)也是印度的著名中国学家。戈克雷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又到德国海

德堡大学学习汉语和藏语,巴帕特则在美国学中文。他们都曾在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成立的研究中国学的中心工作,都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语、藏语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

除以上学者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学研究颇有成绩,如白乐天(P·Pradhan)撰有《四分律第一波罗夷法与巴利律经分别部》,巴宙(Pa Chow)撰《撰集百缘经与百喻经》,萨蒂兰詹·森(Satiranjam Sen)撰《两部汉译医学著作》,拉马南(V·Ramanan)撰《龙树哲学研究》,冉云华撰《中国佛教编年》、《中国佛教兴衰》等等。

在中国赴印学者中,谭云山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大。他是中国学者的优秀代表,他的事迹传为中印现代文化关系史上的佳话。1924年,泰戈尔访华深深感动了年青的谭云山。1927年他在新加坡首次见到泰戈尔,并获得访问国际大学的邀请。经过一番准备。1928年9月,他来到印度。在国际大学,他在研究学习佛学和印度文化的同时,开设中文班,教授中国文化。后来他筹建并长期主持中国学院,同时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有所开拓。他的研究涉及佛学、哲学、文学诸方面,成果丰硕。他终老印度,一生写了38种英文著作和10多种中文著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学术遗产。印度学者雷易(H·P·Ray)这样称赞道:谭云山教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牺牲了有利可图的生计,参加了伟大诗人泰戈尔所致力的工作——加强喜马拉雅山的两个孪生子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纽带。他进行了不倦的努力,缔造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个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中心。……所有汉学爱好者都将以感激的心情怀念他的贡献。”^④

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努力,印度的中

国学研究后继有人,方兴未艾。目前,开设中文课程的高等院校已有 10 所,除国际大学之外,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实力最强,拥有一批有实力的中国学专家。而且,目前出现了中印联手培养的情况。如青年学者莉都·巴玛(Ritu Bhama),她在北京学了两年中文,后回印度获得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学位,1994 年又到中国读博士学位。她对中印古代神话研究所透出的学力,显示出中印联合培养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者是一条极好的路子。反之,也是中国培养印度学研究者的极佳途径。●

①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12 页。引自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2 页。

②魏凤江《我的老师泰戈尔》,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3 页。

③薛克翘《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0 页。

④印度 J·H·P·雷易《中国学在印度》,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3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6 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审视

——'99 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述要

□ 徐国荣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124-05

如果说光绪三十年清廷的诏书正式废除科举,造成了“士人”阶层的解体,那么,其后不久的白话文运动则使古代文学失去了显学地位。时至今日,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虽然一直不曾断过,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却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边缘化的事实是应该正视的,也无须为此作什么不平之鸣。我们似乎应该思考的是:古代文学研究是不是已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面对这种危机,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具体研究中的操作手段和方法当怎样把握。正是带着这些疑问,1999年9月25日,由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暨南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社联合召开的'99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举行。会议集中就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几个主题为纲而述其大要。

一、关于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和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时至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如

何考虑其学术战略和具体操作,等等,又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蒋述卓(暨南大学)认为,尽管古代文学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并不意味着它已走到了尽头,相反,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入下去,甚至可以多跨几个学科和边缘。有的时候,只要角度稍跨,用新视角去看问题,就能得到新的东西,如吴承学的文体学研究、蒋寅对清诗话的收集整理等等就是这样。至于学术向纵深方向的开展,应该把“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相结合,学术应是有思想的学术,应在思想上有所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总是当代研究,应体现当代意识。

黄仕忠(中山大学)认为,结合边缘交叉学科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路子是可以行得通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过去的研究思路。他提出三点意见,其一,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吴梅的明传奇研究等,都是在对传统戏曲研究的路数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以后,结合了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成绩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其二,要重新评价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许多工作其实尚需重做,特别是很多基础方面的东西。其三,我们还应该再审视一下,文学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文学的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研究,也难以使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魏中林(暨南大学)则以为,虽然边缘性和多元性研究仍是当代的一条路子,其实则一直未形成新的思路,以后如何走下去是需要考虑的。他对此提出了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直通,即要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掌握现代文艺学诸方法和理论。旁通,即要求综合融通,不仅要有中学的基础,也要有西学的理论素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会通,亦即对研究工作的突破。傅剑平(华南师范大学)亦作如是观,而且还认为研究者在打通学科界限的研究工作时,注意才学识的结合,其中“识”又是最为重要的。张海沙(暨南大学)不但肯定了文学研究的边缘性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说,边缘性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是“边缘”。因为文学研究本来就是综合性的,作家本身也是综合的,研究者也应该是综合的,如果我们真把文学当作人学看待,文学研究也就不存在什么边缘问题。

二 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的对策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是从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的。那么,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形态的研究究竟有何差异呢?吴承学(中山大学)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背景与目的的根本不同。现代的文学史研究,最早的目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作为一种大学教材,所以极其重视古代文学史的知识,这是一种传统。随着时

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代作品越来越生疏,于是,文学史研究在知性方面的任务愈来愈重。而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古人的诗文评的前提不是写给毫无文学知识的人看的,不是普及文学知识,而是心心相印的体会交流,是欣赏性的,带着强烈的审美目的。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向知性倾斜,在研究上也这就要求文学史有认知功能,从而使历史现象的真实成为文学史编写的主要价值标准。但是,文学史的重点,是它的文学性而不应该是历史的知性,只有注重文学性,才能使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及文化学等区别开来,从而独立出来,而不是成为一门附庸的学科。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学史,不仅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或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历史的基本知识,而且更是为了追求那种曾经感化、震撼人类心灵而现今已是杳然难寻的文学精神,或者至今仍然继续感动着我们的文学精神。21世纪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文学意义的研究,要发掘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向古人学习,提高文学研究中的诗性分析与审美感悟能力。

程国赋(暨南大学)把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概括为三条。其一,古代文学研究界缺少学术争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并没有形成学术争鸣的空气,很多文章,包括一些书评,都是互相吹捧,只谈成绩,不提缺点。其二,缺少“通才”和大家。在建国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名家,他们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某一具体领域有着个人独到的看法,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就局限在这一具体领域,离开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涉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他们就很少有发言权。反观本世纪上半

段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可以发现,人数上虽不及建国以后,却不乏大家和“通才”。如王国维既研究戏曲、小说,又研究诗词、美学、古史、古文字学;汪辟疆研究清诗,又著有《唐人小说》;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涉及诗词、小说等多种文体;刘大杰、谢无量等人以一人之力编写中国文学史等等。其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化,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要凸现自己的特色;二是要逐步走向世界,与国外的汉学研究、文学接轨,力争使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做到研究对象的国际化,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国际化,注重学术交流,了解信息。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研究,1992年,哈佛大学的欧文教授所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中曾介绍了美国的方教授认为《二十四诗品》是伪作的观点,并认为《二十四诗品》那样的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只可能出现在宋以后。这条材料可能会为最近几年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论争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可是国内学者显然都不太了解。这个事例说明了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应当进一步加强。

赵维江(暨南大学)则提出了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差异性。他认为,古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概念在非专业的人们中常常是混淆的,而在专业研究中也并不甚清楚。所谓“古典文学”是指古代具有典范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学,人们常说的名家名篇无疑属于这个范围,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影响很大的古典主义倾向。这种“古典研究”的做法,确实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作出了

很大贡献,但在研究需要继续深入的时候,其局限性便显现出来了。首先,它难以对文学“史”的线索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因为文学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如果只关注那些优秀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或者某种文体兴盛的阶段,就无法看到这种连续性和承继性。如宋词的苏辛,论者皆以之为二巨擘,但由东坡到稼轩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历来语焉不详,也难以说清,因为论者所注意的只是两宋词坛,若联系北方的金朝词坛便会发现,稼轩所直接承继的并不是东坡,而是金初的蔡松年。从东坡体到稼轩体中间有一个吴蔡体的过渡。其次,对于古代文学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来说,也显得难以适应。文化是一个整体,如果只注意大家名作,是难以看清文化中的文学变迁和文学中的文化意蕴的。再次,单纯的古典研究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造成研究中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造成目前古代文学研究中古典式做法仍然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主要是文学观念问题。特别是20世纪形成的“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观念根深蒂固。二,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目的的认识也支持着这种古典式的研究,对典范的作家作品无疑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可古为今用。但是,古为今用,只是对这种研究结果的利用,而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三,文献资料的现存状况,也助长了古典主义的研究。最后,他表示,这里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主义”问题,并不是反对研究大家名作,而是强调研究工作中“史”的意识,强调注意研究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注意文学现象的研究,注意流派群体的研究,注意“新人”“新意”的研究。

周建江(西江大学)以“生存中的危

机和危机中的生存”为题,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概述,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作者认为,本世纪之前的古代文学研究,很难说具有今天所指的“学术性”气息。长期以来,传统的诗教理论制约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传统的偏重于技术操作性的思维定式又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并没有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关照古代文学的创作。多少年以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竟没有真正解决“何为文学”的问题,他们研究古代文学多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感性认识出发,就作品的风格、文学的承传,以及创作方法去研究古代文学。本世纪的百年,第一次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打上了学术性、科学性的印记,从而真正使古代文学研究得以跻身于科学研究的序列中。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20世纪是古代文学研究走向辉煌的百年。然而,从各种艺术的排列图表分析,古代文学的研究是落后于其他古代遗产的,实在远未达到它所应当达到的繁荣程度,远离于我们的期望值,其中的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是古代文学研究基础的丧失,二是社会政治的沉重负担,三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非自主性,即世俗化、倾向化、功利化。最后一点尤其令人扼腕。这种非自主性,使得研究家们不是听从于文学的召唤去从事文学研究,而是听从于时代的召唤、听从于生存的召唤去从事文学的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相比,本世纪百年间,特别是近50年来,文学古籍整理方面却成就斐然,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分量之重,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要想使古代文学研究发扬光大,走出目前的困境,我们是否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做到文史哲的结合;第二,文学与地理科学的结合,这里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自

然地理等诸多地理门类。第三,文学与考古成果的结合。第四,打破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资源共享、扩大交流。

王晓明(华南师范大学)对西方文学理论较为熟悉,所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面向世界,强调对话,当代西方的一些理论应当被介绍或被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来。虽然这些工作并不是没有人做过,但深度和广度并不令人满意,仍然有许多值得开拓的东西。

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

学问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是否确实需要与当代的现实关怀相联系,这也许是不少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此,张海鸥(中山大学)通过对宋代隐士的自由价值观研究,指出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现代审视问题。他说:在现代社会中,隐士现象因失去自然经济的土壤而不存在了。随着文化转型,传统隐逸文化也曾受到批判。但是,如同西方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忽然又回味中国远古的老庄哲学一样,当代中国人在为脱贫致富而举国奔忙之际,理智地回味一下本民族儒、道哲学支撑起来的隐逸文化,是否可以明确而实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古代隐士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过于偏激,尽管他们社会责任感较为淡漠,尽管他们的生命价值取向有些消极,但是,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真实无伪、独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坚守,对文化的进取,对生命自由(行为和思想)的执着,都永远具有积极的、文明的价值,永远滋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现代人可以不取其隐居山林的生活方式,却不应完全抛弃其文化精神。

郭德茂(珠海教育学院)也对“贫庸时代知识何为”的疑惑表示了自己的看

法,认为学术劳动是纯粹个性化的劳动,学术研究应当多一点人文关怀。社会上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进行的集体操作,如一些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从学术研究的本身而言,自然并无多大意义。合作研究的方式也并非完全不可取,但至少应该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合作,不能成为乌合之众的草率马虎的借口。李立(五邑大学)对古代文学研究中一味地强调的所谓科学精神提出了疑义,因为古代文学本身是一门人文学科,我们的研究也许更应该注重一些人文关怀。近年来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同时也常常失落了这种人文关怀。

郭杰(深圳大学)在对学问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表示了疑虑后,认为学人在古代文学失去主流话语地位后,只能以平常心待之,把古代文学研究看作是对价值的弘扬,对信仰的追求。事实上,它也应该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文化的需要。聂巧平(暨南大学)接过去年研讨会上张海鸥提出的“传承高贵”的话题,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高雅的学问,不当去考虑什么功利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只要勤奋努力,总会有收获。同时,文学研究在重视文学性的过程中,研究主体也便能找出一种“于吾心有戚戚焉”的感受,一种淡然处世的快乐感。

由于以上问题都属于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与会者自然而然地又对文学史的编写及其教材问题展开了讨论。石育良(中山大学)认为,文学史研究要回到现象的解释上,这个问题不解决,真实问题就大打折扣。因为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史教材的编写,都有大量被舍弃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把握

其实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评判。吴晟(广州师范学院)对此亦有同感,并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编写高质量的文学史的时机还不成熟。关于此点,史小军(暨南大学)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文学史著作既是对已往文学发展历史的客观叙述,又体现着编撰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状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当下”色彩和时代印记。文学史研究没有穷尽,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研究水平。因此,文学史著作不可能臻至完美或达到永恒。在讨论文学史著作时,首先要明白它的定位问题。从读者角度来看,文学史著作可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为研究者编写的论著,一种属于为学生(特别是本科生)或一般读者编写的教材,两者在编写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就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而言,高质量的论著不多,高质量的教材更是缺乏,以致游编本使用了30多年还未有合适的替代品,教材的编写迫在眉睫。所幸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业已出版,展示了目前文学史研究和教材编写的最新成果,足以缓解师生们的燃眉之急。徐国荣(暨南大学)也认为,文学史编写、文学史教材编写、文学史课程教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从当前形势看,教材问题最为严重,而最近所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的一套,尤其是其后面的注文具有很强的张力,既不失一般教材的客观性,又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编者之一,黄仕忠(中山大学)还就这套教材的编写体例、指导思想及出版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

责任编辑:陶原珂